

# 告另叮

## 皇帝的中国

马国川 「访谈」

刘香成 余英时 高全喜 许倬云 萧功秦 杨天石 周有光 雷颐 袁伟时 章开沅 李泽厚 朱维铮

周有光题赠刘香成《壹玖壹壹》：

1911年是中国走向现代的第一步。虽然事实上的皇帝不断出现，可是皇帝的名义谁都不敢用了。我们希望中国再向前走一步，既没有皇帝的名义，也没有了事实上的皇帝。

李泽厚：

梁启超是为了改良而讲革命，我讲告别革命是为了能够慢慢改良，中国太难改变了，就像鲁迅讲的，“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你声称要把屋子拆了，最后人家才同意你开个窗户。

金耀基：

阅读这本《告别皇帝的中国》，更会深信中国今后必须拨开“不断革命”、“继续革命”的思想迷雾，在经济改革与现代化之后，再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精神，实践自我改革，寻求一条建造中国现代政治文明、长治久安的道路。

陈列建议：近代史、访谈录、人文社科

ISBN 978-7-5100-4075-7



9 787510 040757 >

ISBN 978-7-5100-4075-7/C · 195

定价：28.00 元

后浪出版

# 告另可 皇帝的中国

马国川 「访谈」

刘香成 余英时 高全喜 许倬云 萧功秦 杨天石 周有光 雷颐 袁伟时 章开沅 李泽厚 朱维铮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广州·上海·西安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告别皇帝的中国 / 马国川著.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公司, 2011.11

ISBN 978-7-5100-4075-7

I. ①告… II. ①马… III. ①辛亥革命—研究 IV. ①K257.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 223709号

## 告别皇帝的中国

著 者: 马国川

筹划出版: 银杏树下

出版统筹: 吴兴元

责任编辑: 张 鹏

营销推广: ONEBOOK

装帧制造: 墨白空间

出 版: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出 版 人: 张跃明

发 行: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北京朝内大街 137 号 邮编 100010)

销 售: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正合鼎业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大兴市黄村镇太福庄东口 邮编 102612)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4 插页 4

字 数: 222 千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教师服务: teacher@hinabook.com 139-1140-1220

读者咨询: onebook@263.net

编辑咨询: 133-6631-2326

营销咨询: 133-6657-3072

ISBN 978-7-5100-4075-7/C·195

定 价: 28.00 元

(如存在文字不清、漏印、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10-61252412-8021)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一

## 告别皇帝的中国

人类历史的演进轨道：

文化从神学思维到玄学思维到科学思维；

经济从农业化到工业化到信息化；

政治从神权统治到君权统治(专制)到民权统治(民主)。

世界各国都在这同一条历史跑道上竞走,中国不是例外。

审视中国在这条跑道上已经达到什么程度,是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

这就是本书的目的。

是为序。

周有光

2011年8月1日

时年106岁

(周有光,1906年生,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文化学家。著有杂文集《朝闻道集》、《拾贝集》等。)

## 重思、反思“辛亥百年”

7月间,马国川先生来一传真,希望我为他新近完成的《告别皇帝的中国》写一序言。

马国川是《财经》杂志主笔,是一位资深媒体人,曾出版《大碰撞:2004—2006的中国改革纪事》、《风雨兼程: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访谈录》等书,脍炙人口,广受好评。马国川有媒体的专业修养,对时代性的课题有敏锐的触悟与捕捉。2009年4月我在北京出席博源基金会主办的“中国现代化与现代性”会议期间,曾接受过他一次有关大学课题的访谈,他十分到位的问题,平和理性的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显然,这次马国川先生为了《告别皇帝的中国》一书是花了很大的心思与功夫的,从书的主题(辛亥百年)之设定,采访的大纲细目之拟定,到受采访人的选请与邀约,都有细致的构思与计划。他希冀通过海内外十二位学者从不同角度解读辛亥革命,总结一百年来中国现代化道路,探寻中国的未来。他的基本兴趣与动念不止在探求辛亥百年的历史真相,更在为处在社会大转型的新转折点上的今日中国寻求历史方向性的道路。

马国川先生《告别皇帝的中国》的内涵从他的采访大纲所提的问题可知其梗概。他的采访主要是围绕下面六个问题展开的:

1. 如何评价“晚清新政”?
2. 为什么会产生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的产生是否必然?
3. 中国有无可能不经过革命而实现宪政? 如何认识革命和改良的关系?
4. 如何评价辛亥革命对中国历史的影响?
5. 如何认识辛亥革命一百年来中国现代化道路? 其中有哪些经验和教训?
6. 今天中国面临哪些问题? 未来中国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道路?

十分难得的是,马国川能够邀请到以下十二位学者作为他访谈的对象:周有光、李泽厚、余英时、许倬云、刘香成、杨天石、章开沅、朱维铮、萧功秦、袁伟时、雷颐、高全喜。这多位学者,不是学界名宿,就是在学术专业领域卓有成就

的名家,几乎可以肯定的是,马国川与这多位学者共同谱写的《告别皇帝的中国》必是言之有物,大有可观的。诚然,在我阅读之后,我觉得这个访谈录是对辛亥百年的重思与反思,有深度,有广度。

令人惊讶,也不令人惊讶,十二位受访学者对于辛亥百年的某些大事件(如晚清新政,辛亥革命)的解读与评价是很不一样的,甚或是针锋相对的,这当然不止是受访者认知层次上的岐异,也涉及到“价值观”的不同。

在这个访谈录中,在马国川的叩问下,各个学者阐抒了独立的积学定见,可以说是马国川与各个学者间的对话,但全书展现在读者面前的便不啻是一场精彩的论辩。阅读这场论辩,读者不止可以看到同中之异,也可以看到异中之同。读者阅毕这场论辩,对于“辛亥百年”在整体认识上必不能不大有增益。不夸大的说,通过这本访谈录,我们对于辛亥革命的本质、成因与遗产;对于宪政民主作为人民共和国之制度体现上的必要性都会有深一层的理解。不宁唯是,阅读这本《告别皇帝的中国》,更会深信中国今后必须拨开“不断革命”、“继续革命”的思想迷雾,在经济改革与现代化之后,再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精神,实践自我改革,寻求一条建造中国现代政治文明、长治久安的道路。

这是我读、我思“辛亥百年”的感想,并以此报答马国川先生索序之雅意。

金耀基

2011年8月3日

(金耀基,1935年生,美国匹兹堡大学哲学博士,前香港中文大学校长。主要著作有《大学之理念》、《从传统到现代》。)

### 序三

## “辛亥百年”之我见

今年是辛亥革命的一百周年,北京《财经》杂志的马国川记者为了进行一次非同寻常的纪念活动,不辞辛劳,采访了大陆、台湾和海外的十二位著名学者。大陆的是周有光、章开沅、李泽厚、袁伟时、杨天石、朱维铮、萧功秦、雷颐和高全喜;台湾的是许倬云;海外的是余英时和刘香成。这些学者大都是对辛亥革命进行过长期而深入研究并有所建树的专家,而且都具有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国川同志把这些很有分量的采访录汇集起来成为一本大作,题为《告别皇帝的中国》,将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出版。蒙其信任,索序于余。开始我感到,我虽对辛亥革命有所了解,但究非我学术研究的主要内容,难以应命。但旋又想到,对我而言,这个任务是一种光荣,一种责任,而且还是一个很好的老年再学习的机会,便慨然应允了。不过,即使我会尽力而为,能否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我没有绝对的把握。我的想法是谈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对本书的欣赏或评价;一是在我原有对辛亥革命史的知识理解的基础上,结合我对这些专家的评论的学习和体会,对与辛亥革命史有关的几个主要问题,提出我的浅见,请专家们指教,供读者参考。

### 对本书的欣赏或评价

马国川采访朱维铮教授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从辛亥革命到现在百年间,中国现代化进程有哪些教训?朱教授在正面作答前首先指出:谈历史教训,首先要弄清楚历史真相。他的意思是,凭“以论代史”的历史是找不出历史教训的。我同意此说。但这里又有一个问题要澄清。历史真相是可以弄清楚的吗?对这个问题,我们历史学界的看法并不一致。从国际层面看,认为历史真相弄不清楚的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小罗斯福时代史学界领袖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A. Beard)。他早年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曾一度服膺经济史观,但后来不独从经济史观转而相信多元史观,还大力宣扬历史的相对主义。“他总结说,成文史并不是一种科学,而是一种‘信仰行为’;历史



学家不可能了解过去,只能把碰巧弄到手的一些零零散散的史料根据支离破碎的计划重新构筑一番,而他这个计划反映的又是他那逃脱不掉种种限制的头脑。”<sup>①</sup>他还说:“没有哪个历史学家能够把过去描绘成实际那样,每个历史学家的著作——对事实的选择、强调、省略、组织和展示方法,都相对于他自己的个性以及他所生活的时代和环境”;“所有的历史解释都相对于时间、地点,都注定要随着它们产生的环境——思想及利益的消失而消失。”<sup>②</sup>我曾一度为他的这种论点所迷惑,但经过反复思考和广泛阅读,我不同意他的这种相对主义历史观。我认为,历史学工作者对历史的认识和阐述,虽会受其个人的思想感情及其所处环境的影响,使其对历史本体及其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具有局限性,但不能说所有严肃历史学者对历史的解释都会因时势的变迁而失去存在的价值。历史是有其本体和客观发展规律的,而且是可以被认识、被弄清楚的。但是,构成历史本体的因素,非常复杂多样,历史学工作者不经过长期艰苦的、具有广度和深度的探索和研究,就很难全面地掌握这些因素并分清其主次;历史的客观发展规律,是含蕴和隐藏在历史本体成长过程之中的,历史学者不经过长期艰苦的、具有广度和深度的对构成历史本体的诸因素复杂内部关系的探索和研究,就很难发现这种客观发展规律。所以,历史学者研究和探索历史本体和发展规律的功底,就决定历史学者对历史的解释与历史实际接近的程度。我认为,要使历史学家对历史的解释完全符合历史的实际,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但是,历史学家可以通过自己长期艰苦的努力,使自己对历史的解释接近历史的实际情况。一个历史学家如果能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使自己对历史的解释进一步接近历史的实际,那他就是对历史学作出了贡献。

我仔细阅读马国川记者的这些采访录后,感到每一篇都是辛亥革命史专家经过长期艰苦探索和研究成果。首先,它们摆脱了左倾教条主义影响,没有以论代史;其次,它们的论证,都有充分史实作根据;第三,它们都有自己独到见解,不是人云亦云。因此,它们对辛亥革命及其影响的探索和研究,尽管程度并不完全一致,但都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增加了新内容,进一步接近辛亥革命史的实际情况。更值得提出的是,这本书的内容不是一家之言,而是十二

① 亨利·康马杰:《美国精神》,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第448页。

② 以上两段引文俱见武剑榕:《比尔德经济史观初探》(武汉大学历史系1990年硕士论文),第40页。

位专家各有特点的名言说论。这就是说,本书对辛亥革命史的研究,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增加了多达十二项新内容,为更接近辛亥革命史实际情况推进了长足的一步。

我认为,这是一本非常值得一读的好书。对有志于研究辛亥革命史的学人,和涉猎辛亥革命史有业余爱好的人,尤其如此。

## 我对与辛亥革命史有关的几个主要问题的看法

关于晚清新政。所谓晚清新政,一般指1901年9月《辛丑条约》签订后,到1911年为止,大约十年间,慈禧和清廷实行的一些改革。余英时教授认为:清廷的改革从洋务运动已经开始,这十年改革也一样未触动政治体制,无所谓“新”,有什么值得标榜的!我基本认同余教授的意见,认为对晚清新政不能、也不应评价过高。首先,由于实行和掌握这些改革的是慈禧和清廷,他们有个底线,就是绝对不能危及他们的君主专制统治。1901年1月29日宣布变法的上谕中说:“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sup>①</sup>这就说明,他们的变法,和要求立宪的维新变法不是一回事,清廷的君主专制统治是永远也不能变、不能触动的。然而,根据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废除清廷的君主专制统治,乃是中国救亡图存的首要条件。其次,对他们所谓能变的,也就是他们进行的改革,慈禧和清廷又是什么态度呢?尽管他们大概意识到这些改革是延续清廷统治的必要措施,但究竟不是他们自愿、主动采取的,而是列强和中国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逼出来的。因此,他们在实行这些改革时,不会有真正的积极性,坚决要求其有实效。特别是这些改革,比如提倡和鼓励私人资本办工业,改变军制,废科举、办新学、派人出国留学,改变法系、政府机构和官制,设资政院和省谘议局,甚至筹备立宪等等,当然都是促进中国现代化、有助于救亡图存的重要事业。但是,它们又都是有损于清廷君主专制统治的根基的。比如,允许私人资本办工业,便摧毁了清廷对工业的垄断;改革军制,便冲淡了军队对清廷的忠诚;废科举、办新学、派人出国留学,便大大缓解了清廷对知识分子的笼络与控制;改变法系、政府机构、官制和设资政院与省谘议局

<sup>①</sup>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59,第914页。

等,更是直接削弱清廷君主专制制度的措施。至于筹备立宪,则意味着清廷君主专制制度的最终废除。从这个角度看,我们能想象以维持清廷君主专制制度为底线的慈禧和清廷,能真心诚意实行这些新政吗?能不断加强这些改革吗?显然不能。为节省篇幅,我这里只举派遣留学生这项新政的例子加以说明。

大约是1870年末,曾国藩和李鸿章接受第一位受过完全美国教育的中国人容闳的建议,每年派三十名精心挑选、年龄在十二至十六岁之间的青年赴美留学十五年。这就是赴美留学教育使团。为确保这些青年不为“西学所蔽”,保持儒家的忠君思想,清廷任命虔心儒学、坚持儒礼而知名的儒生陈兰彬为监督,和容闳共同管理、指导这些青年;另外还派遣一批中国教师教授中文和儒经。根据规定,这些学生必须时常聚会,聆听圣旨,并朝向北京皇帝所居地朝拜。

但是,这些学生以令人难以置信速度日益美国化。容闳表示赞同,陈兰彬则坚决反对;他不断发回国的反对报告在国内引起对使团的猛烈批评。于是,清廷又指派了一名新监督,容闳则被改任中国驻美公使,协理使团事务。现在,让我引述两段关于这位新监督的记载,看看清廷及其官吏是怎样对待“派遣留学生”这项新政的。其一是:“从他抵达之初……便就使团的管理和学生的非中国化的行为向北京发送了一连串不利的报告。……他深感他们已经丢掉了构成中国官吏阶层的儒家学者所具有的全部品质。……他们对构成中国整个教育基础的中国经典,所知甚少,也毫无兴趣。”<sup>①</sup>其二是:“光绪(1875—1909)六年,南丰吴惠善为监督。其人好示威。一如往日之学司,接任之后,即召各生到华盛顿使署中教训。各生谒见时,均不行拜跪礼。监督僚友金某大怒,谓各生适异忘本,目无师长,固无论其学难期成材,即成亦不能为中国用。

“具奏请将留学生裁撤……但无敢言者,独容闳力争无效,卒至光绪七年,遂将留学生一律撤回。”<sup>②</sup>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了另一项具有典型意义的清末新政。这就是政府机构和官制的改革,十年改去改来,最后在1911年却改出了一个“皇族内阁”——变相的君主专政制度。

<sup>①</sup> 托马斯·拉法尔格:《中国的首批百人留学生》,华盛顿州立大学出版社,1942,第3章,第44页。

<sup>②</sup>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南京:钟山书局,1935,下册,第447页。

这就是清廷对待新政的态度。诚如张之洞所言,慈禧和清廷实行新政,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实质就是学习西方的物质文明以维护清廷的君主专制统治。违反此根本目标的新政是绝对不被允许的。还不仅如此。清末每实行一项新政,就要筹集经费,实际上就是加捐派税,剥削、压迫老百姓,不断激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到1910年,这种反抗新政的斗争,达到了高潮。<sup>①</sup>

综上所述,我觉得实在是没有什么理由,让人们看重晚清新政。我还看到一些说法:如果慈禧晚死十年,就不会有辛亥革命了;如果没有辛亥革命,中国早就实行宪政了。对这种观点我很反感。本书中,余英时、章开沅、杨天石、朱维铮、雷颐、周有光等已进行了有说服力的辩驳。我这里再提供一个有力的反证。这就是慈禧临终前的一番肺腑之言。“恽毓鼎《澄斋日记》云:‘闻中官言,孝钦显皇后大渐时,忽叹曰:不当允彼等立宪。少顷又曰:误矣!毕竟不当立宪。’……本来清末立宪,已回到皇帝改制路线,可她临终一悔,又将立宪全盘推翻……古人有‘一言丧邦’说,从历史上看,秦桧‘莫须有’算一句,还有就是慈禧的这句‘不当立宪’了。”<sup>②</sup>怎么能说慈禧晚死十年中国就早已立宪了呢?真太离谱了。

关于辛亥革命的必然性。辛亥革命的发生,一般学者大都认为是必然的,也有学者认为是偶然的。我从来不相信偶然论,理由如下。当然,理由很复杂,我这篇短文不能详述,只能谈个轮廓。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古国,自秦、汉以来两千余年,实行尊儒依法的君主专制统治,成为一个以农业为经济基础的,组织严密稳固、生命力很强的国家。虽几度被北方游牧民族所灭亡,但因有较高文化水平,这些文化水平低劣的游牧民族,反而被同化,凝结成一个强大的中华民族的国家,一直屹立于东方,曾长期“东风压倒西风”。但是,欧洲自文艺复兴以后,资本主义逐渐发展,陆续产生一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工业化,它们创建了较先进的物质文明,船坚炮利。而且作为资本主义国家,天生具有扩张性。从十六世纪起,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开始侵略中国。到1840年鸦片战争后,实行尊儒依法的君主专制制度的农业中国,显然落后于工业化的欧洲各资本主义国家;在和它们的战

<sup>①</sup> 较详细情况参见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下册,第754—758页。

<sup>②</sup> 李冬君:“辛亥革命:导火索与‘投名状’”,《同舟共进》,2011年第8期,第41页。

争中屡战屡败。到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瓜分或亡国之祸,迫在眉睫。而且,这些具有瓜分或灭亡中国能量的列强,与曾经灭亡中国的游牧民族不同,它们具有比较先进的、成熟的文化,不可能被中华民族文化所同化。面临这非常的危机,无数中国的仁人志士,前仆后继地寻求救亡图存之道,大家最后认识到,最关键的问题是: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推翻清廷继承的、中国实行了两千多年的尊儒依法的君主专政制度,最低要求是实行立宪制。但如前所说,这是慈禧和清廷坚决反对的。在这种情形下,绝对不愿意具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国被瓜分或被灭亡的中国人民,只有一条路可走。这就是辛亥革命必然会发生的原因。

辛亥革命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关于这个问题,学者们看法颇不一致。有持否定态度的。比如,有的人认为辛亥革命耽误了中国立宪制的建立,是乱中国之源,延缓了中国的现代化;有的人认为辛亥革命造成了一个弱政权,结果导致袁世凯专政,意义不大,也不那么美好,不是什么成功。持肯定态度的人较多。有的人认为辛亥革命功劳很大,推翻了秦以来建立并维持两千多年、到十九世纪使中国面临瓜分或灭亡危机的君主专政制度,证明了中国人可以自己搞民主,建立民国。它的成就是否定不了的,革命不能“告别”;有的人认为辛亥革命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作出了贡献;有的人认为辛亥革命后中国所走的道路,尽管曲折多歧,但总的趋势是沿着孙中山提倡的民族、民主、民生三大目标前进的;有的人认为辛亥革命肯定、鼓舞、加强、发扬了中国地方和人民群众要求改革、现代化的自发性,尽管这种心理进步见效缓慢,但却具有根本意义;有的人认为,辛亥革命后,中国成为东方第一个共和国,对整个东亚、东南亚是有极大效应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万隆会议时,中国已俨然是第三世界领袖,所以辛亥革命后一百年来,中国无形中在世界上起一种标竿的作用。

我可能受父亲影响,从少儿时代起,就对辛亥革命产生一种模糊的支持态度。经过将近一个世纪,我没有发现有说复力的否定辛亥革命的历史事实和理由。我认为不能把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的混乱局势归因于辛亥革命,因为中国的每一个政权灭亡后,都曾出现过群雄并起、战乱频繁的时期。满清灭亡后,无论是否经过辛亥革命,总是会出现一个混乱时期的。当然,辛亥革命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十分缓慢,而且坎坷多歧,给中国人民造成很多痛苦。但这也不是辛亥革命之过错,而是中国两千余年君主专政制度的余威。

辛亥革命后一百年来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经验和教训。先谈经验。我认为,从中共成立起到1949年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前三年的新民主主义建设,可以说是辛亥革命后中国现代化的经验。毛泽东在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其社会性质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还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sup>①</sup>这是符合当时走向现代化的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的。到1945年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在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中,又将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表述为“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这更明确地表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目标,就是为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综上所述,所以我认为中共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是辛亥革命后中国现代化的经验。根据类似的理由,我认为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也是“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因此也是一种现代化经验,但因改革开放时间尚短,仍有不足,所以只是一种不完全的、或半个现代化经验。

再谈教训。我认为从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起,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就走上了歧途,教训深刻。在对秦汉以来两千余年君主专制制度(注:左倾教条主义者将之误为封建制度,为叙述和引用材料方便起见,我这里也暂称为封建制度)的批判和改造还很不彻底时,过早地进行了批判和消灭资本主义的斗争。如胡绳所说,1957年9月至10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改变了党的八大关于我国社会矛盾的正确判断,“毛泽东在全会初期讲话中提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sup>②</sup>这样,从1957年年末起,直到改革开放前,我国就放松了对统治中国两千余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余毒及其理论基础的儒学,进行必要的、不懈的批判和斗争,而只是集中地致力于批判和消灭资本主义。这种失误,邓小平在酝酿和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时,也深深体会到。他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所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中,虽然没有直接提出反对封建主义的字眼,但其主旨实质上是反对封建主义的。经过一年

---

① 这两段引文见《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第二卷,第664—665页。

②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北京:中国党史出版社,1991,第336页。

多的实践,他深感封建主义的影响对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严重阻碍作用,并在1980年8月1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明确指出: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中存在的主要弊端有“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于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上面讲到的种种弊端,多多少少都带有些封建主义色彩”。他还进一步指出:“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当然不止这些。还有,如社会关系中残存的宗法观念、等级观念;上下级关系中和干群关系中在身份上的某些不平等现象;公民权利义务观念薄弱;经济领域中的某些‘官工’、‘官商’、‘官农’式的体制和作风;片面强调经济工作中的地区、部门的行政划分和管辖,以至画地为牢,以邻为壑,有时两个社会主义企业、社会主义地区办起交涉来发生完全不应有的困难;文化领域中的专制主义作风;不承认科学和教育对于社会主义的极大重要性,不承认没有科学和教育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对外关系中的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等等。”由于清晰地看到、体会到封建主义余毒的惊人泛滥,他紧接着提出:“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

尽管邓小平认识了这个问题,但他对解决这个问题似乎没有作出应有的努力。所以,人们只要留心,就会从日常生活中,从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等的实际运作中,从报纸、杂志上,从各级政府的有关文件里,看到、听到、体会到邓小平在上述讲话中指出的各种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表现,还十分流行,有时在有些地方还很猖獗,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愤恨和有识者的深深忧虑,认为大有害于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这样的事例很多,我这里只举一二件。1997年7月30日,《中国经济时报》上王干才的文章指出:反对封建主义任重而道远,一方面,我们在与资本主义作斗争时,自觉不自觉地借用封建主义的武器,“文化大革命”时期是典型的例证;另一方面,当与封建主义作斗争时,又往往拒绝资本主义较封建主义较优越的事物,而且将许多不属于某一社会形态而属于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固有的优秀遗产,看成资本主义的东西加以拒绝。正是这种历史和现实双重原因,致使封建主义至今还根深蒂固、顽强而广泛地表现自己。该文还指出,封建主义还宣扬大多数

人对于个人的依附和顺从,并已积淀为民族心理的深层成分,融化在人们的血液中,成为人们自觉不自觉地观察、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既定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这是和建设、发展市场经济所需要的独立、自主、公正、平等、竞争、进取等价值观念背道而驰的,极有害于改革开放事业的。2000年,杨春贵在《半月谈》第17期撰文指出:中国是一个具有两千多年封建历史的国家,封建思想源远流长,其影响不可低估。进入社会主义时期最初的二十年,我们在思想战线上重视对资本主义思想的批判,而严重忽视了对封建主义的批判,有时还不自觉地用封建思想去批判资本主义,甚至用封建思想去批判马克思主义,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文章还指出,在我国当前社会生活中,在一些部门和单位,特别是在基层,封建残余思想有着相当广泛的影响。例如,个人专权擅权、滥施淫威的“霸王”现象;等级森严、论资排辈的“官本位”现象;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的吏治腐败现象;“一人做官,鸡犬升天”的血缘宗法现象;装神弄鬼、算命测字、神秘气功的迷信现象等等,随处可见。

综上所述,足见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后,只集中批判资本主义及其思想,忽视批判封建思想(实质是君主专政思想),乃是在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上留下大量难以撼动的绊脚石,教训是极其严重的。

这里还应提出的是,由于科学技术空前发展,信息交流日益增量增速等原因,全球化进程尽管会不断反复,但总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在此情形下,中国不能也不应独善其身。中国应该在谋求自身进步的同时,尽其所能地参与全球化进程,防止其成为一种各国互相竞争、用以利己排他的运动;促使其成为一种所有国家互利共赢的运动。中国不仅应该教育自己的国民成为坚决维护自己权利、严格遵守自己义务的好公民,还应预备有一天会成为世界政治共同体的好公民。因为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在谋求和维护自己进步的同时,也有助于全人类逐渐走向和平、进步和幸福的境地。

刘绪贻

2011年8月20日

于珞珈山求索斋

(刘绪贻,1913年生,著名美国史专家。主编多卷本《美国通史》,著有《中国的儒学统治》、《改革开放的社会研究》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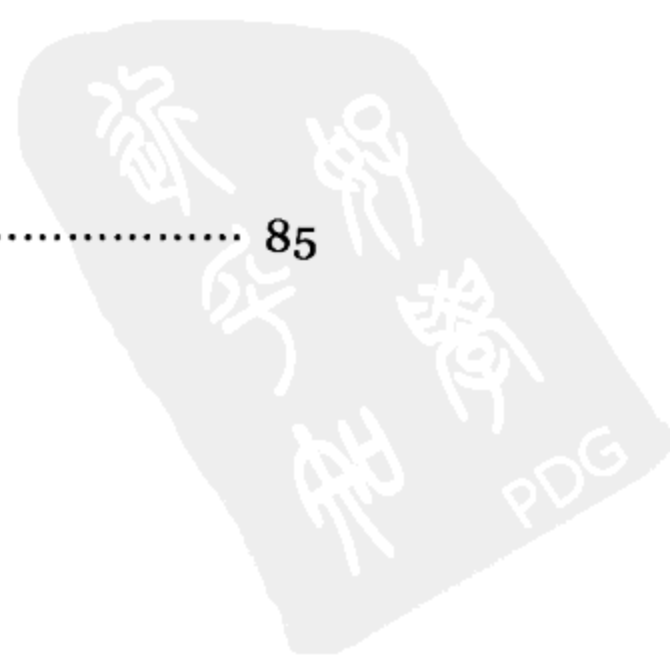


# 目 录

## CONTENTS

序一 告别皇帝的中国	周有光 1
序二 重思、反思“辛亥百年”	金耀基 2
序三 “辛亥百年”之我见	刘绪贻 4
<b>朱维铮：中国的改造只能够通过内部的力量</b> .....	<b>1</b>
鸦片战争之前中国闭关自守吗？	4
“如果不肯自己改革，别人就要起来颠覆你”	6
清政府变成了所有人的敌人	9
“中国的改造只能够通过中国内部的力量”	11
“一个灰色的回忆不能够代替现在的生动和自由”	14
<b>李泽厚：再议辛亥革命</b> .....	<b>17</b>
辛亥革命的成功是非常偶然的	20
在改革中，一定要保证政府的稳定	22
辛亥革命留下的主要是思想上的意义	24
要重新评价辛亥革命	27
改良不是投降，而是尖锐的斗争	30
<b>章开沅：革命不是制造出来的</b> .....	<b>33</b>
“改革一经启动，就要继续往前走”	36

革命不是制造出来的	38
辛亥革命的遗产绝非仅仅是昙花一现的观念	40
“百年锐于千载”	41
民生与民权,仍未完成的历史任务	43
“孙中山是真正的世界公民”	45
展望下一个一百年	47
<b>袁伟时:假如没有辛亥革命</b> .....	<b>51</b>
“慈禧执政的最后八年是辉煌的”	54
既得利益集团的整体性腐败	55
推翻帝制是一大功劳吗?	57
是谁摧毁了民初的宪政架构?	59
“以暴易暴不是清除污秽的手段”	62
<b>雷颐:为什么一步步走向革命?</b> .....	<b>67</b>
“一步一步地把自己弄垮”	70
制度优,则国家强	72
“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厂也”	74
“立宪派也走向革命”	75
“国进民退”大败笔	77
与其呼吁“告别革命”,不如吁请主动改革	79
如何告别革命?	81
<b>周有光:纵论辛亥革命</b> .....	<b>85</b>
革命不革命,要看它是进步还是退步	88
提高对慈禧的评价是错误的	89
康有为前进了半步,孙中山跨出了一步	90
三千年的历史大趋势	91



<b>杨天石:辛亥革命是必要的</b> .....	93
历史学家要对历史负责	96
革命是必要的	97
慈禧这个人	99
立宪派不过是附和革命	102
孙中山的思想没有过时	105
专制主义的大牛粪圈	107
<b>萧功秦:革命的乌合之众摘了清王朝的烂桃子</b> .....	111
对日俄战争的双重历史误读	114
辛亥之前清王朝进入了权力真空时期	116
“革命的乌合之众摘了清王朝的烂桃子”	118
袁世凯是亚洲历史上第一个新权威主义者	120
辛亥革命推倒了第一张骨牌	122
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	124
<b>许倬云:一百年的路是“正反合”的过程</b> .....	127
“中国的选择余地并不多”	130
孙中山思想的两派继承者	132
一百年的路是“正反合”的过程	134
“中国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标杆作用”	136
两岸要相互学习,互为警戒	137
中国模式可取否?	138
自己的现代化道路	140
<b>高全喜:宪法出场,革命退场</b> .....	145
中华民国的宪法基础是什么?	148



君主立宪道路一直在走	150
中国版的“光荣革命”	153
支持和维护宪法精神的软弱	155
宪法出场,革命退场	158
<b>余英时:回首辛亥革命,重建价值观念</b> .....	<b>161</b>
“满洲党”不改革,就逼出一个辛亥革命来	164
革命和暴力是两回事	167
“中国人思想上的一个大敌”	168
所谓普世价值,中国古已有之	171
重建价值观念	173
<b>刘香成:告别悲情意识,寻找中国位置</b> .....	<b>175</b>
“告别口号”更重要	178
“中国人受伤的感情至今仍然脆弱”	179
“在中国,书写历史是既复杂又敏感的事”	180
今天中国的位置在哪里?	182
最后的改革其实是媒体改革	184
后记	205
出版后记	207





## 中国的改造 只能够通过内部的力量

### 朱维铮

著名历史学家，复旦大学资深特聘教授，曾长期担任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主任、专门史博导。1936年生，江苏无锡人，1960年毕业于复旦大历史系，留校任教至今。曾应聘担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慕尼黑大学、哥廷根大学，韩国高丽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与城市大学，台湾大学等校客座教授，2006年由德国汉堡大学授予荣誉哲学博士学位。曾任中国史学会理事，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上海海峡两岸文化交流协会常务理事等。主要研究中国经学史、中国史学史、中国思想文化史。主要著作有：《走出中世纪》及增订本并二集、《音调未定的传统》、《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壶里春秋》、《维新旧梦录》（合著）、《中国经学史十讲》、《重读近代史》等。编注及主编近代中国学术名著、研讨论文集和大学文科教材数十种。

## 采访手记

“谈到辛亥革命,我希望先了解它的前奏”,朱维铮先生对我说,“我重读近代史,就是希望了解,从明朝晚期一直到‘五四运动’,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希望把历史弄清楚。”

这是2010年夏天的一个午后,窗外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雨。我坐在朱先生的办公室里,听他讲述自己的治学历程。

今年七十五岁的朱维铮先生是无锡人,五十一年前他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留校任教。“最初我跟本师陈守实先生学习中国土地关系史,陈先生是梁启超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时的研究生”,朱维铮先生告诉我,“我后来跟着周予同先生编写大学教材《中国历史文选》。”

1919年5月4日,周予同作为北京高师的代表,参加了“火烧赵家楼”的活动。不过,这位“五四运动”中的风云人物后来潜心学术,尤其长于中国经学史。所谓“经学史”,就是中国中世纪统治学说的历史。周予同一直希望朱维铮跟着他学中国经学史,但是朱维铮没有兴趣做。

“文革”后期,毛泽东开展了“批儒尊法”运动,复旦大学成立了一个“章太炎著作注释小组”,正在做“牛鬼蛇神”的朱维铮从工厂调回来“一批二用”。在这期间,他重读了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等清末民初思想家或研究者的作品。朱维铮说:“清末民初是中国从帝制时代走到共和时代的关键时期,恢复工作以后,我觉得这段经历是非常重要的,就转向了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对于中国从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历史,中共执政以来的教科书有一套固定的论述,即中国近代化是从鸦片战争而被动开始的。但是朱维铮在研究中发现,中国从晚明开始就进入近代化的过程,而且是主动地“走”,并不是被大炮轰出中世纪的。

在《走出中世纪》一书里,朱维铮对中国“走出新世纪”的历史进程作

出了独特而新颖的阐述。“它是一个内部的从旧的东西变成新的东西的过程”，朱维铮说，“在我看来，这种被近代化、被现代化的解释不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状况。”

朱维铮成为备受争议的历史学家，因为他的许多观点颠覆了一些人对历史的认识框架。“很多人不懂历史，疯狂骂我，真的很悲哀”，朱维铮对此有些无奈，“我们的历史研究本来很发达，假如把自己历史搞没了，中国人反而要到外国去学习中国史，那是很糟糕的。”

糟糕固然糟糕，但是并非不可能。俄罗斯独立以后，所有的学校历史课都停了。可是，一个国家不能没有历史课啊。结果，就把一个法国人写的俄罗斯历史翻译成俄文，暂时替代。俄罗斯的教育部长说：“我们俄罗斯的历史都是进口的。”

当然，现在俄罗斯的历史学家们终于写出了自己的《二十世纪俄国史》。该书出版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不到一年就再版数次。该书的作者们沉痛地说：“1917—1952年这三十五年的历史是极其悲剧性的，研究这段历史让人撕心裂肺。所以许多人宁愿佯装不知。然而如果后人不能与先辈产生共鸣，那么先辈的痛苦经历就毫无意义了。”

辛亥革命以来的一百年，中国的历史道路同样充满了曲折和艰辛，值得人们永远铭记。



## 鸦片战争之前中国闭关自守吗？

马国川：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了，作为一位历史学家，您认为从辛亥到现在的一百年间，中国现代化进程里有哪些教训？

朱维铮：谈历史教训，首先要弄清楚历史的真相。如果不搞清楚历史的本来面目，而是“以论代史”，是不可取的。

马国川：因为将 1840 年鸦片战争作为近代史的开端，在研究上就出现对历史的割裂，而且以某些政治人物的论断为依据，以论代史，为了论证某句话，完全不顾事实的真相，甚至把所有的其他历史都屏蔽掉。

朱维铮：中国历史那么长，分段研究是可以的，但是不能把历史割裂开。因为把 1840 年鸦片战争作为近代史的开端，后来人们就发明了一些怪论。比如，说鸦片战争之前中国闭关自守，中国大门被英国大炮轰开了，中国才有人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林则徐、魏源都变成“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了。

其实，如果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真的闭关锁国，就没有办法进行国际贸易。因为中国是贫银国，可是从明英宗正统元年（1435 年）开始，全国交易的主要货币就是银子，一直到 1935 年国民党政府废除银本位制，前后五百年。源源不断的银子从哪里来？主要是通过对外贸易得到，开始是从日本，后来源源不断地从美洲而来。哥伦布发现新世界，前三百年得益最大的不是欧洲，而是中国。有人估算，当时 50% 左右的银子都流到中国来了，用来换取中国的茶叶丝绸陶瓷等商品。

马国川：白银流入中国和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有关系吗？

朱维铮：没有关系。在哥伦布之前，中国海上交通已经非常发达了。



朱元璋得到政权以后,因为几个敌手都逃到沿海,所以朱元璋命令“片板不许下海”。但是永乐皇帝就突破了老子的禁令,派郑和的远洋舰队出海,一度接近了欧洲。哥伦布带着三条小船横渡大西洋,而郑和的一个旗舰上就能够容纳一两千人!可是有些大臣认为下西洋耗费钱财,以后就不准再搞了。当时“三杨当国”,毁掉了郑和的全部档案。还下令沿海地区把船底座都改掉,只能在近海航行,不能出远洋。

马国川:所谓“三杨”即杨荣、杨溥、杨士奇,他们受儒家教育,都是状元,被史家视为名臣,但是昧于世界大势,没有世界思维。

朱维铮:如果政府不禁止民间远洋航行,可能会有另外一个局面。中国曾经有过一个跟世界接轨的机会,但是那些儒学名臣看起来好像都是很不错的,也很清廉,其实思想非常落后,政策愚蠢封闭,不让民众接触外界,以此保持安宁。

哥伦布的目的是要到中国来,因为当时西方人认为中国是“黄金之国”。哥伦布至死没有到达中国,但是他开辟了美洲航线,西班牙占领了美洲,特别是富产银子的秘鲁和墨西哥。从美洲到菲律宾的航道开辟了,中国到菲律宾一直有航道。这样,美洲到中国的航道就打通了。中国的货物运到菲律宾,再从菲律宾把银子运回来。这支持了中国东南地区的经济。明英宗贪财,先从南方征收“金花银”,然后扩展到全国。虽然民间交易主要还用铜钱,但是政府征收用银子,这就增加了对银子的需求,因为银子有损耗,需要源源不断补充。

清朝入关以后,并没有改变这个政策。康熙为了对付郑成功,命令从浙江到福建到广东这一带沿海三十里以内的居民全部迁到内地,坚壁清野,从此大海上什么船只都没有了。禁海不过十多年,国内就出现了“银贵铜贱”,也就是通货膨胀。江苏、浙江的总督巡抚就向康熙上奏折,如果禁海令再继续下去,东南地区的经济就不行了,而东南地区一直是清朝的财富来源。收复台湾以后,康熙立刻就撤了“禁海令”。

马国川:中国实行银本位制,需要依靠不断增长的对外贸易获得银子,因此就不可能真正做到闭关锁国。

朱维铮:清朝初年,英国就开始和中国做交易,中国一直是“出超”,

英国商船不停地到中国来购买茶叶,但是又打不开中国的其他市场,只好从海外贸易,弄了银子跑到中国来换茶叶。后来英国商人以走私鸦片牟取暴利,走私鸦片影响了中国整个的利益,禁烟影响到英国走私商人的利益,所以鸦片战争非打不可。鸦片战争当然是外边打进来,但是实际上是跟整个中国的政策有关系。从明英宗开始三百年的历史不弄清楚,就很难知道后来中国的历史走向。

马国川:既然不能说鸦片战争前中国闭关锁国,那么也就不能说“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是林则徐或魏源。

朱维铮: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才睁开眼睛看世界,在这以前三百多年里,难道中国人只看见银子,中国人全都见钱眼开吗?

中国的中世纪,历法是非常重要的、非常神圣的,关系到皇权的观念。可是,自从明末徐光启主持改历以后,延续到清初,制定历法的最重要的部门——钦天监竟然都由西洋人主持!清朝在最反洋教的时候,天文官、占星官里还有西洋人。过去认为最仇视西洋的雍正,也没有废掉来自西方的历法。最后一个耶稣会士退休回国是1835年,也就是鸦片战争之前五年,中国的历法一贯都由西洋人制定。

一个建立银本位,一个制定历法,都和西洋人有密切关系,都在林则徐、魏源之前。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说中国睁开眼睛看世界从林则徐、魏源开始,我觉得都说不过去的。

## “如果不肯自己改革,别人就要起来颠覆你”

马国川:尽管鸦片战争前中国并非闭关锁国,但是中国改革确实是因为受到了西方的刺激或者启发。例如,康有为的改革思想就明显受到了外来的影响。

朱维铮:严格说来,第一个提出改革主张的不是康有为,改革思潮可以一直追溯到十九世纪。在十九世纪初期,包世臣就提倡整个官僚体制要改变。特别是1815至1816年龚自珍在《乙丙之际箸议》里就提出,挽救中国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自改革”。他警告说:如果不肯自上而下地主

动改革,那么别人就要起来颠覆你。

龚自珍还有一篇描写了所谓的“治世”。他说,现在大家都讲治世,治世跟乱世实际上是很难区分的。看似“治世”,其实乱境不远矣。因为现在的状况是,朝廷里边没有良相,军队里面没有良将,大臣都在混,知识分子不思进取。龚自珍说,现在这个世道,不仅仅没有想改变现状、没有能够改革的人,连草野的强盗、城市的小偷都没有杰出的!

马国川:《乙丙之际箸议》真是杰出的时代寓言。龚自珍当时才二十来岁,对时代的把握非常准确,堪称天才。

朱维铮:龚自珍的外祖父段玉裁从小就教育他,他的父亲也是一个著名的经学家。而且龚自珍生长在江浙,是一个思维很活跃的地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在修订《中国历史文选》时,保留了《乙丙之际箸议》的两篇文章,以后我专门写过文章予以介绍。我发现一些人回避谈论这个问题。

虽然十九世纪众多志士仁人提倡改革,但是满清王朝无动于衷,只是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才开始洋务运动,但还是在旧体制框架里活动。洋务运动讲“富国强兵”,结果国没有富,兵没有强,甲午战争,一败涂地。这就刺激了清朝的精英阶层,有一部分人想通过变法自保。

马国川:甲午海战极大地刺激了当时的各界人士,包括像光绪皇帝和他周围的一些人,积极主张变法维新,于是有了1898年的“戊戌变法”。

朱维铮:戊戌变法是突如其来的,因为“老调子已经唱完”,原来的日子混不下去了。“瓜分豆剖,渐露机芽”,列强提出来要瓜分势力范围。光绪皇帝和他的支持者要变法。当时慈禧已经还政光绪了,不好出来干预。慈禧是非常糟糕的一个人物,她对周围的那批人说,让他去闹,闹几天再说。这是我们中国一贯的思路,不仅仅是戊戌变法,从汉朝以后,有人要改革,其他人都是这种“看热闹”或者“秋后算账”的心态。

马国川:有人在干事,有人在看热闹。最后失败了,再收拾干事的人。改革者总是难有好下场。

朱维铮：戊戌变法的时候，光绪的思想是值得肯定的，可是他没有多少具体办法。变法要有一个总纲，找不到，结果非常奇怪地拿来了三十年以前冯桂芬写的《校邠庐抗议》。冯桂芬本来是一个进士，太平天国的时候逃到上海，当过上海翻译学堂的总办，开始了解西方，写了这部著作。《校邠庐抗议》其实就是洋务运动的设计书，非常具体。光绪皇帝就叫荣禄赶印了《校邠庐抗议》一干部，分发给中央政府六部和地方督抚，要求每一个衙门都根据《校邠庐抗议》和自己衙门的实际状况，提出改革意见。如果违抗变法，就要把衙门裁撤。为了自保，每个衙门都非常认真地做了。在戊戌变法结束以前，有关改革的奏折多达两百多万字。

马国川：冯桂芬 1874 年去世，没有想到二十多年后，他的著作竟然在戊戌变法中被采做改革方案。

朱维铮：戊戌变法很混乱，没有一个具体的方案，因为太匆忙了。诏定国是，并非是康有为的功劳，因为当时光绪确实想动员政府，按照龚自珍的思路实行一个从上到下的自改革。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洋务运动还在继续。戊戌变法以后最大的问题，就是有那么一帮人要恢复满清“以满驭汉”的旧例，用满洲人驾驭汉人。于是，一些非常保守愚昧的满洲人开始掌权。他们反对过去的一切改革，一边通缉康梁，一边打击国内的改革思潮。

马国川：从嘉庆到道光，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满清“以满驭汉”的旧例不断被打破。

朱维铮：确实，汉族大臣的权力比过去大了，总督巡抚地方势力也加强了，尤其在南方，在湘淮军阀的势力范围里，满人要做总督、做巡抚的话，也要得到当地汉族士绅的支持。所以，戊戌以后朝廷的倒行逆施遭到很多人的反对。慈禧就采取一个非常机会主义的办法，支持义和团，没有想到又招来八国联军，把整个朝廷赶跑了。慈禧太后和她的丈夫咸丰皇帝在清朝创造了两次丢失首都的纪录。

马国川：一次是英法联军把咸丰赶到了承德，一次是八国联军把慈禧赶到了西安。

朱维铮：慈禧不得不在逃亡的路上下诏要变法。她挟持了光绪，但是光绪始终不说话，慈禧就用光绪的名义“变法”。后来派李鸿章和八国联军谈判，谈判的一条底线是，允许不允许清朝现政府继续存在，说穿了就是慈禧集团，连同慈禧本人是否必须下台？八国联军谈判的条件，除了赔款以外，还要求清朝政府必须改革。这一条虽然没有正式写进和约里，但是研究近代史的人都承认有这样的协定。所以，慈禧为了自保，除被迫将煽动义和团的满汉大臣罢官，流放乃至处死外，又被迫在西安下诏变法，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成外交部。后来又废除科举，不再读四书五经，学习外国的东西也可以当官。在废科举的同时改学制，兴办新式学堂。废科举制就把中世纪王朝的基础给弄垮掉了。

清朝政府这么一搞，就等于自毁满清君主独裁的政体。所以我认为，1900年以后清朝政府已经名存实亡。后来慈禧太后不是公开宣称“量我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吗？

## 清政府变成了所有人的敌人

马国川：慈禧在庚子之变后推动改革，1906年甚至提出“立宪”，为什么没有成功？

朱维铮：立宪不过是做一个姿态，预备立宪原来规定十五年，后来被迫改成九年。为什么说立宪是假的呢？因为慈禧虽然口口声声搞立宪运动，可是连通缉康梁的命令都不撤销。而且在宣布立宪的时候，又增加悬赏，购买他们的头颅。

马国川：当时梁启超在海外宣布愿意拥护立宪，还搞了一个组织“政闻社”。

朱维铮：那个组织主要是和同盟会对立的。梁启超明明是帮慈禧，可是有一个政闻社成员要求实行立宪制时间改为三年，慈禧太后竟然马上把他处置了。这就足以证明，慈禧没有一点诚意！你起码要容忍人家说说，连说话都不行，不是假立宪是什么？慈禧之所以在1906年匆匆忙忙宣布立宪，还有一个原因，就是1905年孙中山、黄兴以及当时光复会一批

人在东京组成了同盟会。清朝政府急急忙忙宣布立宪,明白是对付革命党的。这种情况下,只能是假立宪。

当然,立宪运动也产生了一些后果。各省开谘议局,尤其是南方的谘议局士绅就现身了。这些士绅拥护变法,也害怕如果不赶快改革,革命闹起来他们吃不消,所以他们这些人真的是想搞立宪。但是地方上的态度也不一样,各地争的是本省权力,所以当朝廷要实行铁路国有时,地方谘议局都反对,要求本省所有。这说明,这些人都是从本土利益出发,愿意回到戊戌变法。但是朝廷连这一点都不赞成。

马国川:当时一些知识分子还是对清廷抱有幻想,梁启超就鼓吹“开明专制”。

朱维铮:1900年以后,对于清朝政府的垮台,大家基本上认为只是时间问题。所以梁启超拼命地支持预备立宪,还专门发表了长篇的文章呼吁“开明专制”。开明专制是欧洲早期提出来的,梁启超的“开明专制”很简单,就是“对上言仁政,对下言服从”,统治者要行仁治,老百姓要服从。

马国川:梁启超当时拼命要搞立宪,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对当时一个时代命题的应对之策,这个命题就是“改良和革命的赛跑”。改良要跑在前面去,不要让革命跑到前面去。

朱维铮:对,梁启超就是害怕改革落在革命后面。后来章太炎为首的《民报》和梁启超为首的《新民丛报》之间的论战,就集中在这个主题上。慈禧死掉,满清失去了一个主心骨;光绪死掉,立宪派失去了拥护的偶像。

慈禧在世时,毕竟头脑还比较清楚,限制那些满洲的贵族子弟,不让他们胡来。可是1908年慈禧死了,光绪也莫名其妙地死了,摄政王是个软弱无能的家伙,满洲权贵的那帮无赖子弟开始任性胡来,内阁改组后变成了“皇族内阁”,都是纨绔子弟去占领那些位置。

马国川:对于那些权贵来说,还是自己或者自己的子弟掌握权力放心啊。所谓的“皇族内阁”,其实是在民主大潮之下的“集体世袭”,纯属逆历史潮流之举。

朱维铮:清廷自己拆穿了立宪的假面目。这么一来,地方士绅就彻底

失望了,有些士绅就开始和革命党拉关系。所以,不到三年清廷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我在“文革”中因无聊而读历史,就很奇怪,为什么清朝把一个一个的机会都丧失掉了?把海军的银子弄去修颐和园,如果用来建立强大无敌的舰队跟日本打仗,就算失败的话,也算是有点贡献;戊戌变法,假如说不镇压的话,局部的改一改也比不改要好;扶植一个最落后的义和团,疯狂的仇洋行为除了把大多数真假“洋鬼子”推到了对立面,还有什么作用?《辛丑条约》让每一个中国人赔一两银子替慈禧太后赎罪,这涉及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即使最愚昧无知的人也会感到气愤:你胡闹了半天,为什么让我们给你买单啊?对于清廷预备立宪,革命党人不满意,海外的康梁等保皇党人不满意,地方士绅也不满意,结果清廷就变成了所有人的敌人。

就这样,满清一步一步地把自己弄到反面去了,成为所有人的敌人。所以说,辛亥革命不是偶然的,它是一个长而又长的过程。

## “中国的改造只能够通过中国内部的力量”

马国川:从1894年上书李鸿章失败后,孙中山就开始从事革命了,但遭遇许多挫折。为什么孙中山的革命在那么长时间里都没有显著成效呢?

朱维铮:当时搞革命的孙中山等人都是香港教会里出来的,接受洋教育,人们把他们叫做“洋鬼子”,没有什么人支持他们。孙中山从华侨那里募捐,收买一些帮会和新军,发动的武装起义都是在边缘地区。孙中山、黄兴等组织的十二次起义,除了最后一次黄花岗起义比较壮烈,影响比较大,其他都没有什么影响,在清朝看起来不过是“癣疥小疾”。当时革命党里也有争论,一部分人主张先搞长江流域的革命,孙中山唯恐脱离他的控制,不赞成。到了1908年,实际上原来组成同盟会的三个组织已经分裂。光复会首先独立,组织暗杀,给清政府很大震撼。它也联合帮会,组织起义。华兴会则开始联络湖南、湖北的新军,这些新军受过新式

教育。

当时的局面是,孙中山在两广一再组织起义,陶成章则在江浙策动帮会起事,宋教仁在华中鼓动新军起义。恰巧,武昌年轻的士兵造炸弹时失手爆炸,意想不到地引爆了武昌起义。当时四川爆发“保路运动”,大部分部队都开赴四川去了,武昌兵力空虚,又碰上湖广总督瑞澂是个胆小的纨绔子弟,率先跑掉了。假如总督是张之洞或者袁世凯,武昌起义都搞不成。

马国川:但是历史不能假设,一个小小的事件一下子引爆了全国性的反应,不到两个月已经有十八省宣布独立了。

朱维铮:这就证明,清朝垮台正如摧枯拉朽一般。当时孙中山在美国,财政资源没有了,人力资源也搞得差不多了,听到这个消息还不相信。国内拍电报催他回国,他还犹豫呢。孙中山回国后被十八省代表推为临时总统,1912年1月1日宣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清朝维持不下去了,于是袁世凯趁机逼清廷退位,延续近两千年的君主专制至此土崩瓦解。

所以,辛亥革命是在完全想不到的地方,完全想不到的时间,完全想不到的地点,突如其来地爆发,结果一下子清朝就垮台了。辛亥革命不是按照伟大领袖的“英明决策”进行的,根本没有战略部署。为什么看起来是那么高大的、维持二百六十多年的一个巨人突如其来就垮掉了?原来人们听到民国两个字都掩耳疾走,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觉得还是民国好?如果不从历史来说明的话,很难理解。

马国川:几乎是在一夕之间,一个已经存在两百多年的政权就被推翻了,这恐怕是辛亥革命给后人一大警示意义吧。

朱维铮:对。纪念辛亥革命,首先要把历史搞清楚。不能够变成只歌颂孙中山,只歌颂孙中山开启了民主革命的道路。从个人来讲,要恢复他的历史面貌;从辛亥革命来讲,要恢复辛亥革命时候的真正的革命力量原貌,把历史梳理清楚。

马国川:这些年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各种意见也都冒出来了,有否定



的,也有肯定的,各种各样的声音也特别多。

朱维铮:完全肯定的不稀奇了,是我们的主流。完全否定,我觉得不符合历史。一种代表性观点是“告别革命”,认为如果给予清王朝机会,是有可能立宪成功的。我不赞成这种观点。尽管像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现在没有人愿意中国再发生革命,但是,革命就存在于历史上,不承认也不行,告别不了。

马国川:从您个人研究看,辛亥革命到底给中国留下一些什么遗产?

朱维铮:辛亥革命的功劳很大,因为从秦始皇开始建立的君主体制,至明清时发展成君主个人独裁的专制主义政治形式,至此告一段落,以后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都是昙花一现而已。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年的帝制,是非常了不起的。

其次,辛亥革命说明,中国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力量来搞民主,这也是了不起的。

马国川:这个观点非常耐人深思,中国人通过自己的力量可以搞民主。

朱维铮:还在鸦片战争以前,已经有中国人提出来改造旧体制。中国人有力量可以搞民主。开始不过几个人,后来慢慢形成力量,形成一个政治运动,突如其来一个动作,一下子就变过来了。

第三,辛亥革命证明,中国的改造只能够通过中国内部的力量,当然也要争取外部的力量和支持,但不是由外部的力量来决定的。中国进入近代不是由于外国力量的推动,中国进入到现代也不是由于外国力量的推动。

中国的变化跟世界的变化是一样的。你看欧洲,假定从文艺复兴开始,一直到鸦片战争前后,欧洲的工业革命才完成,中间几百年啊。在我看起来,中国的历史从晚明开始有点变化,然后一路下来到辛亥革命,才不到三百年。从世界总的趋向来看,变化没有那么容易,这反而证明,变化必须要从内部开始,外力是没有用的,皇帝的力量也没有用,光靠一个人,或者几个人不可能变过来。

马国川：您怎么来看待从辛亥到现在一百年的中国现代化进程？

朱维铮：我的研究只做到五四，我把五四看作一个终点。共和国作为一个体制慢慢被接受，中国人要民主，最大的一次爆发就是五四运动。辛亥革命仅仅是一个政治上的改变，到了五四运动，不仅仅是要求体制的改变，而且要求整个民族精神改变。这个改变至今还在进行。

### “一个灰色的回忆不能够代替现在的生动和自由”

马国川：辛亥革命以来的一百年，中国有许多变化，也有许多地方在踏步。比如，至今仍然有些人将中国的前途寄希望于所谓的“开明专制”。

朱维铮：这几年的世界的经济危机，受损最大的是那些所谓先进国家。不搞政治改革、类似于所谓专制的那种国家反而能够比较快地度过危机，这大概是一些人推理的尺度。在我看起来，在历史上这种事例太多了，欧洲在搞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候，就认为专制比民主好。你看法国大革命搞得那么乱，后来恢复了帝制以后反而更好，拿破仑称帝后法国不是又强了？德国纳粹上台也是这样子，德国不是叫“国家社会主义”吗？有人就以为社会主义是好的，但是要国家控制。

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太多了，但是大家不要忘记历史的最后结局，法国最后没有变成世界第一号强国，希特勒的纳粹最终也没有逃掉垮台的命运。苏联不是也一样吗？从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历经内斗，变成斯大林的个人专断，在二战中对德胜利似乎证明了没有斯大林就没有社会主义苏联，但斯大林死了，苏共想改革已晚，折腾了三十来年终于解体。所以历史是一个过程，很难说通过这几年看清楚，或者需要几十年、上百年时间来看。

马国川：历史能够提供镜鉴，令人清醒。

朱维铮：我们要正视现状，也可以从历史里边汲取一点东西，但是我不赞成所谓“以史为鉴”的说法。黑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里已经讲过：一些人总希望把历史上的经验或者教训介绍给各国政府、各国统治者、各

国君主等等。但是历史证明,从来没有一个政府、一个君主、一个国家,从历史上吸取过什么。黑格尔讲了一句很聪明的话:一个灰色的回忆不能够代替现在的生动和自由。我在大学生的时候就对这句话印象非常深刻。黑格尔曾说,人们唯一能从历史中吸取的教训就是,从来没有人会从历史中真正吸取教训!

马国川:是不是有点太悲观了?

朱维铮:是太悲观了。这就涉及到我的职业,有一些学生总是问我:学历史有什么用?其实培根老早讲过,历史教人聪明。一个民族或者是一个人,从历史里边学到一点东西,变得更聪明一点,懂得在走路的时候,要看看前面,看看脚下,能够走得更稳一点,想想自己少年时候跌跤的故事,那不是很好吗?如果说是我们把真实的历史提供了大家,大家从这个里边受到一点启示,就是我们变得聪明的表现。至于说要模仿什么历史,黑格尔说,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一些人赶快想希腊罗马的先例,真是愚蠢极了。就像我们一样的,今天在搞现代化,回想秦始皇怎么处理问题,汉武帝怎么处理问题,在我看来非常糟糕。所以,我不赞成所谓的国学,不赞成提倡所谓的国粹。我赞成学点真实的历史,更赞成对我们过去的历史展开充分的研究与争论。

马国川:但是反对以史为鉴,反对国学。

朱维铮:对。我教了很多年的史学史,确实是感觉到黑格尔的那句话说得很聪明。列宁在《哲学笔记》里边把黑格尔的这一段话抄录下来,还写了一句评语:聪明极了!

马国川:另外,这些年在研究晚清史、民国史、五四史时,仍然有很多人愿意拿着晚清那段比附今天。

朱维铮:在我看起来,比附今天有一个前提,就是要把历史事实搞清楚。其实到慈禧太后的时候,中国的对外贸易还居世界前列。中国对外贸易的数额那么大,证明当时中国没有什么全面的闭关自守,也证明了并不是因为社会经济落后而挨打。满清确实落后,但是要讲清楚哪一方面的落后?从贸易角度来看,经济方面当时中国在上世界上还是领先的。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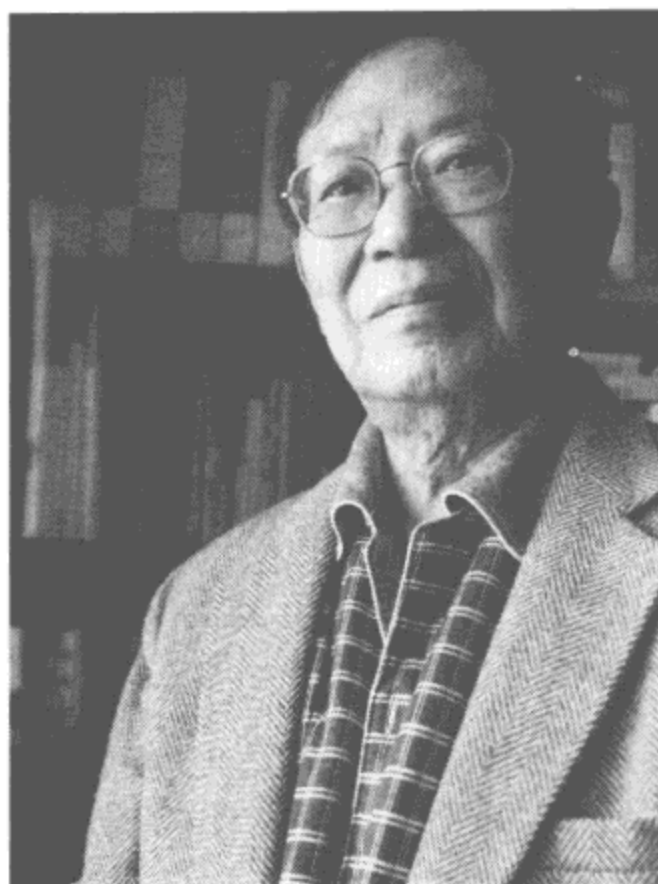
体制来看,确实是落后的,统治者的思想也是非常落后的,对世界的认识那么闭塞,但是不能够讲整个中国是落后的。

谈辛亥革命,我希望先了解它的前奏。近年来我重读近代史,就是希望了解,从明朝晚期一直到五四运动,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希望把历史弄清楚。近代以来的有些历史真相被歪曲了,需要重新认识。没有对历史真相的了解,就不可能有对历史的真正了解。中国近代史证明了黑格尔的名言,“人们唯一能从历史中吸取的教训就是,人们从来都不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采访时间:2010年6月28日下午

采访地点:上海 复旦大学 光华西楼





## 再议辛亥革命

### 李泽厚

著名哲学家，湖南长沙人，生于1930年，1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巴黎国际哲学学院院士、美国科罗拉多学院荣誉人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和哲学、美学研究。主要著作有：《批判哲学的批判》、《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美的历程》、《华夏美学》、《美学四讲》、《世纪新梦》等。

## 采访手记

客厅的东墙上悬挂着一副对联：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刚日读史，柔日读经。

这是冯友兰书赠李泽厚的，反用了曾国藩的名句“刚日读经，柔日读史”。遥想二十五年前，李泽厚的“西体中用说”遭到一片反对声音围剿之际，九十岁高龄的冯友兰先生坚定地赞成李泽厚的观点。冯先生已经辞世二十年矣，李泽厚也已进入八十岁老人之列。

2010年中国学界的一大盛事，就是数位学术泰斗先后度过了八十华诞，包括经济学界的吴敬琏、厉以宁，法学界的江平，历史学界的资中筠、袁伟时，还有海外的许倬云、余英时。就在笔者拜访李泽厚先生前不久，几个学术机构举行活动联合为他祝寿。

“我向来不参加这样的活动”，李先生告诉我，然后幽默了一句，“但是吃饭时我去了。”他有一个“三可三不可”原则：可以吃饭，不可以开会；可以座谈，不可以讲演；可以采访、照相，不可以上电视，“因为后者太正式，前者都属聊天，愿意聊什么就聊什么，随意得很”。

李泽厚穿着睡衣，坐在躺椅上，神情悠然地和笔者聊着天。他说自己个性孤独，“从小见不得生人，总往后躲，大人骂我‘出不得世’。几十年散步都是一个人，连太太也不让陪”。

他戏称自己有三个“毛病”：一是记不住面孔；二是记不住声音，有次儿子来电话也要“报上名来”；三是记不住路。他还回忆起五六十年代被扣过三个“帽子”：一是不接近群众，二是不靠拢组织，三是不暴露思想。在当时，这些都是很严重的问题。

虽然经历了多次“批判”，但是他个性不改，依然固我。在学术思想上他也同样的“固执”。十五年前他提出来中国现代化的“四顺序”说：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当时反对意见很多，被人骂

得一塌糊涂。可是李泽厚至今还是坚持“四顺序说”。

“我把政治民主摆在最后，当时大部分人都认为应该把政治民主摆在第一条，先搞政治民主，经济才能发展，我从来就不赞成这个看法”，李泽厚坦率地说，“20世纪80年代我就认为（老实讲这是马克思的理论）经济基础最重要，政治民主今天搞成了，经济基础不改变，一夜之间就可以回到专制，这在非洲有很多的例子，菲律宾、海地搞政治民主也搞得一塌糊涂”。

在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之后，面对巨大的社会公平问题，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们的共识。甚至连温家宝总理也在多个场合重申邓小平的名言：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成功。很显然，“仍然赞成邓小平说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李泽厚确实有些过时了。

不过，李泽厚仍然在密切关注着中国的现实发展，而且有些新的思考。当我问“中国道路应该怎么走”时，他回答说：“重要的不是‘中国往哪走’，而是‘不往哪走’。三十年代德国走过的路，是当前中国往何处去的最危险的一个方向，大讲‘中国模式’就有这个危险。”

如果未来中国真的陷入历史劫难，我们至少可以说，曾经有人发出过警告。真正的思想就像金子，是不会永远被埋在黄沙之中的。

真正的思想家，他的思想是可以照亮一个灰暗时代的。李泽厚就是这样的一个思想家。



## 辛亥革命的成功是非常偶然的

马国川：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近年来对于辛亥革命的评价呈现出多元化的局面。明年将迎来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作为一个思想家，您对辛亥革命有何评价？

李泽厚：在辛亥革命之前，清政府已经在进行改革，也有可能实现宪政。

马国川：当时确实制定了许多法律，甚至新闻法都有了。1906至1908年，清廷相继颁布了《大清印刷物专律》、《报章应守规则》、1907年颁布了《报馆暂行条规》、《大清报律》，构成了比较完备的新闻法律体系。

李泽厚：这些法律明确赋予国民以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利，相当不错。另外，很多主要省份都有了谘议局，议会已经成形，而且很像个样子了。各地立宪派已经大体长成，许多新的制度、机构、规则也在不断建立、筹划和实行。

马国川：问题是，为什么改革被革命取代了呢？

李泽厚：清朝准备立宪，原来设为九年，大家觉得太长了，后来改成五年，革命党还是认为太长。就在这期间，也就是在1908年，慈禧死掉了。

为什么呢？因为辛亥革命的成功是非常偶然的。武昌起义后，清廷派袁世凯去镇压起义军。北洋军队把汉口、汉阳打下来后，袁世凯就按兵不动，开始和清廷讨价还价。假如慈禧在世，袁世凯根本就不敢这样做。慈禧有权谋，能够统帅、控制比袁世凯的权势大得多的曾国藩、李鸿章等



人,在慈禧面前,袁世凯是非常畏惧的,根本不敢心存异想。所以,如果慈禧活着,即使发生辛亥革命,很快就会被慈禧压下去的。

马国川:在您看来,辛亥革命能够成功是非常偶然的。

李泽厚:非常偶然啊。

马国川:我自己可能是受到一些宣传的影响,所以总觉得,包括辛亥革命在内的革命运动,如果仅仅归结于一些历史偶然性的话,似乎有些不妥。比如,我很难理解,太平天国搞了那么长时间也没有成功,可是到辛亥年间,为什么偶然事件一夜之间就令一个庞大的封建王朝分崩离析了呢?

李泽厚:其实,太平天国也有成功的可能啊。假设当年洪秀全打下南京后不是急于称帝,而是直取北京,就可能改朝换代。但是,洪秀全定都南京,杨秀清也不再亲自带兵打仗,派两个部下北伐,援兵也接济不上,北伐部队被消灭了。这两个错误是致命的,再加上内讧,北王韦昌辉杀了杨秀清东王府两万人,那都是主要人物,不得了。从此,太平天国就走向了末路。

马国川:但是到辛亥的时候,为什么能够打垮清廷呢?

李泽厚:那时人心已经完全丧失了。不管哪个党派,不管哪个利益集团,都觉得清廷不行了。就像在1948年前后的蒋介石,包括他的高级军官都感觉不行了,军心已经涣散了。辛亥时更是如此,所以一场武昌起义就摧枯拉朽一般地打垮了清王朝。

我不赞成金观涛的“历史超稳定结构”说。他们认为所有都是必然的,“文化大革命”也是必然的。不对,没有那么多历史必然。秦始皇统一中国,为什么一定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不一定,世界上也没有那么多必然的事情。历史就是这样的,有时候一两个人就可以决定历史。特别是在军事、政治上,偶然性很大。

马国川:那么,在您看来,什么是必然的呢?

李泽厚:只有经济是必然的,因为人都希望活并且改善生活。当然,经济也有倒退的时候。玛雅文化的消失,可能是因为它的宗教信仰使经

济衰败而灭亡的。经济倒退,历史上也常有这种情况。但就人类来说,是向前进步发展的。

整体来说呢,政治、军事的偶然性大许多。所以,一部历史常常就是一部政治史帝王将相史,有些人很不平,主张应该是平民老百姓的历史。其实不对,为什么?因为就是这些政治当权人物对历史起了不可推卸的极为重要的作用。所以八十年代我对那种把什么都推到文化上的说法,极不赞成。文化人人有责,但政治是政治领导人的责任,搞出一个坏政府,甚至导致天下大乱,政治家有最大的责任。

## 在改革中,一定要保证政府的稳定

马国川:我有一点疑问向您请教。如果慈禧早死十年的话,戊戌变法可能成功,这一点我赞成。但是,慈禧晚死十年会造成什么局面?我觉得恐怕难说,难道中国真的会走上宪政道路吗?

李泽厚: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有充分的材料根据。其实一些学人的论著文章中也有这种看法,并非我的独创,但没有我这么干脆明确罢了。

慈禧死后,清廷搞皇室内阁,是非常愚蠢的。慈禧太后不会干这种蠢事,她在世时重用汉人。你看,她多么信任李鸿章,重用张之洞,谈判都是让李鸿章出马。慈禧太后也不会推出“铁路国有化”,引起保路风潮。

马国川:所谓“铁路国有化”,其实就是“国进民退”。它导致四川发生保路运动,湖北兵力被调进四川,武昌起义时湖北兵力空虚,这是革命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李泽厚:所以,一个最高领导人的能力、智慧是非常重要的。

马国川:慈禧可能不会做许多蠢事,可是她的改革底线也是有限的,能够设想她交出权力吗?

李泽厚:只要给予充足时间,变化就会发生。慈禧废科举是不得了的事情,谁也不敢做,她做了。废科举,斩断了知识分子千百年来传统道路,等于斩断了当时皇权制度的基础。她能够做出这等大事,还有什么不可设想的呢?那真是向世界看齐啊。

马国川：但是当改革涉及到她自己的利益的时候……

李泽厚：只要保证她的利益，可以慢慢来，她搞开明专制也可以。在和革命党论战时，梁启超提出“开明专制”，当时清廷搞立宪还与梁暗通消息，与梁商议，尽管梁是被慈禧通缉的戊戌要犯。在改革中，一定要保证政府的稳定。慈禧死后，一帮子蠢材搞“皇族内阁”，集中权力，排斥汉人，引起普遍不满，让革命党钻了空子。如果慈禧在世，不会推出“皇族内阁”之类的愚事。但历史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只有三五十年，三五十年等于历史的一瞬间，机会很容易就错失掉了。

马国川：如果慈禧还活着，好，给她十年时间，总之她是要死的，一旦她死掉之后呢？

李泽厚：她的继任者权威递减，慢慢的权力就可以更快地和平让出来。辛亥革命起来袁世凯又不肯保驾之后，皇室提出，只要保证我们的安全，不搬出紫禁城，其他的都给你们。根本没有动什么武，一个王朝就瓦解了。

马国川：但是，在慈禧死后，清王朝已经岌岌可危、朝不保夕了，为什么就不能搞革命加速其垮台，而要维持一个眼看着要垮了的政府呢？

李泽厚：一个要垮的政府也比没有政府强，无政府是最可怕的，因为任何人可以干任何事情。一个国家没有一个最高权威，任何地方军阀、任何个体都可以为所欲为，社会就会重新陷入野蛮杀戮的“丛林状态”。

马国川：如果进一步，是不是可以说，一个恶政府也比无政府要好？

李泽厚：对，但最坏的是无政府。无政府是什么？就是任何人可以杀任何人。清政府垮台以后，尤其是袁世凯去世后，中国不就是陷入了长期的军阀混战吗？

马国川：辛亥革命开启了以后的几十年革命。

李泽厚：对，不断地革命。辛亥革命的胜利是一个偶然性事件，然后形成了很强的历史惯性。不要以为清政府是一个力量非常小的体制，它在人心中还是有很大作用的。以中国之大，人口之多，观念差异之大，各种利益的冲突、各种情况的不均衡等等，要重新建立一种统一的公认的权

威、体制,谈何容易!清政府被打倒以后,军阀们都想当“总统”甚至皇帝,人们无所适从。

马国川:经济史也证明,民族工业发展最快的时期是那些社会较少动荡的非革命的时代。在这个意义上是不是可以说,辛亥革命打断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李泽厚:对,打断和延迟了。我已几次具体提到某些学术论文比较辛亥前后论证了这一点。

马国川:辛亥革命从反面证明了,实际上改良比革命要好?或者说,辛亥革命以自己的方式否定了革命?

李泽厚:对啊,很可惜,本来挺好的。

马国川:所以,您对一生坚持维新改良的康有为的评价还是蛮高的?

李泽厚:对,革命党当时骂他保守,连他的学生梁启超都开始倾向革命了,只有康有为依旧坚持改良思想。因为谁也没有想到,光绪和慈禧一天死掉。如果不是这样,慈禧死后,光绪亲政,康有为就很有希望了。所以光绪之死,是对康有为的最大打击。

马国川:康有为死后也不得安宁啊。文革的时候,红卫兵把他的墓挖掉了。

李泽厚:现在对梁启超、严复、章太炎都评价很高,对康有为的评价很不够,很不公平。但历史会越来越清楚。

马国川:看来,将来对康有为这样的历史人物还会有新的评价。

李泽厚:肯定会有,过十几年或几十年以后。

马国川:其实这些年已经开始在变化了。比如说,现在大家对清末的宪政运动的评价越来越高了。

## 辛亥革命留下的主要是思想上的意义

李泽厚:但是,我也要强调一下,也不是说革命没有带来一点好处。

革命至少带来了平等的观念,带来了社会正义的观念。辛亥革命也好,毛泽东的革命也好,至少强化了平等、正义的社会观念。所以,革命也不是完全坏的事情,主要是代价太大了。

马国川:您主要是从代价的角度来评价革命。

李泽厚:如果不革命,社会本身可以更好。法国大革命多少年,结果让英国跑到前面去了,因为英国政权稳定,建立了比法国更稳定、巩固和适应性强的政治体系和制度,发展更平稳。但是因为没有经过革命,英国人的等级观念很强。你看描述上世纪三十年代电影,这都是没有革命的坏处。但比起来,多少人头多少血,反而延缓了社会的发展。

马国川:在欧洲,法国和英国是两个典型国家,走的是完全不同的道路;在亚洲,中国和日本的道路选择也是明显不同的。

李泽厚:平等、正义的社会观念,中国现在还是比日本贯彻得要好。这是拜革命之赐。在中国,平等、正义的社会观念比较广泛地被大家接受。从前,梅兰芳等戏剧名流,即使名声再大也是与妓女同列的“倡优”,有身份的人是不能与之往来的。1949年之后,他们的社会地位改变了,成为“人民艺术家”。你看在印度,到现在许多人仍然认为,人就应该是不平等的,有些人生来就是贱民,低人一等。所以说,革命也是有好处的,不可一笔抹杀。

马国川:上世纪的中国,一味地提倡革命,肯定革命,歌颂革命。而现在有另外一种倾向,就是完全否定革命,认为革命就是群氓的盲目运动。

李泽厚:不对,如果这样的话,革命党根本不可能取得天下。我反对把革命神圣化,也反对把革命丑陋化。革命中有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崇高事迹,具有重要的伦理学的教育意义,尽管并不一定符合历史规律。

现在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很多人都是用情绪左右自己的判断。不管是对现实问题,还是历史问题,都带有情绪,尤其是以对现实的情绪来研究历史问题,这是得不到真正的客观真理的。我们要理智地、冷静地、客观地对待历史和现实。不能因为今天的问题而否定历史,也不能因为历史而无视现实的问题。对具体历史事件和人物要具体分析和对待。非

常明显,现在一些人对现实的情绪左右了他们对历史的看法。要么左,全盘肯定革命,要么右,全盘否定革命。

马国川:对于孙中山这个革命党人怎么评价?

李泽厚:台湾说孙中山是“国父”,大陆称孙中山是“革命先行者”,因为都有现实的政治利益在内。真正客观评价,要过二百年以后才能做到。

马国川:前不久,有一位历史学家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说,孙中山就是一个空头革命家,没有什么建树,而且与外国签订一些“密约”。

李泽厚:这种批评过头了。孙中山作为一个有理想的年轻人,还是很了不起的。他说过,第一是爱革命,第二就是爱女人,第三是爱书。他的确为革命奔走奋斗,愈挫愈奋。孙中山为了革命与外国签订一些“密约”,这是可能的。但是他也可以以后不认账,因为搞政治的人常常是言行不一、口是心非的。

也有人批评孙中山的思想前后不一致,这也是把政治家错看成了思想家。政治家不讲究思想的什么系统性一贯性,他们和书斋的学者是不一样的。他们的思想言论随时势变化而不断变化,甚至出尔反尔。这对学术研究却是不允许的。

革命不是孙中山一个人干的,辛亥革命是很多人一起掀动起来的。所以我讲,有革命党是必然的。

马国川:有革命党是必然的?

李泽厚:有革命党、有革命思想甚至有革命是必然,因为清末政治腐败非常严重,连梁启超也讲革命,梁启超是为了推动改良而讲革命。但革命成功却并无必然,是相当偶然的。

马国川:您在八十年代讲“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辛亥革命时,革命和改良的竞争局面,是否也是“双重变奏”的一部分呢?

李泽厚:二者是不同的。辛亥革命主要是政治上,我所讲的启蒙不完全是政治上的。启蒙讲个体的自由、个性的解放,和政治不是直接相关的。“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虽然我是从辛亥讲起的,但展开是从“五四”讲的。

辛亥革命确实也有救亡和启蒙的问题。当时,革命党认为清政府出卖汉人,已经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了,要救中国必须把清政府推翻。这就是救亡。陈天华的《猛回头》呼唤的就是救亡,压倒了邹容《革命军》宣传的启蒙。结果,名义上建立了民主共和国,但并无意义,各方面比过去还糟。袁世凯不也想做皇帝吗?因此“五四”才大讲启蒙,但后来又被救亡压倒了。

马国川:中华民国这种体制的建立,就是辛亥革命的产物。我记得鲁迅先生说过,“只要中华民国存在一天,就是他(孙中山)的丰碑”。

李泽厚:只有名义上而没有实质上的丰碑。辛亥革命留下的只是思想上的意义。遗憾的是,民主共和的思想始终没有落实下去,没有成为政治制度。如果能够落实成为制度就好了,那就有宪政了。

马国川:为什么没有落实成为制度呢?

李泽厚:因为没有建立新制度的基础。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势力的基础。所以张謇说过,革命成功了,革命党就没有了。思想是留下了,这是思想史上的一个花朵。革命思想有它的伦理学价值。

马国川:革命思想的价值体现在什么地方?

李泽厚:就是说,坏的东西一定要推翻。社会总是需要一种批判的力量。任何一个好的社会,激进的批判力量作为思想表达,都是应该允许的。

马国川:您对于革命思想、革命理想,主要是从思想的角度上来加以肯定。

李泽厚:要笔的自由,不要枪的自由。笔的自由包括百家争鸣、互相争论。百家争鸣好久不提不讲。

马国川:笔的自由就是革命理想、革命思想。枪的自由那就是革命暴力、专制杀戮。

李泽厚:你理解的很正确。双方都是开枪杀人,血流遍地。

## 要重新评价辛亥革命

马国川:您在早年写的一篇文章里面讲到,中国近代以来的六代知识

分子,第一代就是辛亥一代。您对那一代知识分子怎么评价?

李泽厚:这一代时间跨度比较长,从康有为、孙中山到鲁迅、陈独秀都是,康有为是旧式的知识分子,陈、鲁后来就是所谓的第二代了。但是,第二代知识分子基本上都参与了第一代的活动,像鲁迅在辛亥革命之前就跟着那些革命党在一起。第一代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时候,好多人还是清朝的举人、秀才。像章太炎为什么那么出名?虽然他“没功名”,没参加过清朝的科举考试,但他旧学功底深厚,号召力影响力当然很大。第一代知识分子是新旧交替的一代。那是非常新的时代,可是大部分知识分子还是举人、进士、翰林,像蔡元培。

到五四这一代就不同了,因为没有科举了。

马国川:五四一代就是新的东西占主流了。但是随着时代的转变,激进的思想开始增多。

李泽厚:是啊,到第三代知识分子,就是1927年所谓“大革命”的一代了。其实,第一代就开始激进,孙中山就是第一代知识分子。

马国川:激进的思想越来越成为一个主流,这种激进也是有它的合理性的。二十世纪里,中国差不多有四分之三的时间都是在革命。

李泽厚:而且革命成为一个神圣的口号,革命就是好的。十多年前,中国最大的罪就是“反革命”罪。革命被神圣化,不可侵犯了。我提出的“告别革命”,就还是从辛亥革命讲起,主要便是针对辛亥革命。

马国川:有些人批评说,八十年代您是思想启蒙的导师,而后来您越来越趋于保守了。您提出“告别革命”,在有些人看来,就成为了一个守旧者。

李泽厚:我本身是革命的参加者,我有资格“告别革命”。四十年代我在湖南参加学生运动,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在军警林立戒备森严中,我曾经把鞋底纳起来里面夹着的是油印的毛泽东的文告。万一被人怀疑抓起来,命都可能保不住了。所以我曾经对的学生说,不怕死有什么了不起,我就不怕死过。但不怕死的崇高伦理价值并不能等同、替代或保证历史的必然进程。



马国川：当年您参加革命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被某些人鼓动和煽动的。

李泽厚：是自己选择的，我的基本思想都是自觉判定，不是别人灌输的。我比较顽固，二十年前的观点现在还是认为不需要改变。

尽管被人骂，直到现在我还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讲的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前提。这并不是经济决定一切。我十五年前正式提出社会发展的四顺序：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被海内外一些人骂得一塌糊涂。在美国和一些学者争论，他们批评我是“经济决定论”。因为我把政治民主摆在最后面，把经济发展摆在第一条。我认为，其他是软道理，只有经济发展是硬道理。这倒仍然是马克思的影响。

马国川：对于马克思的革命理论，您有了新的认识。

李泽厚：是的，对革命的认识，我的确改变了。当年我崇拜的是激情和理想，抱着实现一个真正的民主新中国的信念而愿献身革命。真正对革命的动摇是在“文革”之前，“文革”时候我对革命的信念彻底垮台了。我发现，“文革”不就是法国大革命吗？为什么一定要革命呢？革命为什么一定就是好的、就是正确的呢？于是开始了对革命的怀疑。

马国川：实际上，您对革命的怀疑是在“文革”期间完成的，到世纪末提出“告别革命”。

李泽厚：在八十年代后期我也讲过类似的意思。那是在广州，我说：辛亥革命不一定成功，戊戌变法不一定失败。当时有报纸登出来了。到1995年正式提出“告别革命”，并不是偶然出来的，不是随便讲这么一句。

马国川：那本书是1995年出版的，世纪末，正好是对二十世纪的一个回顾。

李泽厚：那本书的副标题就是“回顾二十世纪”。《告别革命》这个标题是我起的，原来的标题不是。我记得那天开车回去，在路上突然想起刘再复有一本书叫做《放逐诸神》，两个书名正好做个对仗。

马国川：对今天中国来说，您的“告别革命”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现在主流仍然在鼓吹革命是神圣的。

李泽厚：国内外都有人批判我的观点。有些人只知道书皮，根本没看书（范用语），有些人是没有看懂。有些人说，共产党是靠革命起家的，你反对革命就是反对共产党。这算什么道理呢？如果现在再发生革命，是革谁的命？我认为，再革命更麻烦，现在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取代现在的执政党，长期的无政府状态，特别在地广人多的中国，是最可怕的。二十年前我就说了这话。有文字为证。

## 改良不是投降，而是尖锐的斗争

李泽厚：梁启超是为了改良而讲革命，我讲告别革命是为了能够慢慢改良，中国太难改变了，就像鲁迅讲的，“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你声称要把屋子拆了，最后人家才同意你开个窗户。

马国川：以激烈动作促进改革。

李泽厚：对啊，我是承认有阶级斗争的，而且主张一定的阶级斗争，但是不主张推翻政权，不主张打着各种旗号的流血革命。我讲过，改良不是投降，而是尖锐的斗争。

马国川：但是，阶级斗争一旦搞起来，是很难控制的。

李泽厚：就是看双方的力量对比怎么样，还有就是主观的决策和方式。

马国川：阶级斗争一旦发动，个人意志很难控制的。中国毕竟已经有了将近七十年的革命传统，很容易回到老路上。

李泽厚：有些人反对我的“告别革命”，我就反问，现在革命怎么“革”法？上山打游击、城市大暴动、还是哄抢企业家的财产？这样革命就会成功？不，我看会彻底失败。而且还弄得人心惶惶，社会一团糟。

马国川：您还是保持乐观态度的？

李泽厚：悲观也没有办法呀，所以只好乐观一下。还是要寄托于经济发展，经济形势对执政者不利，就要改革。发展经济就要与世界接轨，现在不接轨也不行了。

马国川：有些人之所以批评你，因为他们认为你现在成了保守派了，你的观点就是为现实辩护。你不让我们搞革命，你还要搞改革，可是改革又改不动了，变成了一个既得利益者的天下了。

李泽厚：为什么一定就能判定改革已经改不动了呢？关键在于，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什么政治力量能够取代执政党。共产党发个命令，可以贯彻到远方的乡政府、居委会，都有效，所以外国人很惊叹中国的效率。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这么快的发展，和这种体制很有关系。不管怎么样评论改革开放这三十年，再抱怨，整个社会都得到好处，这是不能否认的。中国是一个大国，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并不容易，这是一个基本事实，不能否认。这三十年也碰到过改不动了的时候，后来不又动了吗？为什么一定说改革就是死路一条呢？

马国川：也不能否认存在的问题。

李泽厚：我觉得，现在的问题是要警惕停滞和倒退，要大声疾呼让大家注意，这就是改良中的斗争。

马国川：我同意您的看法。但总觉得您的这种理性的冷静，令人有冰冷的感觉。

李泽厚：情感上难以接受吧？但理性和情绪比较，理性是比较可靠的，情绪是不可靠的。人们经常有两个问题，一是情绪左右思想，二是缺乏具体思维。要革命却不想如何具体革，也讲不出来，结果是空洞的口号，只有发泄情绪的意义。应该吸取历史的教训。

马国川：如果说，毛、邓是强人政治，那么此后就是常人政治了，权威在衰退。现在有些知识分子认为常人政治太平庸了，他们期望有一个铁腕人物，来推动改革。人们觉得改革没法向前走了，所以呼唤强人的声音又出现了。

李泽厚：正如当年严复、杨度等人寄希望于袁世凯一样。其实，常人政治是比较好的，真正的强人政治反而很危险。铁腕人物可能干好事，也容易一下子闯大祸，局面难以收拾。我完全不赞成呼唤强人政治，历史已经证明，把国家民族的希望寄托在个别人身上太危险了！

有人说,革命容易,改良却难。革命其实并不容易,而改良则的确更难。现在革命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关键就是怎样做一些具体的事情。现在就应该大声疾呼落实“非公经济三十六条”,让民营经济有一个大发展。我还是注重以经济力量来影响和推动改革。以经济发展推动政治制度逐步地改进,比较可靠。同时,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也尽力而为。如果这样,还是很有希望的。

采访时间:2010年10月17日下午

采访地点:北京 东城区 李泽厚寓所





## 革命不是制造出来的

## 章开沅

历史学家。浙江吴兴（今湖州市）人。1926年生于芜湖，1946年10月入南京金陵大学历史系，后于该校肄业。1948年12月在中原大学政治研究室当研究生。1949年7月随校南下武汉，在教育学院历史系任助教、教员。1951年9月入华中大学（即今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1985至1991年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主要从事辛亥革命研究，兼及中国资产阶级、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主要著作有《辛亥革命史》（三卷本，与林增平共同主编）、《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等，并主编《辛亥革命史丛刊》、《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丛书》等。

## 采访手记

曾经，章开沅和末代皇帝溥仪对面而坐，在一张办公桌上办公。

那是在1963年，当时是华中师院青年讲师的章开沅被借调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帮助搜集资料，碰巧与“末代皇帝”溥仪同被分在“北洋资料组”。在章开沅的记忆里，“已经退位了的溥仪，已经没有了皇帝的贵气，穿衣打扮有点像龙须沟里的‘叫花子’。那时候我们有个约定，在公开场合不叫对方的真名，以此避嫌”。

给章开沅印象最深的，是皇权思想遗留之深。溥仪告诉他，有的老北京人见到溥仪腿就软了，就磕头。章开沅的祖上与章士钊有交往，他在章府亲眼看到，一位来自京郊的老人进门后就给“章总长”（章士钊曾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磕头。

“我们对这代人应该有一些同情的理解”，章开沅先生笑着说，“不能简单地斥责为落后反动。”

深秋的桂子山上，处处绿意浓浓。我坐在章开沅先生的办公室里，听他讲述经历的往事。八十四岁的老人精神健旺，娓娓道来。我仿佛看到，片片历史烟云在他的脑海里飘过。

这是我第二次采访章先生。第一次是请他谈中国的大学教育，他剀切陈词，直指时弊。八十年代章先生在担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时，公开鼓励老师和学生自由思考，创造思维。这一次，他谈的是辛亥革命，因为他是辛亥革命研究的权威。

其实，章先生的研究视野远比辛亥革命更广阔。1987年，正在研究中国教会大学史的章开沅在耶鲁大学图书馆查阅资料时，意外发现了他在金陵大学读书时的老师贝德士先生生前所保存的全部文献。让他更为惊讶的是，该文献保留了许多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珍贵原始资料。他从中整理并复印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珍贵史料一千余页，后来出版了《南京

大屠杀的历史见证》和《南京：1937.11—1938.5》两本书，在国际上引起很大反响。

心事浩茫连广宇。章先生关注历史，也关注中国的当下。他认为，中国面临一个“槛”。“这个槛不过的话，没有希望的。这个槛不好过，但迟早要过。”

与许多历史学家不同的是，对人性的回归与社会伦理的困惑，探究，思索，是章开沅认为下一个百年中国人最需要解决的事。他说：“大家对政治体制方面期望很多。人性不回归，任何政治体制改革都会成为一个新瓶装旧酒。”

章开沅关注人性并非偶然。早在四十年代，章开沅就从金陵大学历史系系主任王绳祖先生那里听到过汤因比的大名。八十年代中期他读到了这位历史学家的名作《历史研究》。后来又阅读了《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我一看更加佩服了。他们对话时，我们还处于‘文革’的蒙昧无知时期呢”，章开沅感慨地说，“我们后来所忧虑的问题，人家早就忧虑到了。”

从此，章开沅开始思考人类面临的各种危机。章先生坦言：“我现在的思路比原来更开阔，更放大了，原来是考虑危机本身，现在考虑的是怎样改变危机。”他关心的是人类的命运，“危机是不是还有改变的可能，人类是不是注定要自相残杀，自我毁灭？”

章先生说自己是“审慎的乐观”。他预言，人类可能出现第二次文艺复兴的局面。它跟一般所讲的“思想解放”不是一回事，它将是“第二次人的发现”，是人性的复苏。



## “改革一经启动,就要继续往前走”

马国川:近年来,人们对于辛亥革命的评价和以前有很大不同了。作为历史学家,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呢?

章开沅:对于辛亥革命的评价确实与以前不同了,有升有降。“升”是因为政治的需要,海峡两岸需要寻找共识,尤其是大陆方面比较重视辛亥革命;另一方面,一些真诚的学者发掘了过去没有注意到的资料,通过研究逐渐深化理解,对辛亥革命又有些新的认识。

马国川:一个新认识就是对“晚清新政”给予了积极评价,不再像过去那样完全否定,指责晚清的一系列改革措施都是骗人的。问题是,在二十世纪开始的前十年里,一方面执政者在推动改革,一方面革命的力量也在聚集,于是中国出现了“改良和革命赛跑”的局面。为什么改革跑不过革命?这种赛跑的局面,是不是必须通过革命才能解决?“

章开沅:赛跑的说法很客观、很形象,看哪个跑在前面,结果是败者出局。对于晚清十年新政,现在评价逐渐接近客观了,但是也有一种倾向,就是盲目地用一种翻案的方式全面肯定新政。

不能否认,晚清十年新政有好的一面。清王朝之所以要搞新政,也是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因为朝政鱼烂,国内老百姓不允许再等下去了。八国联军进北京,太后、皇帝仓皇西逃,大清王朝的脸面已经丢尽了!庚子赔款等于每个中国人负担一两银子嘛,这不是最大的侮辱吗?在这种情况下,实行改革不失为一个聪明的决策,某种程度上改革也成为社会共识。

马国川:其实清朝此前已经丧失了一次机会,如果1898年的戊戌变



法能够成功,本来有可能开辟一条新路,就像日本的明治维新那样。

章开沅:戊戌变法之前,清王朝也在试图改革。慈禧太后是晚清帝国的实际掌权人,她有魄力,做事比较果断,所以她敢于用汉人,以团练取代绿营,以新军取代了团练,一步一步地拨动了改革的枢纽,这就是“自强运动”。

改革一经启动,就要继续往前走,自强运动之后才有“百日维新”。可是,作为最高掌权者的慈禧太后有保守的根性,扑灭了“百日维新”,但是经过义和团发现老路子不行,还必须走改革这条路。马克思说过,拿破仑执行了法国大革命的遗嘱。我套用一下:革命遗嘱的执行者,往往就是革命的反对者;革新遗嘱的执行者,往往就是维新的反对者。

马国川:实际上,晚清时慈禧搞的新政比光绪的改革措施还要激进的多,如废除科举、兴办新学堂等改革,在当时都是石破天惊之举。

章开沅:慈禧这个人有魄力,有多年威权的积累,做事比较果断,所以推动了一些重大改革。其实,很多改革措施还是继续戊戌变法时的工作,但是更有声色,包括预备立宪,资政院的议员搞国会请愿,锋芒毕露,可圈可点。

晚清改革前进了一大步,可是,总的来讲,改革的条件并不完全具备,最大的问题是缺乏改革的社会基础,没有一个中产阶级作为改革的依托。其次,改革的动力也缺乏,缺少改革的主体,就是主导改革的人。慈禧已经到了晚年,她顺应了潮流,可是要她有很大的建树也很难,主要还是底下在做,但是又缺少一个像恭亲王那样德高望重的皇室重臣,后面几个亲王都赶不上恭亲王。

马国川:既然是改革,就要依靠体制内的力量,因为执政者掌握着改革的主动权。晚清时真正掌权的还是皇室,皇权思想也仍然占统治地位。因此,皇室有推动改革的责任,这也是在新时代里皇室的出路所在,难道当时的皇室不明白这个道理吗?

章开沅:慈禧在世还可以做些事,1908年她也死了,皇室没有一个有魄力的、可以真正左右政局的人。

马国川：假如光绪皇帝没有同时死去，可能会有一个较好的局面，光绪皇帝毕竟是一个有改革思想的人。

章开沅：即使慈禧早死，光绪也不是理想的接班人。当时就有一批一直维护光绪的帝党分子，包括真正的维新派，希望慈禧先死，光绪就有机会了。即使光绪在也没用，光绪的最大问题是性格软弱，他从小被抱进宫，是慈禧一手养大的，和同治一样非常软弱。光绪虽不颓废，也学习、求新知，但是没手腕，有妇人之仁，不是改革家的性格。因为权力在手里，就像拿着宝剑，是需要勇气、魄力和手腕的。所以，戊戌变法是把一个不适应的人放在了一个不适当的位置上，又在不适当的时机来进行改革。

光绪周围也缺少一个很好的辅佐，关系最亲密的翁同龢也不行，没有政治手腕和政治头脑，缺乏刚强之气。维新变法时，他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因为变法刚开始他就离开了权力中枢。

## 革命不是制造出来的

马国川：在您看来，慈禧死后清王朝就没有任何机会了？

章开沅：没有了。一些保守派已经占据了中央的实权。皇室之外，也没有铁腕人物。后来只能拼凑一个“皇族内阁”，皇族内阁实际上是否定立宪运动，跟立宪运动正好相对，大家就失望了。所以，皇室最后把民心丢掉了。再加上腐败，办学堂不给经费，几乎每项改革都收费。当时人们讽刺说，只有大粪不收费。于是，新政也变成恶政。

马国川：这一点值得感慨，如果操作不好，新政也可能变成恶政。历史上的王安石变法中就有很多出发点很好的改革措施，最终变成了“坑农害农”的恶政。

中国现在走的是比较稳健的改革道路，仅仅三十年改革成果已经非常可观。于是人们便开始反思近代史上的激进主义，认为晚清并不需要革命，走立宪的道路更好。如果沿着晚清新政的道路走下去，中国早就实现民主宪政了。这也就是所谓“告别革命”的观点。

章开沅：研究历史既要“出得来”，也要“进得去”。“出得来”，就不

能太纠缠于历史细节,要站得更高一点来看,风物长宜放眼量。“进得去”,就是起码的历史事实要搞清楚,不能脱离历史事实发表各种各样的高论,天马行空。

在“告别革命”论看来,似乎所有的错都在激进主义那里,如果没有激进主义的话,中国早就迈入幸福的天堂了。这种“告别革命”的观点有一个前提,就是这些论者认为革命是制造出来的。革命不是制造出来的,想制造也制造不出来。革命是被逼出来的,是各种社会因素、社会矛盾交织的结果,无可挽回。

马国川:有人说,假设没有孙中山,就没有辛亥革命。

章开沅:首先,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其次,革命不是孙中山等少数人想鼓动就能够鼓动起来的。革命不是制造出来的,而且辛亥革命的代价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大,流血并没有那么多。

在一些论者看来,日本的明治维新更好些,少流许多血,效果也更好。其实,明治维新虽然没打着革命的旗号,其实也接近革命啊,为了实现维新而死的人也不比辛亥革命少啊。要知道,辛亥革命真正死的人并不是很多。即使在辛亥首义的武汉也没有死多少人,因为那时武器的杀伤力不大,而且民军不堪一击,作战力很弱,一打就跑掉了。革命军的战斗力也很弱。康梁曾经预言,中国实现“法兰西革命”之后必将“血流成河”,雅各宾派确实如此,法国大革命确实把矛盾和斗争推向极端,很像中国的“文革”,不断地进行内部斗争,是一场全面的内战。但孙中山不是雅各宾派,而且并非革命党人主导革命,具体推进革命的还有很多立宪派。辛亥革命要和平得多,很多地方都是和平解决的,不战而胜。

马国川:辛亥革命时,革命党力量很小,只有少数人,而且是从日本回来的“海龟”。这些精英没有政权的经验,而且没有掌握政权的准备,因此拥有实际行政经验的立宪派发挥了很大作用。

章开沅:立宪派确实有很多的贡献,首先就是梁启超思想有所变化,更趋近于革命,康有为还是老一套。保皇派也不是铁板一块,更重要的是国内的立宪派活跃,因为国内的立宪派是合法存在的。特别是各种绅商,他们已经掌握了地方的实权,主导了各种地方机构,所有这些都对辛亥革

命以后的爆发和发展准备了条件。

君权的尊严已经逐渐暗淡,而民权思想悄悄的挣扎,媒体的出现对人民,特别资本主义这一层有相当大的影响。有些人不一定是通过革命派来接受民主思想、民权思想,反而是通过立宪派。革命爆发以后,革命派毕竟是少数,而且革命派缺乏政府工作经验,又求援于立宪派,立宪派已经给寻找政府了,很自然的他们就结合在一起来了,共同分享革命的果实。这一点,我们历史学家已经达成了共识:历史是一个合力的结果。

### 辛亥革命的遗产绝非仅仅是昙花一现的观念

马国川:辛亥革命后建立了民国,但是权力并没有掌握在革命党人手中,而是归于袁世凯,因此后人说辛亥革命的果实被窃取了。还有人说,辛亥革命的遗产,仅仅是昙花一现的观念而已。

章开沅:当时革命军的战斗力很弱,战斗力最强大的还是北洋军队,所以,袁世凯上台也是不以孙中山的意志为转移的。孙中山并不想把权力交给袁世凯,但是孙中山手上没有钱,到处兵变,根本控制不了局面。

辛亥革命是个伟大的社会运动,是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因为两千多年里,中国人都是皇帝的臣民,现在当主人了——当然,主人也没完全当成,但是不管怎样得往前走,中国人不可能再退回去做“臣民”。过去,我们多半纠缠在具体经验上,对辛亥革命缺少总体把握。而且是抽象的肯定,实际上是否定的。

我们不能用虚无主义来看待辛亥革命。我们过去很简单,说辛亥革命的失败证明旧民主主义道路行不通。一直到共产党成立,才出现了蓬勃勃的新气象。这是一种逻辑推理,不是历史事实。

马国川: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民国。但是民国的命运多舛,中间几次复辟,即使蒋介石统一后,民国的招牌下面仍然是专制,并没有真正地实现民主,皇帝专制没有了,但是换成了“一党专政”。那么,怎么看待辛亥革命的遗产呢?

章开沅:我们不能用虚无主义来看待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的遗产绝

非仅仅是昙花一现的观念。辛亥革命好像是一场空，留下的好像只是一个“共和国”的空壳观念。其实，并不是只有一个空洞的共和国观念深入人心——也不是那么深入，“共和”的观念是有制度性的建设作为承载的，孙中山所提出的很多观念已经制度化了。

当然，制度化不一定是完全理想的。一百年过去了，民主是不是在向前发展？今天的中国究竟是离民主更近了，还是离民主更远了？孙中山的“共和国”不仅是一个观念，还有五权宪法、五权分立等制度安排。这些制度设计不一定恰当，哪能一次成功呢？法兰西革命也是“革命—复辟—革命”，反反复复，然后才相对稳定下来。

马国川：辛亥革命后的一百年历史要认真研究，才能有比较合理的结论。问题是，这一百年的历史被各种力量涂改的面目全非，真相迷失。

章开沅：辛亥革命后的一百年要客观地总结，不要用党史来代替中华民族的历史，对于历史的各个方面都要研究。既要研究共产党的历史，也要研究国民党的历史。不能一句“腐败”就讲完了。比如，国民党败退台湾，中央政府成建制地撤退到台湾，黄金也运到台湾去了，宝贵的文物一箱都没掉，黄金一两都没丢。这说明，国民党还是很有一套的，不能因为战败了，就完全否定它。

1949年蒋介石下野，陈诚问蒋介石，今后怎么办。蒋介石说，当然继续革命。国民党也是辛亥革命的遗产，它把革命捧上了天。谁当权谁就是革命，反对我就是反革命。这是辛亥革命的一个负面遗产。我不是绝对地推崇辛亥革命，负面的东西也要讲。

所以这一百年要好好总结，至少是要把情况弄清楚，总结一些经验。排除政党的成见和意识形态的禁锢，来盘点辛亥革命后的这一百年，就会发现或多或少中国都是沿着民主、民族、民生这三个目标向前走。

## “百年锐于千载”

马国川：民主、民族、民生恰恰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内容。孙中山从十二岁起就在海外接受西方教育，他的“三民主义”具有很鲜明的西方

色彩。

章开沅：孙中山反清萌动已久，但真正形成一种政治纲领和政治目标，是在1896年伦敦蒙难以后。此前，他被看做是一个小打小闹的“江洋大盗”，很多人都不知道或者不理解他。伦敦蒙难以后，孙中山阅读了大量的社会科学方面的书，开始真正对西方有所理解。他也接触了很多人，当时伦敦聚集了各方面人士，有无政府主义者，也有社会主义者。他回国之前，在比利时还和第二国际有接触，而且说“我们是你们的一个支部”。

马国川：在孙中山伦敦蒙难的前一两年，晚年恩格斯写的文章已经开始对阶级革命进行反思，他认识到，革命并不是必须要走的道路，还可以走和平的议会道路。伯恩斯坦等人就是继承了恩格斯的晚年思想。但是接触过第二国际的孙中山仍然坚持走革命道路，对此怎么认识？

章开沅：我们现在看，第二国际有些主张还是对的，第三国际的错误也不少。如果坚持第二国际，历史就会少很多灾难。但是对中国来说，孙中山坚持革命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得出的结论。前面说过，晚清改革没有出路，只有革命这一条道路。

孙中山在伦敦蒙难以后，接触了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潮，而且是当时比较前沿的思潮。既有书本上的知识，也有他自己的观察，这样才出现了三民主义，本来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就够了，但是他观察了具体的、真正的西方以后，才知道西方也不是那么好，最大的问题是经济发展了，但是贫富悬殊更大了。在孙中山看来，仅有种族革命、政治革命也不行，还要有社会革命，就是民生。

马国川：一百年后的今天，“民生”这两个字炒得很热。

章开沅：在民族独立、共和建立以后，怎样既让经济发展，又避免西方方式的阶级对立，避免社会革命？这就是孙中山所提出的“民生主义”的意义所在。伦敦蒙难是孙中山思想发展的关键阶段，也是孙中山一生的一个重大转折，从此他成为一个真正的、有国际声望的革命家，具备了一个领袖的潜质。他有自己的抱负，有自己的眼光，有自己的主义和纲领。同盟会里都是人才呀，但没有人超越他。即使像章太炎那样傲慢的人，1903

年也为《孙逸仙》(《三十三年落花梦》节译本)写序。

孙中山本来是个医生,受过医学训练,思维方式和那些科举出身的知识分子有很大不同。他比较重视实践,知行合一,比较务实,不轻易下结论,虽然友人称他“孙大炮”,但是他讲的话都是有依据的。

马国川:但是我看《孙中山全集》,有不少说法自相矛盾啊。

章开沅:作为政治家,他确实有实用主义的一方面,那也是策略运用吧。但总的来讲,科学思维影响了他对现实的理解,他比较敏感地接触了人类文明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其中包括很多前瞻性的思考。虽然他的文章和谈话现在看来都是大白话,好像是平淡无奇,可是平淡中蕴含着一些深沉的思考。

例如,伦敦蒙难之后,孙中山有个基本的看法“百年锐于千载”。意思是说,辛亥革命前的一百年的社会进步,超过了此前的上千年。

马国川: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也表达过类似意思:“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章开沅:孙中山不一定看到《共产党宣言》,但他的认识和共产党宣言基本是一致的。工业革命以后,世界一大变局。因此我提出,要研究“三个一百年”:辛亥革命前的一百年,辛亥革命以来的一百年,今后的一百年。

第一个“一百年”是孙中山自己提出的,辛亥革命就是前一百年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结果。工业革命后,西方文明在政治体制、经济发展以及民生方面均存在顽疾,孙中山诸如“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等思想是吸纳、借鉴西方文明优点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这一百年的历史,国内学界目前没有进行充分研究。如果不了解这个大背景,不把孙中山的个人活动放到历史大背景上,就理解不了这个革命者,也理解不了辛亥革命。

## 民生与民权,仍未完成的历史任务

马国川:“百年锐于千载”是孙中山对于辛亥革命前那一百年世界历

史的精辟概括,其实辛亥革命以来的一百年同样是“百年锐于千载”,而且因为二十世纪的世界变化的幅度之大,速度之快,远远超越了十九世纪那一百年。对于中国来说,辛亥革命以来的一百年社会变革剧烈,如以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民族主义为三个维度观察,您认为中国社会是否取得了长足进步?

章开沅:在这三个方面,中国社会都有进步,也都存在不足,随时面临新的挑战。

首先看民权主义。辛亥革命开启了共和之门,迈出了走向共和的第一步。就以孙中山自己为例,他对五权宪法的创建寄予很高期望,曾经明确揭示:“以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原,五权宪法为制度之纲领。”但对于这个理念,连孙中山自己也还缺乏相关的架构设计。直到1920年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并就任非常大总统之后,孙中山才逐步把五权宪法从抽象理念形成完整的国家体制框架。概括起来是:1.以“权能分离”作为理论基础;2.“五权分立”具体化,成为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五院政府的架构;3.进一步确定县一级实行选举、复决、罢官、创制等直接民权,每县选代表一人,组成国民大会代表全国人民行使政权,并授权中央政府行使治权。

但是,孙中山却未能在生前实施自己的方案;而国民党定都南京以后,所谓“五权分立”的推行也是举步维艰,其后逐步演变得荒腔走板,更非孙中山所能预料。“五权分立”为了防止西方议会、政党政治的弊端,将考试权从行政权中分出,纠察权从立法权中分出,借以寻求更为完善的权力相互制衡。国民党内外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服膺者也并非都是虚应故事,其中确实有些忠贞之士满心期望通过五权宪法的实施,把中国引向民主与法治的进步道路。但是,任何良好的民主政治设计,都改变不了国民党政府“党治”、“军治”、“独治”的严酷事实,“五权分立”的政治架构只能流于虚有其表的形式。这种披着五权宪法外衣的威权统治,在1949年以后随着国民党的失败而转移到台湾。直到蒋介石死后,迫于内外形势的急速变化,蒋经国在临终前解除了党禁、报禁与戒严,这才结束了蒋家王朝的威权统治。正是在此以后,“五权宪法”、“五权分立”才开



始在台湾受到全面检验与不断修正。

马国川：不管是大陆还是台湾，民权主义都还没有得到彻底伸张，中华民族的民主之路道阻且长。

章开沅：从民生主义来看，百年之后民生问题已经成为中国面临的最为紧要的严重问题。民生一词，从经济而言，涵盖发展与分配两个方面。当初孙中山师法亨利·乔治与约翰·穆勒，同时又从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以及均田、公仓等方案中受到启发，提出“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主张，非常具有前瞻性。尤其是“节制资本”，目的是防止资本主义贫富两极分化的弊害。二十世纪初始，中国资本主义还处于极为幼弱的时期，1905年提倡“节制资本”诚然是“睹其祸害于未萌”，但现今对于中国而言则早已是严酷的现实。尽管我们坚持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并未能置身于资本主义“祸害”之外，而双轨制经济并存衍生的权钱交易，更使这种“祸害”愈演愈烈。

马国川：因此，最近几年民生问题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民生”一词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的话语之一。

章开沅：民生主义是孙中山最具前瞻性的思想遗产，也是当时最为曲高和寡的政治主张。孙中山自信“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曾被讥评为徒托空言，其实他和他的后继者在这方面还是做过多方面的探索与讨论，积累了颇为丰富的经验教训。孙中山及其后继者设计的多种具体方案，很难解决当前社会深层转型的复杂问题，但“一手抓土地流转（平均地权），一手抓投资调控（节制资本）”的思路仍然可以对我们有所启发。

民权与民生，是中华民族仍未完成的历史任务，仍需长期奋斗。

## “孙中山是真正的世界公民”

马国川：与民权、民生问题比较起来，似乎民族问题解决的最好。

章开沅：确实，在中华民族作为国族认同方面，辛亥那一代人不仅开创于初始，而且还在政治、制度、政策乃至文化诸层面有持续的探索性实

践。孙中山及其后继者,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方面也有不同程度的贡献,至少我们在中华民族作为国族的总体观念上与前人是一脉相承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在增进民族平等、团结,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绩。

但是,作为历史遗产,辛亥革命也有负面的因素。为鼓励民众推翻清王朝而鼓吹“排满”,显然助长了大汉族主义或汉族中心主义。以二十世纪初革命报刊宣扬的“黄帝文化”而言,至今我们一味“弘扬”而未能有所“扬弃”其“汉族中心主义”内涵。比如,现在祭黄、祭炎的那些祭文里,就包含了很多大汉族主义的东西。有些少数民族就说,祭黄帝,为什么不祭蚩尤呢?所以我不断提倡“新黄帝观”,即给始祖文化符号以更具包容性的诠释,以增进全中华民族作为统一国族的认同,可能也更符合孙中山“五族共和”的积极意蕴。

马国川:从世界范围来看,在全球化的今天,许多国家都有挟民族主义排外的问题,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也有些人鼓吹民族主义。

章开沅:孙中山以“恢复中华”作为自己革命生涯的发端,但是从来没有把民族主义的范围局限于中华,更没有以此作为终极目标。晚年的孙中山不再简单地以东方、西方或者肤色差别划分世界,而是把世界区分为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两大阵营。他呼吁全世界“受屈人民”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他把“苏维埃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等同起来,劝说日本“联苏以为与国”,共同支援亚洲乃至全世界“受屈人民”的反帝斗争。这些都是孙中山民族主义的又一次升华。

孙中山认为,民族主义乃是世界主义的基础,因为被压迫民族只有首先恢复民族的自由平等,然后“才配得上讲世界主义”。并且期望以俄国人民作为欧洲世界主义的基础,以中国人民作为亚洲世界主义的基础,然后扩而大之,才能实现整个人类的世界主义。因此,孙中山是真正的世界公民,他有世界眼光,他不是把世界主义跟民族主义看成是绝对对立的,而是必须要联在一起的,要有世界主义才有民族主义,要有民族主义的世界主义。

马国川:一百年以来的世界,风云变幻,日新月异。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与后冷战时期的国际格局演变,与孙中山的理想相距甚远。

章开沅:但是他的总体思路,特别是有关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关系的深层思考,并非纯然是美好的空想,仍然有许多值得重视的现实依据。在全球化潮流席卷整个世界,人类已经进入网络化信息时代的今天,如何正确处理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的关系,仍然是极为复杂而又必须回答的重要问题。当前某些政论家正在构思的所谓“全球地方关系”(global-local relationships)或“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与孙中山的思路正相呼应,似乎一脉相承。

马国川:在全球化时代,民族主义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中国如何对待民族主义?

章开沅:民族主义在一定时期是必须要保持的,现在完全不讲民族主义行吗?当然,民族主义不能走极端,现在要警惕国家主义,把国家利益放在最高的地位,实际上为少数的政客所操弄。

现在,中国已经回避不了民族主义问题了。中国问题就是世界问题,世界问题就是中国问题。现在有些哗众取宠的人兜售廉价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甚至鼓吹在外交中采取军事行动,唯恐天下不乱。所以在中华复兴的道路上如何克服盲目的民族主义,既需要智慧,也需要理性。孙中山晚年对世界主义,特别是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关系的思考,在全球化浪潮已经席卷世界各地的今天,仍然发人深省。

## 展望下一个一百年

马国川:“三个一百年”的第三个一百年,就是从今以后的一百年。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您对未来有何期待?

章开沅:我们不仅仅研究历史,还要研究今后的文明走向。文明走向是科技解决不了,现在重理轻文,只有文科的知识分子还有些这方面的思考,现在有几个科技学家能够想今后一百年的文明走向?

对人类来说,今后一百年是关键的一百年。人民是继续红红火火地过下去,还是打仗、争夺资源、破坏环境、浪费资源,继续让道德堕落——现在道德已经堕落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了。现在也不承认普世价值了,

总要有一些共同的东西。我认为,要寻找最大公约数,不然人类何以自救呢?

马国川:其实,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一些思想家、学问家,如斯宾格勒、叔本华等人都提出了类似的问题。

章开沅:从中国来讲,章太炎、严复等人也提出了新问题。当时“进化论”最流行,敢于对进化论提出质疑者并不多,章太炎就提出“俱分进化论”。所谓“俱分进化论”,简言之,进化论不一定是那么理想的,“善亦进化,恶亦进化”。人类历史发展在道德方面是善恶并进。

十年前,当许多人沉浸在“新千禧年”之际,我就“唱反调”说,“世纪”本来是一个时间的标志,没有特殊含义。就中国来讲,两个世纪交替时恰是最倒霉的。新世纪带来的不都是进步的祥瑞,有可能还有灾难。根源就是文明问题未解决,而且更加深化。当时,我所忧虑就是人性文化的问题、道德的问题。物质文明上去了,精神文明下去了。从文明危机来讲,重科技轻文明,科技主义、科技思维成为主流,而且和政权相结合,这是很大的问题。

马国川:所谓“科技思维”也就是所谓的“工具理性”。

章开沅:我现在把它叫“工科思维”,因为已经不是科学主义——科学主义是要批评的,现在已经下降到“科技决定主义”。

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汤因比和池田大作对话,大部分就是我们后来所忧虑的问题,包括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他们还对GDP挂帅提出了批评,提出把幸福因素加进去。随着年龄增大,经过这么多的世变,我越来越有感触。我现在的思路比原来更开阔,更放大了,原来是考虑危机本身,现在考虑的是怎样改变危机,危机是不是还有改变的可能?人类是不是注定要自相残杀,自我毁灭?

马国川:对于未来,您似乎有些悲观了?

章开沅:我是审慎的乐观。现在和过去就不一样了,例如,对环保的问题政府现在重视了。但是客观存在的气候、水、资源等问题,都不是一个国家能够解决得了的。当代文明问题,也不是一个国家能解决的。目

前人类的最大公约数是公害,它涉及到每人每家每户的利益。若不改变无节制地掠夺资源和污染环境的增长模式,地球最后剩下的将只是人类的眼泪。这是一个普世性的问题,所以现在我们不仅要做好一个中国的公民,而且还要承担世界公民的责任,这才叫真正的现代化公民。如果公害能唤醒人类的醒悟,公害就变成公利,这是我最大的期盼。

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现在科技发展迅速,但工业再发达也无法解决人文精神的流失,而光靠科技是无法解决人的方向、道路问题的。我预言,未来也可能出现“第二次人的发现”。在黑暗的中世纪,宗教统治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发现了新世界,也发现了人的价值,提倡个性解放。后来,启蒙运动让位于工业革命,现在工业革命已经发展到极端,单纯的工业革命造成很多问题。未来可能出现的“第二次人的发现”,就是人性的复苏。纠正重物质轻精神、重科技轻人文、社会伦理堕落的局面,向人性回归。

采访时间:2010年11月17日、18日

采访地点: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 假如没有辛亥革命

## 袁伟时

历史学家，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1931年12月生，广东兴宁人。1947年考进广州南海中学念高中，1950年考进中山大学经济系，至1957年在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班毕业，回中山大学工作至今。主要著作有：《中国现代哲学史稿》、《晚清大变局》、《中国现代思想散论》、《路标与灵魂的拷问》、《告别中世纪——五四运动文献选粹与解读》、《近代中国论衡》、《文化：中国与世界》等等。主编《现代与传统丛书》、《荒原学术文丛》、《牛虻文丛》等。

## 采访手记

袁伟时家住中山大学教工住宅区，房间不大，似乎从来没有装修过。狭小的客厅里摆放着老式的沙发，墙上挂着两幅字。其中一幅是广东书法家尚涛的墨迹，在袁先生的指点下我才完整地读出来：虚能养和，静能生悟，仰以察古，俯以观今。

察古、观今，不恰恰是袁伟时先生的工作吗？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研究近代历史，追寻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轨迹，其专著与文章对传统的历史和近现代人物的研究多有颠覆性的观点，常常引起强烈反弹；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他直面现实问题，勇于发言，切中时弊，每每激起社会反响。

其实，这位八十岁的老者并非金刚怒目之人，而是“望之蔼然，即之也温”的恂恂儒者。对于各种污蔑谩骂之词，他都一笑了之：“面对谩骂，我向来的态度是一笑置之。它们多半是不可理喻的。乱骂人是羞辱自己。现代文明是无法抗拒的。谁的言行对社会有益，时间是铁面无私的审判官。每个人时间有限，我只做自己应该做的事，继续宣扬我的观点。”

真正的宽容来自坚定的信念。“如果我们不愿再做受谴责的一代，就必须面对严峻的现实，从百年的屈辱和挫折中充分汲取教益……学术与盲信势同冰炭”，他在《中国现代哲学史稿》的后记里说，“因此，我的信念是：我只把我看到的历史本来面目写在纸上”。

袁伟时精神矍铄，声音不疾不徐，历史自他口中娓娓道来，同时又有他的个人判断。这或许和他的学术背景有关。虽然袁伟时以研究近代史成名，其实他一直是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就在今年，他明确提出了我们要树立文明史观，“文明史观，就是要跳出民族主义的局限来解释历史现象，我对这个一贯都是比较清楚的，这个是人类共同价值……从古到今的历史要怎么去解释，对古代历史的判断，我认为文明史观是最为准确



的”。

这段话来自袁伟时的《八十自述》。在笔者采访的半个月前,袁伟时刚刚度过八十大寿。他曾对来访的《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张力奋说:“我的自我感觉是,我还没有进入老年。大家知道,我的学术成果,大部分是在退休之后产生的。我要继续偿还学术和思想欠债。近代中国经历那么多的曲折和苦难,应该产生巨大的学术和思想成果。但现在还没有。这是对人类的欠债。应该有众多学人自觉担负起还债的任务。今后的十年,我仍然要坚持不懈,尽绵薄之力!”

说真话,不敷衍,斥伪学,摒虚妄,袁伟时的精神赢得了许多年轻人的热爱和尊重。不过,在对现实的认识上,袁伟时和一些年轻人之间也存在着巨大区别。用袁伟时自己的话说,他是一个“死不悔改的乐观主义者”;而一些年轻人面对巨大的社会不公感到失望和悲观,思想趋于激进。记得一年前在北京郊区举行的一次论坛上,我就发现,对于中国的现实和未来,一些年轻学者与袁伟时先生观点差距很大。或许有鉴于此,耄耋老者袁伟时仍然积极写文章、做演讲,与年轻人交流,呼吁社会理性。自去年底,他应中山大学传播和设计学院院长胡舒立之邀,在正式退休十五年后重登讲坛正式授课,为本科生上“中国近代思潮”课,补读历史。据说,前不久,老先生晚上给学生上课。讲坛上那把旧椅子突然散架,袁先生一屁股就摔倒在地上。袁先生自己爬起来,笑着说:“没有事,继续上课。”

在一个亲见八十年历史沧桑、亲历数次民族劫难的老人眼里,任何社会进步都是值得肯定和赞赏的。不宁唯是,“过去,中国宪政失败的原因之一,是社会的中下层没有充分参与。对国家道路选择这样的世界性难题,难倒了中国的精英。社会矛盾的尖锐,就迫使掌权者不能不改革”,在对近代史进行了深入研究后,历史理性让袁伟时更加坚信,“现在的政府上层,并不是都不思改革。只要国家上下一起努力,就能推动中国社会前进,完成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历程。从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打开国门,已经过去了一百七十年。现在是完成中国社会转型的时候了!”

## “慈禧执政的最后八年是辉煌的”

马国川：对于辛亥革命的发生，有两种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革命不是制造出来的，辛亥革命是必然要发生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历史存在另一种可能性，辛亥革命并不是必然要发生的。您在《晚清大变局》一书里对“清末新政”评价很高，似乎赞成后一种观点，为什么？

袁伟时：各种各样的观点可以共存，大家都在探索。我不否认辛亥革命的必然性。任何历史事件都有必然性，作为历史研究者要寻找历史事件出现的原因，从中吸取教训。对于辛亥革命，我们要做的不是论证其必然性，而是剖析它发生的原因，总结历史教训。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一直到1908年，满清皇族集团的最高掌权人是慈禧太后。这个人物比较复杂。如果没有她的支持，洋务运动是不可能的。戊戌变法，她最初也是支持的。后来因为光绪皇帝和康有为他们的做法不妥当，把慈禧太后推向反对改革的一边去了。当然，慈禧太后也有反动的一面。最疯狂的举动就是支持义和团，导致国家面临覆亡的境地；在非常屈辱的条件下，签订了《辛丑条约》。慈禧执政的最后八年是辉煌的。她推动的清末新政，也是二十世纪中国最辉煌的记录之一。美国学者任达的《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一书认为，清末新政是很了不起的一场变革，是“黄金十年”的“新政革命”。我认为，他的基本观点是对的。

马国川：但是，所谓清末新政似乎很多仅仅是流于字面而已，并没有切实实行。

袁伟时：并不是流于字面，而是引发了非常了不起的社会变革。清末新政中至少有几项改革是革命性的：废除科举，实现了教育制度改革；废

除传统的中华法系,实现了法律革命。传统的中华法系是行政权和司法权合一,县太爷既负责行政,也负责问案。晚清废除了这种前现代社会的落后法系,邀请日本的学者参加制定了新的民律、刑律、诉讼法,从而建立了一个全新的司法制度。

另外,政治体制的改革也是革命性的。中央和省成立了议会预备机构:资政院和谘议局。官制改革,各种衙门着手改造成现代国家的政府部门,如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尤其是在基层推行地方自治,成立作为宪政预备机构的谘议局,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行政权的监督。例如,谘议局的一些会议记录里就记载着,议员们积极参政议政,揭露官员的腐败,参与法律法规的制定,成绩显著。

马国川:为什么清政府要推行地方自治?

袁伟时:所有的实行宪政的国家,都是推行地方自治的。反过来说,宪政的基础就是地方自治。清末的地方自治很有声势,各种各样的民间团体也纷纷组织起来,公民素质的提高很快。例如,地方商会达到一千多个,都是独立的,不是官府的尾巴,不受政府操纵。商会还有自己的武装——商团,有自己的报纸,经常对国内外的大事发表意见,维护商会自己的利益和地方的利益。

马国川:这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效果如何,比如对于经济发展有无促进作用?

袁伟时:在改革的推动下,晚清经济发展迅速。清政府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很快,十九世纪末财政收入仅有八千万两,到1909年已达到两亿八千多万两。1911年由于革命爆发受到了一些影响,但是财政结算也有两亿六千多万两。革命到来往往不是在国家最困难的时候,而是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时候。一个挺立了二百六十七年的大清帝国为什么那么快就被推倒了?我们应该认真研究它的病理。

## 既得利益集团的整体性腐败

马国川:按照您的分析,清末改革如此深入,经济发展也很快,爆发辛

亥革命就有些出人意料了。

袁伟时：辛亥革命爆发的必然性是什么？就在于满族既得利益集团的整体性腐败。满族入关的时候只有几十万人，到最后达到了五百万人。这五百多万人都是吃皇粮的，全部成为既得利益者。特别是作为领导核心的皇族非常腐败，而慈禧本人对此负很大责任。慈禧是个没有远见的女人。

马国川：一个没有远见的妇人，为什么在清末搞了那么多改革措施，她是基于什么考虑呢？

袁伟时：清政府不改革就维持不下去了，所以慈禧要采取一些改革措施，但是她没有远见卓识，不能将知识阶层里面那些最切合实际的主张变为自己的政策。当时很多有远见的高官，如郭嵩焘等人提出，经济制度不能够走官办工业的道路，也不能走发展军工工业的道路，应该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这个主张没有得到采纳。慈禧仍然墨守传统，极力控制整个社会，不允许民营经济的自由发展。当时中国经济入超，列强在中国倾销产品，有两大“吸血管”，一个是鸦片，一个是纺织品。纺织工业技术比较简单，如果政府支持民间发展，很快就能发展起来。可是，李鸿章办纺织局，冀图一家垄断，其他人不能办。当时还有一个利润很高的行业是轮船业，也限制民间资本进入。

马国川：经济自由没有充分保障，经济发展就没有健全的基础。

袁伟时：还有，科举制度的废除也拖延得太久了。早在十八世纪就有人提出废科举，得不到采纳。废除科举将带来知识的更新，如果坚持科举制度，就意味着将中国年轻人最宝贵的年华都浪费在四书五经上，不能了解现代的文化和科学技术。慈禧整整拖延了四十多年，进入二十世纪才下决心废除了科举。中国耽误了半个世纪，日本却利用这段时间发展了起来。

另外，慈禧出于一己私心，接班人都是指定乳臭未干的小孩子。特别是1908年临死前还指定一个三岁的宣统，纯属荒唐。假如她有远见，应该挑选皇族里面比较成熟能干的人。这样在辛亥革命爆发后的关键时刻，就不会那么不知所措。

马国川：辛亥革命的前奏就是四川的“保路运动”，它完全是由于清政府的错误经济政策引发的。

袁伟时：当时川汉铁路的修建没有什么进展，几乎停滞了。负责建设的公司是腐败的，但是民营公司的腐败应该通过股东自己去整顿，政府不能越俎代庖。清政府却宣布将铁路收归国有，引火烧身，民众怨气集中到政府头上。铁路收归国有是错误的决策，另外群众起来之后，政府采取镇压的办法，更是错上加错。

马国川：这并不奇怪，面对民变，专制的政府的习惯性措施是镇压，因为它没有民主决策机构，不会与民众沟通。

袁伟时：即使没有民主机构，假如领导集团应对得体，也不会爆发这一场革命。民众起来以后，可以镇压，也可以妥协。通过对话，吸取群众意见里的合理主张，矛盾就化解了。任何比较聪明的政府，都不会采取镇压群众的办法，总是力求化解矛盾。

1910年，地方的谘议局组织谘议局联合会，民间纷纷组织“国会请愿同志会”等团体，领导了四次大规模的“请开国会”活动。清政府最终镇压了这些请愿活动，下令遣散请愿代表，并强行将东三省代表押解回籍。民间要求立即于1911年开国会，清政府也作出了让步，答应提前几年，于1913年开国会。假如当机立断，立即开国会，接纳民主决策机构，通过听取民意来应对危机，既可以避免这一场大风暴，也可以赢得汉族士绅的合作。可是由于整个统治集团的腐败腐化，没有智慧应对突发事件，只会抓人杀人，暴力镇压，结果把立宪派都推到革命方面去，自己制造了敌人，制造了革命。

## 推翻帝制是一大功劳吗？

马国川：随着清政府被推翻，清末新政的一系列改革措施骤然停止，也很可惜。

袁伟时：改革虽然停止了，但那些改革措施却影响了整个二十世纪。例如，辛亥革命后成立的民国政府承认晚清的新刑律、新民律等法律，除

了对皇权的规定外,其他都继承了下来。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也是晚清法律体系的延续,只是局部有修改。虽然1949年后共产党废除了《六法全书》,但是改革开放后建立起来的法律体系仍然是大陆法系。

马国川:看来,眼睛不能只局限在二十世纪前十年里面,虽然革命打断了晚清新政的进程,但是实际上很多改革成果对整个中国二十世纪的走向有很多很重大的影响。

袁伟时:对啊,比如废除科举,建立新的教育体制,影响是非常深远的。辛亥革命以后,经济上也没有多少变动。因为新政时期的经济政策是比较健全的,实行市场经济,私人办企业的障碍基本上扫除了。各地成立了招商局,推动工商业的发展。与清末新政比,辛亥革命创新的东西不多。辛亥革命后所有成功之处都是清末新政的继续。

马国川:无论如何,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两千年的帝制,这份功绩不应该否认。

袁伟时:对现代社会说来,有没有皇帝不是大问题,关键是政治制度的性质。辛亥革命前夕的清王朝,正在向立宪政体转化,而号称民国的政府大都是专制政权。两者差别不大。而就实行真正的宪政的可能性来说,前者的几率似乎更大一些。我的根据是:

第一,国家是统一的,没有1916年以后没完没了的各地军阀之间的纷争,精力可以集中于政治体制改革。

第二,外部环境比较稳定,经济状况比较好。民族工矿业以平均每年15%的速度增长。财政收入稳步增长。而民国建立后,军费剧增,收入锐减,财政处于破产状态,不借外债就活不下去。这样的状况大大增加了外国操纵、威胁的可能性。

第三,中央政府处于弱势。满族只有五百万人,皇族和亲贵更少,他们已经腐化,精锐的新军不在他们手中。与民国时期直接掌握着枪杆的军阀比较,清政府更容易受到牵制。

第四,以各省谘议局和商会、教育会为中心的民间社会相当强大,他们的独立性很强,几次请开国会运动就是他们领导的。

政治是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博弈。没有各种力量牵制,靠统治者恩

赐的民主、自由和法治是不牢靠的。如此看来,当然是辛亥革命前夕的清政府比后来军阀统治时期的政府更容易向民主、法治体制过渡。

马国川:一些学者正是据此提出了“告别革命”的观点。

袁伟时:我不愿使用“告别”或拥抱革命之类感情色彩很浓的字眼。历史无法告别;我们的责任是竭力接近历史真实,让人们作出自己的判断,从中吸取历史智慧。

### 是谁摧毁了民初的宪政架构?

马国川:无可否认,民国初年确实出现了新气象,而且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这是比较符合现代国家要求的宪政架构。

袁伟时:问题是,这套宪政架构很快就被摧毁了。人们或史上都说袁世凯是“窃国大盗”,是他摧毁了民国初年的宪政架构。事实上,这个结论是非常片面的,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首先,他是依法选出来的总统。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第一任大总统,都是依法选出来的。

其次,执政初期,他依法办事和违法的记录并存;如果反对党依法监督,走上正轨的可能性没有丧失。几乎所有国家革命后的政权都经历过这样的阶段。

再次,他的作为是有思想和实践经验作为基础的。从戊戌维新以来,他就支持改革。而从实践看,他是清末新政的支柱,他领导的直隶省也是新政成绩最卓著的一个地区。他还在基层推进三权分立的地方自治。

民国后他的施政也是得民心的。几年内就把被革命打乱了的财政重建起来,实现了收支平衡。国民希望稳定、发展,他做到了。

而以他为敌的国民党的成员是些什么人?主要是留学生,他们绝大部分都是没有政治经验的知识青年,有“阶级斗争多疑症”,总认为只有自己才可靠,其他人都是不可靠的。

马国川:这是一个世界性的传染病。革命党人往往认为只有自己是最可靠的,不和自己站在一边的都是革命的敌人。

袁伟时：辛亥革命爆发之时，国民党既没有经济力量，也没有军事实力来统一全国、成立中央政权。国内外和朝野各方把目光投向袁世凯。以政治、军事、经济和外交经验及社会威望而言，袁世凯确实是当时的不二人选，是国内外公认稳定中国的希望。双方谈判议和，结果达成一个默契，只要袁世凯赞成共和，就让他当总统。

革命派主导的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一个决议，在袁世凯接收政权以前，南京第一任临时大总统还要继续履行责任。这就创造了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的荒唐现象，两个总统同时并存一个多月。成立南京政府之初，学习美国的体制，实行的是总统制。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2月15日南京参议院正式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不到一个月，革命派主导的南京参议院就急急忙忙制定《临时约法》，将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实际上就是要剥夺新任总统袁世凯的权力。

马国川：袁世凯对于《临时约法》的态度是什么？

袁伟时：宪法的制定，应该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实行必要的妥协，才能顺利实施。可是，从制定《临时约法》开始，南京临时参议院就没有听取和尊重袁世凯的意见。当选总统没有机会参与宪法文件的制定，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荒唐！《临时约法》没有由当选总统袁世凯签字，而由前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签署。当时的电报已经很发达了，《临时约法》这样重大的宪法文件，完全可以、也应该通过电报发到北京让袁世凯签署，也没有这样做，荒唐吗？

在两个总统并存的这一个月多月里，孙文匆匆忙忙签署了包括《临时约法》在内的四五十个文件。

马国川：同盟会对于袁世凯抱有高度的怀疑，这似乎也无可厚非。因为毕竟不了解袁世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加强对他的权力限制也情有可原。

袁伟时：任何权力都应该受到限制，依法予以制约。可是，《临时约法》的起草人大都是留学日本尚未完成学业的年轻人，这些人对法理的了解都不是很深透，所以制定出来的文件漏洞百出。议会权力过度扩张，议会可以罢免总统、总理和各部的总长，总统却没有解散议会的权力。第



一次国会选举,国民党控制国会,多数议员没有国家管理经验,党争意识太强,行政管理受到严重掣肘。行政对议会无力反制。后来国会还干了包括贿选总统等不少坏事,被讥为“猪仔国会”、“万年国会”。

国民党武断地认为,袁世凯那一批人对共和不是真心的,是假共和。他们想通过一纸空文就将权力夺回来,根本不可能啊。这说明了国民党人的另外一个毛病“政治幼稚症”。“政治幼稚症”和“阶级斗争多疑症”结合起来,就造成了总统与国会之间无穷的扯皮、对抗。

马国川:当时的国民党仍然心有不甘,认为我们打下的江山,凭什么让袁世凯坐享其成呢?

袁伟时:民主共和制度建立后,哪怕很不完善,国民党也必须及早完成从革命组织向民主政党转变的历史任务,摒弃暴力思维,学会民主、法治,在改革和完善制度中寻求国家长治久安。“打江山坐江山”的思维本来就是落后的,现代国家应该抛弃这种前现代的思想。可惜国民党仍然固守旧思想,除了在政治上对袁世凯进行掣肘之外,甚至一度想暗杀袁世凯!

1912年8月,孙中山和袁世凯在北京会谈了十三次,得出一个共同的纲领,核心是让袁世凯当十年总统,孙中山则主动提出要去推动中国铁路建设,发展实业。但是在达成这个共识的同时,宋教仁等人就有一个夺权计划。夺权的手段各种各样,其中一个手段是暗杀。现在有史料证明,孙中山是知道这个计划的。虽然这个计划没有机会实施,但计划是明确的。

马国川:清末的同盟会本身就有暗杀传统,汪精卫就是以暗杀暴得大名。

袁伟时:同盟会容不得别人,也容不得自己人。蒋介石就暗杀了陶成章。蒋介石在日记里说,这是他得到孙中山信任的关键。

1913年,国会选举结果出来了,宋教仁北上,在上海火车站被暗杀。现在的研究证明,不光是袁世凯的国务总理赵秉钧有很大的嫌疑,有政治野心的国民党人上海都督陈其美也是暗杀的指使者之一。两股势力都想通过上海流氓帮会头目应夔丞除掉宋教仁。

马国川:在宋教仁一案里,袁世凯是无辜的吗?

袁伟时：也很难讲是不是无辜的，到现在为止，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是袁世凯指使的，但是国务总理赵秉钧是逃不脱的。本来，这是一个刑事案件，凶手抓到了，赵秉钧及其秘书的电报也公布在报纸上了。当时的司法系统是进步的，按照法律程序，是有可能将事件真相搞清楚的。

当时的形势对国民党非常有利，如果坚持依法追究下去，袁世凯极为被动，国民党则于法有据且哀兵动人，胜算很大。可是，孙中山放弃法律上的博弈，坚持要武力解决问题。当时国民党多数领袖反对这一孤注一掷的行动。但党本身没有民主化，多数人的意志不被尊重；于是挑起了“二次革命”，从此天下大乱了。用梁漱溟的话说，开创了用武力解决政治问题的先例。政治家有掌权的欲望很正常，但是，通过不正当手段夺权，那就不对了。

马国川：恐怕不能说这是国民党人一方面的结果，尽管袁受到国民党的各种牵制，但是他毕竟是最有权的一个人，并不是任人摆布的傀儡啊。

袁伟时：准确地说，是袁世凯与国民党联手摧毁了民初的宪政架构。而且从长远来看，1928年国民党统一全国以前，这个宪政架构一直稳定不下来，更大的责任是国民党，因为袁世凯在1916年就死了。

袁死后，北方政府有几次机会可以实现和平统一，把中国推向稳定发展的道路，都被国民党破坏了。

## “以暴易暴不是清除污秽的手段”

马国川：清末的时候，袁世凯积极推行新政。辛亥以后，袁世凯一步步走向帝制，为什么同一个人会有这么大的反差？

袁伟时：任何掌握权力的人失去制衡，都会走向极端错误的道路。袁世凯本身是一个复杂人物，他不是什么道德高尚的人，而是官僚体制下的一个能臣，是清末新政的重要支柱。他招揽和重用海归派，废除科举、发展新式教育、行政体制改革、推行基层自治和三权分立、发展实业、修铁路、练新军，各方面都有突出表现。假设在有效的制约下，他是有可能走

向民主宪政道路的,有可能在建设民主体制上作出大贡献。实际上,他当总统期间做了一些非常积极的事,如要求各省军政分开,改变了辛亥革命后都督指挥一切的局面。

民主共和的前提就是承认社会是多元的,要承认各方利益,通过民主程序和法治途径,进行决策和达成必要的妥协。当时较大部分的社会精英大体都懂得这些知识,但这些现代文明的规则,没有现实的效力。袁世凯对《临时约法》以及后来制定的新宪法提出修改建议,这是他的权利。至于他要求总统掌握不应该有的权力,应该拒绝,但是对于合理的要求应该满足。那样的话,他有可能走向民主道路。结果没有,他就越走越远了。

马国川:就是说,袁世凯最后称帝,实际上既有形格势禁的一面,也有个人的私心?

袁伟时:中国本来就有专制的传统,袁世凯是从旧体制下成长起来的,所以很容易回到旧的轨道上。从更深层次去考察,在这场关乎中国宪政前途的较量中,袁世凯固然暴露了专制者的本色,国民党人和中国的精英阶层也显示了理想主义者幼稚病和权力欲。政治在高扬理想目标的同时,只能从实地出发,在现有基础上谋求可能达到的最高要求。内阁制和总统制都是实现民主宪政的形式。但在当时的中国,两种形式之争,蕴含着权力之争的内容。

马国川:孙中山等人接受了现代教育,言论中充满民主等字眼,为什么也逃不出权力之争的思想牢笼?

袁伟时:民国初年,在政治舞台上驰骋的主要是五类人:前清官僚、行伍出身的武人、新军将领、各地士绅、留洋归来的知青和革命家。当时面临的课题是在旧体制瓦解的基础上,推动全国逐步过渡到民主与法治的新轨道上。需要有雄才大略、胸怀宽广的政治家把这些人团结起来。不幸,当时没有出现这样的人物。

前三类人一再显示与新体制格格不入的习性毫不足怪,他们本来就是中世纪政治孵化出来的,难以苛求。但是,不能简单化,把他们视作民主、宪政的敌人。孙文虽然是号称既民主又革命的领袖人物,其实脑后仍

然拖着一条又粗又长的辫子。以孙文为代表的革命领袖大都对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都缺乏深刻、全面的了解,更致命的是他缺乏善于团结各种力量的领袖风格。揭示他的弱点的史料很多,但在颂圣史学中,这些都被忽略甚至有意掩盖了。

所以,当时的中国社会该死的未死,方生的孱弱,现代的民主与法治缺乏深厚的社会基础。对症下药,应该致力于培植民主与法治的社会基础。

马国川:具体而言,如何培植民主与法治的社会基础?

袁伟时:保持社会稳定,让当时开局良好的五大势头发展下去:

1. 保护当时已有的结社自由,保护和支助商人和知识阶层的社会团体充分发挥作用,成为牵制政客和武人的强大力量。

2. 维护当时已经实现的言论自由,拓展当时非常活跃的独立的新闻出版业,形成强大的舆论监督和思想更新机制,成为遏制政客和武人违法行动又一强大机制。

3. 维护学术自由,普及国民义务教育,让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接受现代文明观念和科学技术的培育。

4. 推动新文化运动——观念变革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让中国人确立公民权利、个人自由、司法独立和法治、宪政、军队国家化和军人不得干政的观念,为民主共和制度奠立牢固的思想基础。

5. 健全法治,保护市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关键是有意参与政治的各派势力和社会精英摒弃武力决胜的思维,树立法治和宪政是安邦大计和治国唯一道路的思维。法治、自由、稳定,三者是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

这条道路极其漫长,不可能立竿见影,只能日积月累,积小变为大变,欲速则不达;而且不要看到路上的毛病就想另辟捷径,回到武力镇压或夺权的死胡同中去。走这条路不但可以减少旌旗变幻、血流成河的战乱给普通老百姓的痛苦和对生存环境的破坏,而且它是无法绕开的起点和基础,战火或开枪镇压过后依然必须从这里起步,一步一步攀登。政治家在这个艰巨的历史性建设面前不是无能为力的。消极者的最低限度是不知

法犯法,在政治斗争中遵守游戏规则。积极者则进而捍卫和支持上述基础事业的发展。不幸,当时的政治家们没有显示伟大政治家应有的高瞻远瞩气概,把中国推向民主与法治的轨道,而是纠缠于权力斗争,辜负了历史的重托。

马国川:道理很正确,可是能够寄希望于当时封建习气浓厚的北洋集团吗?

袁伟时:在刚刚结束宗法专制统治的国度,必须考虑稳定和发展的正确关系。无可讳言,当时的北洋集团是最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存在,也是国内外公认的国家稳定的重要依靠,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们是民主、自由和法治的天敌。考虑力量对比和国民对社会稳定的迫切愿望,成熟的政党和政治家应该审时度势,作出正确的抉择。具体说来,各政党及其国会议员应该压抑自己立即掌握政权的欲望,在三权分立体制下接受总统制,并把它纳入法治轨道。可是,他们热衷于争权夺利,而没有把制度建设和健全法治放在第一位,国家因而沉沦。

马国川:辛亥革命最令人遗憾的一个后果是,由于没有建立起稳固的政治体制,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的强有力的政治秩序,开启了中国二十世纪上半叶社会动乱之源。有些论者断言,民初的政治混乱证明:中国人不配享有民主,只有继续进行暴力革命才能清除这些污秽。

袁伟时:这一糊涂思想的根源在于,没有充分了解各国民主制度建立的历史经验:

第一,任何国家的民主制度都有范围逐步扩大和腐败逐步清除的过程。以英国为例,直到1928年妇女取得与男子平等的选举权,距离1640年革命已将近三百年了。

第二,腐败和混乱只能通过民主、法治去纠正和防止。武装革命——以暴易暴,只能实现权力转移,不是清除污秽的手段。政权易手,新官上任,过不了多久,贪污腐化,必然浮现。人性使然,古今中外,概莫能外。除了分权制约、民主监督和法治以外,没有其他可以根治的有效药方。民主、法治自身有强大的纠错能力,离开这个机制,必然走入歪门邪道。在很多时候,说中国人素质低下不能实行民主的花腔,不过是掌权者迷恋手

中权力而制造的烟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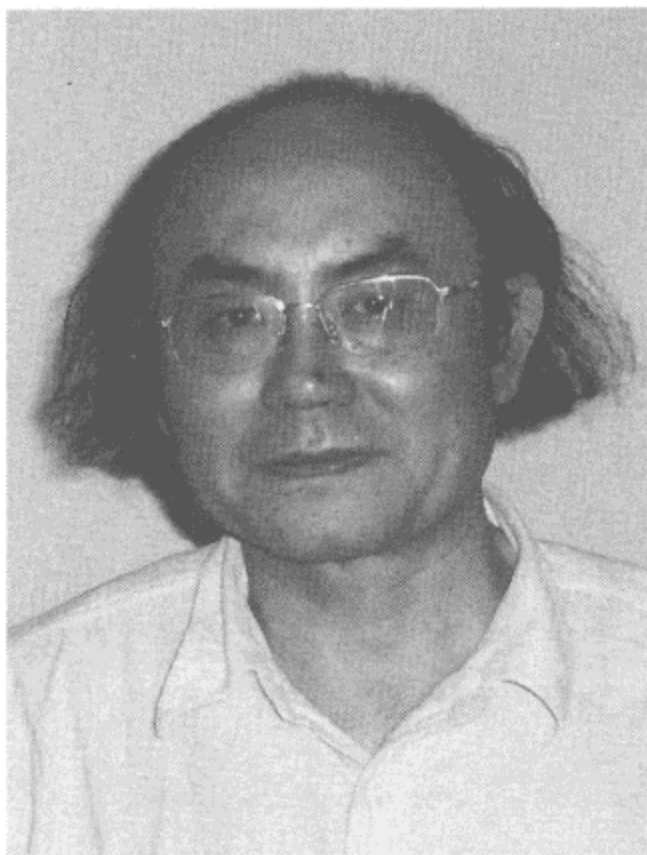
马国川：可是“推倒重来”的革命式思维仍然存在。

袁伟时：从总体上来说，我并不悲观。过去三十年，中国社会的自由在不断生长。现在要剥夺公民的权利，没有那么容易了。随着互联网发展，人人可以在网上寻找自己需要的信息、书写自己的意见，压制和封锁激起强烈反弹，公民自己开辟了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途径，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改革是有希望的，中国通过改革实现和平转型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采访时间：2011年2月10日

采访地点：广州 中山大学 袁伟时寓所





## 为什么一步步走向革命？

### 雷 颐

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祖籍湖南长沙，1956年出生于湖北武汉，中学毕业后下乡数年，然后当兵，复员当工人。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1982年毕业，获历史学学士学位，同年考入吉林大学研究生院历史系中国近代史专业，1985年毕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85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至今。研究方向：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当代中国史。主要著作：《取静集》、《时空游走：历史与现实的对话》、《雷颐自选集》、《经典与人文》、《图中日月》、《萨特》、《被延误的现代化》、《历史的进退》、《历史的裂缝》等。

## 采访手记

每一个历史学家都关注现实，雷颐先生对现实的关怀尤其强烈。这并不奇怪，因为除了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他感兴趣的研究方向也包括当代中国史。

他在《经济观察报》上长期开专栏，我每期必读。尤其是那些讲述近代史的随笔文章，读着读着，我总觉得似乎就是在讲述当下的中国。我曾经和他开玩笑说，您是不是在以古喻今呢？他说，不是，只能说明中国进步太慢，许多方面在不断地重演历史的悲喜剧而已。

今年五十五岁的雷颐经历丰富。按着他的说法，“工、农、兵当年三个最重要的社会阶层的角色我都有体会”。小学没毕业文革就开始了，复课闹革命后升入中学，但是也不学文化课，每天就是“天天读”毛主席著作，也曾经到工厂去学工。后来，他下乡在农村待了四年，又入伍当兵，在军营度过了三年时光，直到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

在这所当时东北最好的综合性大学里，雷颐遇到了历史学家李时岳先生。那是一位心胸开阔、才气纵横的史家，也是一位能开风气必为师的史家。章开沅先生在《忆时岳》一文中深有感慨地说：“几十年来，我有幸结识众多中外几代著名学人，相较而言，时岳的天分、素养、才华都堪称上乘。”

雷颐回忆说：“一开始我的兴趣在外国史，后来上李时岳先生的中国近代史，听着听着，就觉得80年代初那个环境跟近代中国非常相像，很有意思。都是闭关锁国了很长时间，突然开放，一下子有很多争论和迷惑。很快我的专业兴趣就转到中国近代史了。”在他看来，读中国近代史，对于理解中国现实极有帮助，“如果我们认认真真地读中国近代史，后来好多的不必要的争论曲折实际上是可以避免的”。

为了帮助大众了解近代史，近年来雷颐做的一个主要工作，就是“把



历史说给大众听”。与多数历史学家的高头讲章不同，雷颐“会讲故事”，三言两语，便勾勒出历史的场景与情势。雷颐说：“其实从古希腊起，历史都是以叙事为主，你把事情叙述清楚了，根本不需要你去下结论，读者自然就能体会。”

或许因此，一些学界人对于雷颐有些不以为然，雷颐也不以为意。他不愿意写作刻板的学术文章，也不愿意静守书斋，总是热切地把身子探出窗外。开博客、写随笔、在报刊上撰写评论文章，甚至开设大众历史讲座。为了笔者的这次采访，雷颐先生就是在参加了一个讲座后，匆匆忙忙赶到蒲黄榆地铁站附近的一家咖啡馆。

雷颐的语速很快，似乎他的语言跟不上思想脚步。“我只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研究和传播历史真相”，他说，“我写文章反复谈到遗忘历史、回避历史、篡改历史的可怕之处，‘当过去不再昭示未来，心灵便在黑暗中行走’，这是19世纪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的一句名言，值得我们深思”。

雷颐的文章，不就是从历史投向未来的一束光柱吗？



## “一步一步地把自己弄垮”

马国川：武昌起义之前，孙中山前后组织了十一次武装起义，均以失败告终。最惨烈的是1911年4月发动的黄花岗起义，也没有成功。革命党纷纷流亡海外，孙中山也远赴美国，革命处于低潮。可是，仅仅半年后，在孙中山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处于华中腹地的武昌竟然成功起义，而且全国各地纷纷响应。这场革命看起来为什么如此偶然？

雷颐：辛亥革命看似偶然，其实是多重因素造成的结果，是由一系列因果关系造成的。辛亥革命前夕，满清政府就像一栋老房子，看起来还在那里巍然矗立，其实已经腐朽了。突然刮来一阵大风，甚至是吸烟人的一颗烟头，就足以将它吹垮或烧毁。如果没有大风或烟头呢，它还能侥幸地支撑很长时间。

马国川：武昌起义就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风”，是革命党有意丢弃的一颗“烟头”。

雷颐：武昌起义确实不是孙中山策划、领导的，但是发动者都受到了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后来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尤其是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国民党把孙中山尊为“国父”，共产党虽然反对国民政府，但是也承认孙中山是“民主革命先行者”。在革命的叙事中，革命是好的，革命后的问题都是由于革命不彻底或者坏人（如袁世凯）的破坏。在以往的“革命话语”叙述中，辛亥革命是孙中山领导的，推翻帝制是革命派的功劳，不承认所谓“立宪派”或者“改良派”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而是更多地强调“立宪派”或者“改良派”对革命产生负面的作用。但反过来，在那些质疑、否定、反对革命的人们看来，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社会秩

序大乱,革命带来的是大灾难,还不如改良。他们认为,革命就是孙中山造成的,所以他要对后果负责。

马国川:实际上,这两种观点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即都认为是孙中山造成的,分歧在于,一种观点认为他做得很好很对,另一种观点认为他做得不好不对。

雷颐:对,这两种观点对革命的价值判断完全相反,但对革命的“发生”的认识却是非常一致的。历史的真相并非如此。满清垮台是多方面合力作用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清政府自己制定的政策一步一步地把自己弄垮。

马国川:此话怎讲?满清为了自己的生存还是做了许多努力的,而且晚清新政的许多改革措施似乎也是顺应潮流之举啊。

雷颐:我们不能脱离当时的情景简单地说改革搞得好或不好。晚清确实推出了一些改革措施,可是它的改革进度和成效并没有符合当时的社会心理预期,尤其是不符合士绅阶层的社会心理预期,而士绅阶层是满清帝国的基础。大量的文献资料证明,自1905、1906年以后,尤其是1908年以后几乎所有士绅都对清廷失望了,士绅的态度越来越激烈。

马国川:这里涉及了一个重要问题,即改革进度与成效由谁说了算?不能由执政者自己说,而是只能由社会公众来判断。如果改革没有满足了公众的社会预期,那么不管执政者如何夸口,民众也不会承认。

雷颐:对,改革进度与成效,要看改革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社会预期。在任何一个国家里,改革都只能由执政者来做,因为权力在他们手中。如果判断改革的权力也由他们来掌握,那么他们怎么可能承认自己是不改革呢?!

士绅阶层是满清帝国的基础。这个阶层对帝国改革失望之时,也就是帝国政权根基动摇之日。你看武昌打起来时,很多地方的士绅没有站在清政府一边,而是作壁上观,甚至有些人支持革命党。这和五十多年前太平天国时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的士绅主动组织起来,为维护道统、名教

而战,从而挽救了满清政权。甚至和前些年孙中山领导起义相比,士绅也多是观望,所以那些起义都不成功。

## 制度优,则国家强

马国川:为什么清政府的改革不成功,也就是说,为什么执政者的改革没有符合当时的社会心理预期?

雷颐:这要从更早一点开始说起。戊戌维新本来是一个好机会,可是被满清镇压了。慈禧全面开倒车,鼓动义和团“灭洋辅清”,招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慈禧仓皇出逃。她杀掉了一百多名大臣,只求自己不被追究责任。到这时,慈禧已经威望扫地,满清政府威信扫地。当一个政府丧失了公信力的时候,不管它做什么,公众都会摇头质疑。尽管如此,一般士绅仍然心存希望,因为他们知道这个社会必须变革,应该在政府领导下自上而下地进行变革。

马国川:是不是说,当时改革仍然是社会共识?

雷颐:可以这样说,革命思想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是主流,革命只在社会边缘人群或会党之类的底层里有些影响。所以,孙中山革命始终没有大的成果,多次起事的影响都微之甚微。

1904年开始的日俄战争是一个重要历史节点。维新运动之后,立宪运动处于低潮,日俄在中国东北打起来后,梁启超就判断,日本会胜。而反对改革、反对立宪的革命党人认为,俄国会胜。因为从近代以来,没有过亚洲国家打败欧洲国家、黄种人打败白种人的先例,而且俄国是君主专制,效率比君主立宪的日本高。

马国川:君主专制的效率高,民主制度效率低,这种思维似乎流行至今。

雷颐:日本也不是民主制度,但是起码有国会等制度对君权进行一定的限制。梁启超们认为,君主立宪要比君主专制进步,进步的必然战胜落后的,所以日本会赢。

结果,日本战胜了俄国,近代以来第一次亚洲国家打败欧洲国家,印

证了梁启超的预言。许多中国人从这个结局中得出结论：胜败不在于欧洲或者亚洲，也不在于人种，而在于制度的优劣。制度优，则国家强。因此，日俄战争之后支持立宪的人空前多起来，立宪运动由低潮转入高潮。当然，我们今天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在那个年代国人还是从强国的角度来理解和支持立宪的，认为立宪可以使国家强大，不受外国欺负。人们还没有意识到，立宪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以个人的权利限制政府和国王的权力。

马国川：日俄战争结束不久，1905年孙中山就在日本成立了同盟会，革命势力也在发展呵。

雷颐：本来孙中山没有什么力量，日俄战争也帮助了孙中山。因为日俄战争开始时，俄国霸占中国东北，很多留学生血气方刚又爱国，组织了“驱俄义务队”等组织，但是清政府始终对于民间的行为抱警惕、敌视的态度，压制留学生的爱国行为。这些留学生本来都是支持清政府的，视孙中山为大逆不道而远离之。一些留学生开始接近孙中山，清政府的行为使得留学生从亲政府走向革命。

蔡元培的变化就很典型。最初他主张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俄国，俄国像是个强盗，清政府是中国人的仆人，先不要打仆人，而是要把强盗打跑，从他手里夺回我们的东西。但是当清政府采取镇压态度之后，蔡元培就开始倾向革命。

马国川：日俄战争是一个分水岭，立宪派士气大振，革命派也开始壮大。

雷颐：总起来看，立宪的力量要比革命的力量大得多。

在重重压力之下，清政府也开始搞新政，只是远远没有达到立宪派的期望值。但是人们总是希望最好由上而下的改革，因此当清政府在1906年9月下旨宣布“预备立宪”之后，害怕革命暴力的人们似乎看到了希望，大城市里张灯结彩，洋学生、新学生自动游行集会，大喊“万岁万岁万万岁”。

## “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厂也”

马国川：当时可说是“民气可用”，清政府完全可以、也应该有一番作为。

雷颐：真要改革的时候，问题马上就出来了。清政府说，什么准备都没有，突然立宪也不行，要先改官制，搞行政体制改革。怎么搞呢？由袁世凯牵头的“改革领导小组”决定把军机处去掉，成立内阁。满族贝勒们如何安置呢？计划仿照英国的做法设立上议院下议院，皇亲国戚进上议院作议员。满洲权贵认为这种改革将剥夺自己的权力，群起反对。在一次会议上，甚至有皇族子弟挥舞手枪，与袁世凯正面冲突。袁世凯也想改革内务府，还没有讲如何改，一群太监就把他围起来，差点发生暴力。

一般汉族大臣也反对袁世凯的改革。有人说袁世凯有野心，想担任责任内阁总理大臣，大权独揽。也有人说，内阁制不符合中国国情。责任内阁要向国会负责，中国现在没国会，很容易形成总理大臣专政。历史上的权臣就是这样出来的。总之，有各种各样的反对改革的理由。

马国川：改革必然触犯既得利益集团，关键就看改革者能不能战胜利益集团的私利。

雷颐：最主要的反对力量就来自于满族的亲贵集团，因为他们是既得利益者，一点利益都不肯让出，缺乏长远的眼光。改革推行不下去了，袁世凯本来以为最高权力者慈禧支持他，而慈禧看到阻力这么大，就命军机大臣瞿鸿禨主导改革。已是众矢之的的袁世凯知道大事不妙，他赶紧把各种兼职辞掉，把大部分北洋新军的指挥权交出来，表明没有野心。

在这种情况下，瞿鸿禨的改革只能是妥协的方法。新成立的几个政府主要部门仍然多由满洲人当尚书，外务部由汉人当尚书，但在尚书之上新设管部大臣和协办大臣两个满洲人的职位。改革方案公布了，汉族官员更加不满，广大士绅大失所望。当时一个有名的保皇派徐佛苏给梁启超写信说，数月之改革，仍是本来面目，旧的还是一样，没有进行任何改

动。政界之事反动复反动。当时梁启超在东京，他给康有为的信中说，我在东京这边和革命党人论战，留学生是支持我的。清政府的行政改革方案一出来，大家都说是假的，支持孙中山的人就多了。

马国川：在革命派和立宪派的论战中，梁启超是很雄辩的，为什么也难以说服人们呢？

雷颐：严格从逻辑道理上来说，在和革命派的论战中，梁启超说得更有道理，通过政府自上而下的改革，肯定是社会动荡最小、社会成本最低的。通过草根革命推翻政权，社会成本肯定大得多。但梁启超的道理必须有一前提，就是执政者愿意改、真心改，如果最高统治者不真正改革，梁启超观点的逻辑大前提就不存在了。事实上，在现实政治面前，雄辩的梁启超碰壁了。

1907年初，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了一篇文章《现政府与革命党》的文章，他虽然坚决反对革命，反对革命党，但他很客观地说：“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职志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也就是说，现政府不改革，就使主张改革的体制内的人越来越极端，跑到革命党人那边去了。在革命和立宪的赛跑中，革命的步伐越来越快，给革命加油的不是别人，而是反对革命的清政府。这就是历史的吊诡之处，也是让读史者慨叹之处。

## “立宪派也走向革命”

马国川：清政府“预备立宪”就是一个严肃的改革承诺，如果自己食言而肥，那就怪不得别人的唾弃。

雷颐：清政府也很奇怪，梁启超这篇文章发表不久，似乎是为了证明“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厂也”，在1908年秋天公布了《钦定宪法大纲》。清政府立宪的样板是日本明治宪法，而明治宪法是模仿普鲁士宪法，但是和普鲁士宪法比起来，明治宪法规定的皇帝权力要大得多。而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皇帝的权力比日本天皇还要大。另一方面，明治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比普鲁士宪法要少，《钦定宪法大纲》规定

的公民权利又比明治宪法“缩水”了。例如,明治宪法规定,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有十五条,而清政府简化为九条。明治宪法中公民有居住迁徙的自由、书信秘密不受侵犯、信教自由,包括经过申请可以游行示威的自由,在《钦定宪法大纲》中全无踪迹。

于是,《钦定宪法大纲》甫一公布,天下哗然,几乎所有人都反对。士绅等体制内的改良派更加失望,发文章公开地谴责清政府,政府宁肯与人民一纸之空文,不肯与人民一寸事实,号召人民起来与之争者,人民要起来维权,不要争空文。

马国川:体制内的改革派也这样说,对于政府是极大的打击。

雷颐:士绅们的表现说明,清政府的改革不符合人们的社会心理预期,此时的清政府已经成为众矢之的。从1907年起,立宪派就酝酿着开始发动请愿,要求立宪,要求政治体制改革,地方的士绅和商界首领更加活跃。1910年,发动了四次大规模请愿活动,一次比一次规模大,清政府的镇压一次比一次激烈。到这时,立宪派实际上已经开始走向革命了。

现在的研究者总想搞清政府搞立宪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有的人说是真的,有的人说假的。其实,争论真立宪还是假立宪没有什么意义,更重要的是,作为统治基础的士绅们是如何认识的。如果他们认为是真的,哪怕是假的,清政府的基础就很稳固。如果是真的,但他们认为是假的,清政府就很难维持。这其实是一个政府公信力的问题,如果政府没有公信力,即使真心改革,也会被认为是假的。

政府的公信力没有了,士绅也有了革命化倾向,立宪派也走向革命,那清政府怎么办?慈禧死了,一群年轻幼稚的满洲权贵更没有任何政治远见,只知道进一步收权,似乎只有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才放心。1911年成立的内阁十三名阁员,有九人是满族人,其中七个是皇族。这违反了皇族成员不能当内阁成员的一般规矩,因此被人讥讽为“皇族内阁”。请注意,这是1911年呀!这是导致清王朝垮台的一大原因。从改官制到这次皇族内阁,清廷的利益边界不断清晰化,狭窄化,不断收缩,不断收权。



## “国进民退”大败笔

雷颐：“皇族内阁”是政治上的失误，清政府在经济层面也有许多失误。一个社会的经济制度应该基本稳定，不能变来变去。而晚清以来的经济政策始终没有法则，谁有权就执行什么样的政策。李鸿章掌权比较支持商人，在经济政策上比较开放，袁世凯掌权就收归国有。

马国川：老百姓不是靠政治吃饭的，经济政策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生活，因此经济政策更应该相对稳定，让人们对未来有稳定的预期。如果没有稳定的预期，民心惶惶，国家肯定难以稳定。

雷颐：可是偏偏在民众对政治改革失望之际，清政府又在经济政策上大转弯，实行了铁路国有。最初，清政府一直反对修铁路，当它意识到修铁路会给国家政府带来好处后，就主张多修，修铁路没有钱，怎么办？就让商人自己组建公司修。于是各地的铁路公司都成立了，民众入股参与。但是后来清政府和外国人银行团谈判，有了大量贷款，知道铁路很能赚钱，就想把铁路收归国有，由国家来办。国家办也可以，问题是清政府不按照市场价格购买商人们手中的股权，商人当然不干，湖广的士绅就掀起“保路运动”。湖南士绅与朝廷关系密切，清政府就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广东的铁路投资者都是华侨商人，和朝廷没有关系，和当地老百姓也没关系，他们自认倒霉，既然“投资环境”不好就撤资回去了。

关键是四川。四川人觉得川汉铁路能赚钱发财，参与者众多，很多农民甚至将土地入股。因此，从最富的富翁到非常穷的穷人，都买了川汉铁路原始股。清政府没有那么多钱购买人们手中的股份，就规定以很低的价格回收。对于富人来说，损失或许不大。但是对于穷人来说，可能意味着倾家荡产。所以四川的民众对这种形式的“国进民退”很愤怒，“保路运动”如火如荼。不过，四川“保路运动”的领导者仍然是士绅，他们和平请愿，把当年朝廷允许民办铁路的圣旨当街悬挂起来，烧香供奉。

马国川：对于这种和平请愿，政府如果能够平心静气地对待，甚至坐下来谈判，未尝不可以妥协解决。

雷颐：当权者自恃刀把子在握，不肯妥协。四川总督赵尔丰把“保路运动”的上层领导者抓起来了，民众围着总督府示威，要求放人，赵尔丰下令开枪，打死了30多个人。整个四川愤怒了，和平请愿变成了武装暴动。清政府从湖北调新军去镇压，武昌空虚，1911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发动起义，才打了几枪，湖广总督瑞澂就跑了，他把司令部设在长江上的一个军舰上，意味着他随时准备跑路。朝廷马上派陆军大臣荫昌率北洋兵去镇压，可是荫昌不敢进湖北，停在河南信阳，在朝廷一再催促下，才坐火车开到湖北，但要求把司令部设在列车上，两个火车头一南一北，随时可以跑。官员都是这样，清政府还能够维持多久吗？！

所以，一个“皇族内阁”，一个“铁路国有”，这是清王朝垮台的两大直接原因。相对而言，对政权稳定影响更重大的是经济制度。为什么士绅一定要开国会、要立宪？除了认为制度能使国家强大以外，他们也切身感到，在皇权专制之下，由于没有稳定的经济制度，财产权是没有保障的。

马国川：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的皇权制度之下一直实行私有经济，政府对于经济没有什么干预。为什么晚清会有经济政策的变化？

雷颐：中国历史上确实一直允许私人经济发展，直到近代钱庄、票号等金融机构都允许私人开办。但是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坚决不许私人从事新式工商业，不允许老百姓用机器生产民用品。曾经有一个华侨商人从外国进口碾米机，马上就被拆除了。洋务运动中，官办的军工厂生产枪炮供军队用，但是清政府没有财力支持工厂。李鸿章想了一个折衷的办法“官督商办”，工厂名义上注册是国家的，由商人经营，用机器生产民用品，追求利润。以前造枪造炮是为了求强，生产民用品是为了求富，从求强到求富，这是中国洋务运动发展的重要一步。“官督商办”的一大问题是产权不清，注册是国家的，实际出资人和经营人主要是商人。企业做大后，问题来了：利润应该属于谁？商人认为，我出钱我经营当然都是我的；清政府认为，注册是国家的，利润应该归国家。

马国川：这些“官督商办”的企业有点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陆的“红帽子企业”，私营业主进行企业注册时，找一个国有或集体单位，挂靠在它下面，然后注册为全民所有制企业或集体企业。后来“摘帽子”时，

就出现了许多纠纷。

雷颐：晚清的轮船招商局就面临类似的纠纷。李鸿章是支持商人的，袁世凯得势后，主张现代化要靠政府，依靠向外国银行贷款，用极低的价格收购商人的股份。袁世凯被赶回老家，清廷仍然沿用这个办法实行“铁路国有”，终于激起民变。

## 与其呼吁“告别革命”，不如吁请主动改革

马国川：看来，清政府的垮台确实怨不得别人，是它自己一步步走向了死胡同。

雷颐：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一步一步都是被动的，都是在各种压力下被迫改革，没有任何主动改革的积极性，于是机会也就一次次从自己的手指缝里流失。

有一个例子最能说明清政府的命运。1865年李鸿章提出设立电报局，却一直不被朝廷批准，最主要的理由竟是电报“用于外洋，不可用于中国”，因为“夫华洋风俗不同，天为之也。洋人知有天主、耶稣，不知有祖先，故凡人其教者，必先自毁其家木主。中国视死如生，千万年未之有改，而体魄所藏为尤重。电线之设，深入地底，横冲直贯，四通八达，地脉既绝，风侵水灌，势所必至，为子孙者心何以安？《传》曰：‘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藉使中国之民肯不顾祖宗丘墓，听其设立铜线，尚安望尊君亲上乎？”在这种逻辑中，电报的性质姓“天主、耶稣”，兴办电报就是入洋教、是背祖叛宗，背叛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人架设电线就是不孝，不孝必然不忠，架设电线必然导致不忠不孝，罪莫大焉！直到十四年后，朝廷才准允李鸿章设立电报。

马国川：这种思维真是可怕，仅仅是一个技术性问题，偏偏要上升到意识形态高度。而一旦转化成为意识形态问题，那就扯不清楚了。

雷颐：还有，晚清沿海开始训练海军，先后建立了北洋舰队、南洋舰队、广东水师等现代化的舰队，但都是地方官自己投钱自己建，标准也不同。左宗棠、李鸿章都提议在中央成立海军衙门，统一指挥。清政府就是

不成立,直到1884年福建水师舰队被法国击沉,清政府才在次年成立海军衙门!

电报的好处,海军衙门的好处,根本不需要统治者“高瞻远瞩”即能明白。但如此“直观”之利清政府都看不清,都办得如此困难曲折,诸如那些“好处”非常间接隐晦、需要长时间才能显现的制度变革,清政府更不可能积极主动进行了。总是在大难之后,如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才非常被动地做某些“改革”。因为非常被动,因此在“温和立宪”与“激进革命”的最后竞赛中,以彻底推翻清王朝的“激进革命”胜出告终。

马国川:“辛亥革命”这些年来几乎成为“激进”的代名词,有些学者对清政府的“新政”、“立宪”被辛亥革命“打断”而深感遗憾。他们认为,“新政”、“立宪”还是很有成效的,如果坚持下去,中国也许早就实现宪政了。

雷颐:我不否认“新政”的成绩,但是这些新政没有满足士绅的心理预期,最终失去了士绅们的支持。我们不能脱离历史的情境,以某种哲学的思维方式来对待历史。我们可以对历史进行哲学的反思,但是不能以哲学的逻辑代替真实的历史。

不经革命的大动荡大破坏而收革命之实效,是值得追求的理想状态。问题在于,这种理想状态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并没有实现的可能。被尊为“辛亥之父”的孙中山并非一开始就想“干革命”的,起初也是想方设法上书清政府,想走“改良”路线的。只是在“改良”被拒之后,他才立志走上“革命”一途的。发动辛亥革命的“革命党”无疑是激进的,然而,开始只是人数极少、原本很难成气候的革命党,为什么最后竟能一举推翻清王朝,结束中国几千年帝制?把“功劳”都推给革命党,符合历史吗?

马国川:在某种意义上,晚清的历史就是一曲“改革与革命的双重变奏”,最终革命压倒了改革。反观这段历史,有哪些教训应该汲取?

雷颐:纵观晚清历史,每当还有一线希望、还能控制一定局面的时候,清廷总是拒不变化;只到时机已逝、丧失了操控能力的时候,它才匆匆忙忙地被动“变革”。改革愈迟,所付出的“利息”也将愈大。然而清廷对此似乎毫无认识,它总是在下一个阶段才做原本是上一个阶段应做的事情,

而且拒不“付息”，不愿再多做一点让步和妥协，完全丧失了变革的主动权，完全是被“形势”推着走，改革的空间终于丧失殆尽。

“改革”是当事各方都以理性的态度妥协的结果，只要有一方坚持不妥协，就无法“改革”，社会矛盾必然以“革命”一类的暴力方式解决。一场巨大的社会革命，并不是革命者的主观“激进”造成的。在社会矛盾中，统治者往往居于“主导”地位，革命往往是由上层的种种“极端”触发、造成的。所以，与其说“革命”是下层“激进”的结果，不如说是被上层的“顽固”逼迫出来的；与其指责下层“过激”，不如指责上层的“顽固”；与其呼吁被统治者“告别革命”，不如吁请统治者主动改革。

## 如何告别革命？

马国川：与其呼吁被统治者“告别革命”，不如吁请统治者主动改革，你的这个观点对于今天的中国，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雷颐：整个社会要建立理性，但更重要的是政府要冲破阻力，主动改革。社会边缘群体总是存在的，激进的革命者在任何社会任何朝代任何时候都有的。但是一个良好的社会制度，或者统治者能不断的改良革命，这种人只能是很少数的边缘人，不可能成为一个舞台中央主导历史发展的一个动力。例如，美国也有激烈批评美国一切、想推翻美国政权的人，但他们从来只能居边缘地带。

我们这一代人从小读列宁、斯大林的书，因为“文革”期间可以读的书不多。后来我读了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的《列宁回忆录》，引起了我的思考。瑞士政治开明，接纳了大批俄国、波兰被迫流亡的革命者。因受沙皇政府迫害，列宁曾长期流亡瑞士，在瑞士生活稳定，从事革命的实践和理论研究也颇自由，基本不受瑞士政府干预。条件如此优越，可说是革命者“理想的”流亡地，但列宁仍非常讨厌瑞士。

马国川：为什么？

雷颐：列宁夫妇对日内瓦的印象是这样的：“大家在这个小小的、小市民习气严重的、平静的湖滨——日内瓦过得很厌烦。”对伯尔尼，他们

如此评价：“伯尔尼主要是一个行政性和教育性的城市。这里有许多好的图书馆，有许多学者，可是这个城市的整个生活浸透了一种小资产阶级精神。伯尔尼这个地方是很‘民主’的。共和国的高级官员的妻子每天在凉台上抖弄地毯；伯尔尼的妇女完全被这些地毯和家庭的舒适生活吸引住了。”伯尔尼有很少的几位左派分子，列宁对瑞士的左派组织当然很感兴趣，便指派一位俄国革命者与他们的两位领导人直接联系，想讨论一些重大问题。但没想到，怎么也见不到这二人，不是这位钓鱼去了，就是那位忙于晾衣之类的家务事。列宁夫人感叹道：“钓鱼、晾衣服——这些事儿都不坏”，“但是当晾衣服和钓鱼之类的事情妨碍了重大问题的讨论、妨碍了讨论左派组织问题时就不很好了”。连左派组织的领导们都把休闲、家务看得比政治更重要，遑论他人！

对苏黎世，他们的印象似乎要好一些：“苏黎世比伯尔尼热闹些。苏黎世有许多具有革命情绪的外国青年，有工人群众，这里的社会民主党比较左倾，这里小市民气也似乎少一些。”不过，苏黎世最终也令他们失望。列宁当然认识到瑞士没有强大的工人阶级、工人的革命情绪不高，不可能成为社会革命的发源地，但作为革命者，他们认为：“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不必在瑞士进行国际主义的宣传，不必帮助瑞士工人运动和瑞士的党革命化起来。”所以，他们就和波兰流亡者一起，与苏黎世的瑞士工人组织举行一系列联席会议，主要是列宁给瑞士工人演讲，分析当前形势，以使瑞士工人组织“革命化”。但工人们却对列宁尖锐、激烈的观点感到困窘不安，有位青年代表甚至反驳他说，用前额是碰不透墙壁的。列宁夫人不无自嘲地写道：“结果，会议涣散起来了。第四次到会的只有俄国人和波兰人，我们就这个事实讲了一阵笑话，便各自回家去了。”

马国川：俄国“革命者”与瑞士“小市民”的格格不入。

雷颐：瑞士生活安定安逸，但革命者恰恰认为这是“充满小市民气息”，所以列宁在瑞士流亡多年，但“怎么也不能去掉这种被囚禁在小市民式的民主主义笼子里的感觉”。1917年3月下旬，列宁离开了令他讨厌的瑞士，返回俄国，几个月后就领导了震撼世界的俄国十月革命。十月革命被视为“开创人类新纪元”的伟大革命，列宁被誉为“伟大的革命导

师”。然而，他在瑞士几经努力却无法使一个小小的工人组织“革命化”，更不必说让其走向革命。

马国川：当时瑞士的社会福利很好，穷人生病都能住进疗养院，这样的社会很难发生革命，很难产生大动荡，即便最伟大的革命者、最激进的造反者，都将一筹莫展。

雷颐：其实，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会有“激进”者，但只要社会制度良好，并具自我改革、调节功能不断纾解社会矛盾，平民百姓自然安居乐业，所谓“激进”只能是少数人的信念，社会影响微乎其微。政治民主、清明，公民权利和社会福利都有保障，任何“激进”自然都没有市场，根本鼓动不起社会风潮，只能无奈地指责社会“充满小市民气息”。

革命、动荡实非“激进”制造出来，而是统治者拒绝制度改革，种种社会矛盾越积越多越来越尖锐最后的总爆发。所以，若要真正“告别激进”、避免社会大动荡，对“激进主义”的分析批评固有必要，但更重要的是统治者要正视现实、审时度势，主动进行制度变革。

清王朝以自己的失败告诫后人：如果进退失据，步步被动，一拖再拖，一误再误，最终不仅会丧失了主动变革的机遇，危及政权的稳定，更重要的是将使中华民族现代化的进程被大大延误。历史不远，不可不鉴！

采访时间：2011年2月12日

采访地点：北京 芳古园









## 纵论辛亥革命

### 周有光

语言文字学家、文化学家。原名周耀平，1906年1月生于中国江苏常州，毕业于圣约翰大学。青年和中年时期主要从事经济、金融工作，曾担任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1955年开始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曾参加并主持拟定《汉语拼音方案》（1958年公布），被誉为汉语拼音创始人之一。1980年担任翻译《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和顾问委员会中方三委员之一。80岁退休后，转向文化学和人类历史研究。主要著作有：《中国拼音文字研究》、《汉字改革概论》、《比较文字学初探》、《现代文化的冲击波》、《周有光百岁新稿》、《朝闻道集》、《拾贝集》等。

## 采访手记

“有一天，我们家的长工带着我出门看热闹。我看见，进城的农民被剪了辫子，痛哭流涕”，周有光老人回忆起童年的往事，脸上绽开天真的笑容。

记者面前闪现出这样的历史镜头：那是整整一百年前，武昌起义所激起的革命风云在全国各地鼓荡。五岁的周有光站在常州的街头，眼睛被革命带来的新气象所吸引。历史的一幕深深地烙在他的脑海里，虽历经百年沧桑，记忆如新。

今年一月份刚刚度过一百零六岁生日的周有光先生，依旧精神矍铄，记忆饱满，思路清晰。这位出生于1905年的老人，见证了晚清以来整个中国的近现代史。这个走向现代化的国家历经磨难，周有光的命运也随着时代大波起伏跌宕。

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以后，周有光从事经济、金融工作，兼任经济学教授；1955年他从上海调入北京，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从事汉语拼音方案制定工作，主持编制国际通用的“汉语拼音方案”，泽被亿万人。八十五岁那年他离开办公室，从此离开他的语言文字专业研究，开始转向历史和文化，研究人类文化发展规律。

去年，周有光推出的新著《朝闻道集》，得到读者的追捧，荣获深圳读书月“2010年度十大好书”；今年，他又出版了新著《拾贝集》，其中闪耀着这位历史老人对人类文明和中外历史经验的理性反思，对国家社会种种问题的精辟评论，再度受到读者的追捧。

周有光的家乡江苏常州位于上海与南京之间，历来为江南富庶之地，文化发达之乡。周有光说，辛亥革命也给这个地方的普通民众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第一，从此没有了皇帝。皇帝存在了两千年，忽然一天没有了，这是天翻地覆的改变；第二，老百姓的负担减轻了，满清苛捐杂税太

多；第三，建立了许多新式学堂，晚清就开始有了新式学堂，但是革命后更多了。我进的就是新式学堂”。

在周老看来，辛亥革命是一场伟大的历史变革。



## 革命不革命,要看它是进步还是退步

马国川:有学者说,清末形成了“改革和革命赛跑”的局面,一方面革命党人鼓动革命,一方面清王朝实行废科举、改官制、设谘议局等改革措施,为什么“改革跑不过革命”呢?

周有光:“改革和革命赛跑”的说法不准确,改革也是革命。

革命有流血的革命,也有不流血的革命。1688年,英国推翻詹姆士二世的统治,建立君主立宪制政体,就是一场没有流血的革命,历史上称为“光荣革命”。在民主制度发展历史上,光荣革命是一个重要的步骤,《权利法案》就是这场革命的成果,它规定:国王未经议会同意不得停止任何法律,未经议会同意不得征收赋税,国王不得干预议会事务,议会必须自由选举,议员有充分的言论自由。这个限制王权的法案是英国宪法的基本文件之一。

马国川:光荣革命没有打仗,没有死人,是和平的革命。

周有光:是和平演变。革命不革命,要从历史角度来看,它是进步还是退步?暴力推进的革命,假如是退步的,即使打仗打胜了也不算革命。不是打着革命的旗号就是革命。历史的评价,至于政治宣传是另一回事,每一个朝代都是这样的。

假如推翻了一个皇帝,自己又当了皇帝,或者是不叫皇帝的“皇帝”,那就不是革命。根据国外一些学者的研究,二十世纪中国的许多所谓“革命”并不是真正的革命,因为“革命”后不但没有把中国推向前进,反而使中国落后了。例如,“文化大革命”就不是革命嘛。

马国川:那么,您认为辛亥革命是真正的革命吗?

周有光：辛亥革命是真正的革命，了不起。

## 提高对慈禧的评价是错误的

马国川：在辛亥革命前，清王朝也进行了一些变革，例如最早的洋务运动。

周有光：洋务运动是进步的。解放后反对洋务运动是错误的，现在改正了。洋务运动很幼稚，而且都是大官僚来搞的，普通人没有这种条件。洋务运动搞得乱七八糟，但它也做了一些小事情。

清朝末年的“戊戌变法”，康有为要改革，但是慈禧太后不让改，最后没有成功。慈禧太后是反对改革的，也就是反对革命的。康有为主张君主立宪，改革就是革命。在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进行革命，康有为是第一个，虽然失败了，但影响是很大的。戊戌变法留下来的就是一所京师大学堂，也就是北京大学的前身。

马国川：庚子之变后，清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废科举、改官制、设谘议局等，后来的历史学家称为“清末新政”。慈禧太后作为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是“清末新政”的领导者，所以现在有些学者对于慈禧太后也有了新的比较高的评价。

周有光：当权者一开始不想改革，后来没有办法了才同意。

慈禧太后是坏人，是一个彻底的坏人，她是中国的最后一个女皇帝，真正的女皇帝。她没有做什么好事情，有的改革是她没有办法了，才同意的。

马国川：1906年废除运行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就是慈禧同意的，这是很有革命性的举措。

周有光：慈禧太后废除科举是被迫的，怎么是她的功劳？废科举是一种维新运动，清朝末年像康有为这样的人不是一个，有好多人。他们是进步的知识分子，他们立志要改革。广义来讲，清末的改革都是维新运动，主要是学日本的明治维新，因为明治维新搞成功了。

晚清政府废除了科举，新式教育开始兴起，不过晚清时新式学校很少，只搞了一点点。清王朝垮台后，新式学堂才真正兴办起来。我进小学

就是新式学堂,那时候皇帝已经没有了。

马国川:现在也有些人对慈禧太后评价很高。

周有光:因为中国有些人喜欢皇帝嘛。清王朝垮台后,还有些人虽然不叫皇帝,实际上就是“皇帝”。提高对慈禧的评价,我个人看,是错误的。

## 康有为前进了半步,孙中山跨出了一步

马国川:在清末的改革中袁世凯非常积极,力推改革,您怎么评价袁世凯这个历史人物?

周有光:袁世凯也想做皇帝。辛亥革命后,他本来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做中国的“华盛顿”,他思想太坏,自己当皇帝,所以他失败了。客观来讲,他把清朝搞掉了,也算做了一件好事情,很勉强。总体来讲,我对袁世凯是否定的。

袁世凯是练新兵起来的。其实在他起来以前,已经有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他们都有进步性,而太平天国是落后的。以前的理论有一个错误,好像农民运动都是进步的,完全不对的。

马国川:康有为反对孙中山的革命,鼓吹改良,怎么评价这些改良派呢?

周有光:改良也是革命。康有为搞维新运动,维新运动是进步的。康有为主张保留皇帝,实行君主立宪。君主立宪制是民主运动的初步形式,英国不也还是君主立宪吗?所以说,康有为的维新运动是进步的。

马国川:都是进步的,那么康有为和孙中山的区别是什么呢?

周有光:孙中山不要皇帝,康有为要保留皇帝,他们的主要区别是在这里。所以,康有为是前进了半步,孙中山才跨了一步。

马国川:但是辛亥革命后,康有为又搞复辟,这就有点问题了。

周有光:那是不重要的,不能拿后来的事情来否定他。那个时候康有为已经没有什么权力了,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做不出什么事情了。

马国川:现在,对于孙中山的评价分歧很大,有的说他是民主革命的

伟人,有的说他是“空头革命家”,您怎么评价孙中山?

周有光:孙中山是伟大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当时是很进步的。民族主义、民生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孙中山做的好事很多,坏事很少,基本上是成功的。要知道,他那时候比较困难,不容易。

马国川:他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家。

周有光:他是革命家,是革命的,是进步的。国民党是他创造的,国民政府是根据他的理论来搞的,做了许多成功的事情,国民政府的功劳跟孙中山是分不开的。现在把国民党完全否定了,这是不对的。孙中山的功劳要跟国民党整个功劳放在一起算,他死了以后,国民党就按照他的规定来做。

马国川:但是国民党后来也是独裁啊。

周有光:孙中山讲的很清楚,革命要分两步来走,第一步是军事革命,必须要独裁。军事革命成功以后,就要搞民主革命。

那么,蒋先生做的坏事呢,就是他没有走民主道路。我为什么讨厌蒋介石?就是因为他是搞专制的,而共产党宣传的恰恰是要走民主,所以当初我们欣赏共产党。

### 三千年的历史大趋势

马国川:近年来,有些人对于辛亥革命提出了强烈批评,呼吁“告别革命”。您怎么评价这些观点?中国是否需要“告别革命”?

周有光:什么叫革命呢?许多人都没有搞清楚。我们要从整个历史来看,有些个人的文章、个人的观点没有什么价值。苏联瓦解以后,整个世界上,历史学大大进步了,中国的历史学也要进步。

马国川:“告别革命”的观点认为,不要以一种暴力的方式来推翻一个政权。

周有光:用暴力或者和平的方式都可以进行革命,要看当时的条件。

马国川:辛亥革命缔造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共和国,但是为什么没有实现民主,仍然是走向共和?

周有光：因为民主是很难的，统治阶级不是一个人啊，是一个集团。

像日本也是一步一步走的，明治维新是君主立宪，仍然保留着贵族的利益。

马国川：从辛亥革命到现在已经一百年了，在您看来，这一百年可以大致分为几个历史阶段？

周有光：这一百年可以分为四个历史阶段，四个时代。

第一个时代是北洋政府，军阀政府，搞得好多乱七八糟，但是在文化上面，像蔡元培在军阀下面做了好事情，在清朝的历史背景下把北京大学建设成为一个好的现代大学，非常了不起。直到今天，我们还要感谢蔡元培先生。今天的大学要搞好，还是要学习他，按照“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的原则来改革。

第二个时代是国民政府。根据国外的研究，国民政府做了五件好事情。第一个是统一中国，第二是废除不平等条约，第三是收回租界，第四是收回台湾，第五是废除厘金制度。

第三个时代是毛泽东时代。

第四个时代是改革开放时期。

马国川：如果从一百年来历史来看，历史的大趋势是什么？

周有光：历史的大趋势不能从一百年来看，要从三千年来看。三千年的历史大趋势是：在经济上，从农业化到工业化再到信息化；在文化上，从神学到玄学再到科学；在政治上，从神权到君权再到民权。

在经济方面，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同时进入信息化，但是水平非常低；在文化上，中国思想界如今神学思维、玄学思维仍有影响，科学思维需大大加强。如果走不出神学玄学，实现现代化就是一句空话；在政治上，民主是必由之路，但是中国搞民主仍有很长的路要走的，传统里民主思想很弱，历史又长，包袱越大，改革越难，所以要有耐性。慢一点进步也是进步。总之，中国不可能不走上民主道路。

采访时间：2011年2月25日

采访地点：北京 东城区 周有光寓所





## 辛亥革命是必要的

## 杨天石

著名历史学家。1936年生，江苏东台人。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央文史馆馆员、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常务副会长。长期研究中国文化史与中国近代史，尤长于中华民国史、中国国民党史和蒋介石的研究。主要著作有：《杨天石近代史文存》（五卷本）、《杨天石文集》、《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第一集、第二集等。

## 采访手记

看到“东厂胡同”这个地名，首先想到的是一度成为电视屏幕热点的大明王朝。

纵观中国历史，明朝皇帝恐怕是中国历史上最不堪的一群。他们摆脱不了暴虐和恐惧的精神状态，于是在正常的司法机关之外设立直接听命于己的特务机构，以窃听、监视等可耻手段控制臣民与天下。三百六十多年过去了，大明王朝早已灰飞烟灭，当年的趾高气昂的特务们又安在哉？只剩下一个地名供人聊发感慨而已。

完全是历史的巧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就坐落在东厂胡同里。从王府井大街转进东厂胡同，走不多远，路北一幢大楼就是近代史所。这确实是一个研究机构，没有大学的喧闹，也没有酒店的豪奢，朴素的大楼里静谧安详。我在铭牌上写着“杨天石”的一间办公室门前停下来，轻轻地敲响了门。

门开了，杨天石先生请我走进了他的办公室。与其说是办公室，不如说是一个书房。三排高大的书架纵向站立在房间里，把主人赶到了一个逼仄的角落里。一张旧式办公桌横放在窗台下，桌子上也堆满了书籍，其中几本打开的书摊放在杨天石先生的面前。

七十五岁的杨天石先生面容清瘦，恂恂有儒者之风。然而，就是这位静心爬梳史料的学者近年来成为一个广受关注的名人。他的著作《找寻真实的蒋介石》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六十多年来，大陆对老蒋进行妖魔化，简直将他塑造成了一个杀人魔王，杨天石先生引用第一手史料，让蒋介石回到了人间。

蒋介石并非没有道德底线的如明朝皇帝之流的统治者，恰相反，他对自己有一种很高的道德要求，是一个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与节操的恪守者。他也不是一个铁腕人物，而是有些优柔寡断的人……这些颠覆性的

结论,当然不见容于那些脑袋里至今仍然有“贵恙”的人们。据说在该书出版之前,就有人“上书”反对出版该书。最后经过高层调阅,才准予出版。

“我一向不赞成把历史学当成工具来看待”,杨天石先生对我说,“历史学是科学,历史学家只承认历史的真实,只承认历史的本来面目。历史学家的任务应该是还原或者重现历史的本相。”

为什么要还原?因为历史的真相被遮蔽被歪曲了,尤其是近代史。1929年陈寅恪在为北大史学系毕业生赠诗云:“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田巴鲁仲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斯耻!”当年“群趋东邻受国史”,是因为日本对中国历史的研究远远超过中国。八十多年后呢?且不说研究,连历史真相都扑朔迷离了。

我记得周有光先生曾讲过这样一件趣事:“我的一个孙女在英国读了两年书,又到美国读了两年书,回来后我问她,在外国几年,你有什么感想?她说在英国美国读书都很顺利,可是有一件事使她很难受:外国学生经常有小组讨论,讨论的问题讲到中国,外国人都知道,就是中国人不知道。”

呜呼!国人不知历史真相,谈何吸取历史教训?

九十年代读《随想录》,对巴金先生一再担心“文革”重来有些不以为然;前几年,读《中国发展新阶段需要研究的若干重大问题》,发现吴敬琏先生也担忧反对改革者有可能重拾“阶级斗争为纲”,开历史倒车,也以为是过虑了。可是,近一两年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思潮,我才惊觉,巴金先生和吴敬琏先生绝非“杞人忧天”!为什么国人不能对一场巨大的历史劫难保持警觉?因为这次历史劫难的真相被遮蔽了!国人不知历史真相,谈何吸取历史教训?!

致力于“重现历史的本相”的杨天石先生也对现实深表忧虑。“我们无非是希望进步得快一点,希望不要倒退”,杨先生说,“我只有一个希望,不要倒退。”

## 历史学家要对历史负责

马国川：这些年来，历史学家作了大量正本清源的工作，澄清了历史的真相。如您的著作《找寻真实的蒋介石》就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对于当前社会上出现的“历史热”，您如何评价？

杨天石：我觉得，这是历史在进步，“历史热”有助于人们认识真实的历史。以前的历史科学和政治宣传分不清楚，其实，政治宣传和历史科学是两回事。

马国川：有些人是故意把它们混淆在一起。因为如果有真实的历史，某些政治宣传就没有容身之处了。

杨天石：这里是两种情况，一种呢，是看错了，并不是有意说假话；另一种是为了宣传需要，歪曲一部分历史事实，掩盖一部分历史事实。

我一向不赞成把历史学当成工具来看待。历史学是科学，历史学家只承认历史的真实，只承认历史的本来面目。历史学家的任务应该是还原或者重现历史的本相。胡适当年讲，我们不能把历史当成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如果把历史作为工具来看待，可能会按照自己的需要去打扮历史，那问题就多了。因为既然是工具，那当然就要求历史学为特定时期的任务和目的来服务，这就有可能去掩盖、扭曲甚至篡改历史。

我也不完全反对把历史作为工具来使用。因为历史学总应该总结历史经验，提高人们的智慧，帮助人们总结治国理政的经验，总要为人类的进步，为国家民族的发展服务。否则，要历史干什么？但是，不能违背科学性，必须坚持科学性第一的原则。在做宣传的时候，在强调历史要为现实服务的时候，一定要尊重历史科学，不能够违背历史科学。违背历史科学的宣传是没有力量的，甚至是负面作用。当人们一旦发现说的是假话，

那么你说什么都没有用了。

马国川：在多年的宣传和教育灌输之后，人们突然发现真实的历史原来不一样，很容易产生历史虚无主义，认为历史都是假的，宁肯相信翻案式的历史说法。

杨天石：政治家为了宣传需要，往往会强调历史的一方面，而淡化或忽略历史的另一面。比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批胡适的时候还说，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是有功绩的，可是这个话现在不能讲。也就是说，当发动批胡适运动的时候，其实许多人心里明白，不能完全否定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当然，我不是肯定当年对胡适的批判。

政治宣传和历史科学是有区别的，公众不要以为政治宣传是全面的历史，不能把政治宣传当成真实的历史，也不能因为政治宣传不符合历史而怀疑历史。

马国川：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历史学家不能把历史作为政治工具，这样才能保留历史的真相。

杨天石：历史学是科学，历史学家应该属于社会科学家。历史学家在写历史的时候，要力求全面、科学，一定要对历史负责，对千秋万代负责。

## 革命是必要的

马国川：对于辛亥革命，现在就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些观点完全对立。例如，有的认为辛亥革命是非常偶然的一个历史事件，另一种观点则坚持认为，辛亥革命是历史的必然。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来看，您觉得哪一种观点更客观一点？

杨天石：这些年否定辛亥革命的言论比较多，“偶然论”是其中一种，但是，更多的是“没有必要论”。“没有必要论”认为，按照康有为、梁启超的道路走君主立宪的道路就可以了，清政府已经同意预备立宪了，应该给当政者时间，搞革命破坏很大，死人很多，而且容易形成军阀割据。

最近这一两年来，我发现这种看法又进了一步：认为按照清朝政府的“新政”路线走就可以。因为《辛丑条约》签订以后，西太后从西安回京，

宣布实行新政。有学者讲,“新政”蛮好的,经济搞得不错,社会安定,国库充裕。

马国川:清末新政确实有许多改革举措,包括官僚体制也在改革,有什么必要搞革命呢?

杨天石:这几种看法都不符合历史的本来的面目。新政确实有成绩,比如说,废科举、兴学堂。按照我们今天的观点来说,这是提倡先进文化嘛。还有练新军,这就是军队的现代化。如果满洲贵族愿意改,当然可以往前走。问题是,满洲贵族不想改。

主张按照新政的道路往下走,主张按照君主立宪道路往下走,持这两种观点的学者都没有正视晚清的现实状况。有两件事情可以证明,实际上满洲贵族一点也不愿对君主专制制度做任何实质性的改变。

一个是1908年慈禧太后宣布的《宪法大纲》,她拿出来的是什么样的宪法呢?该宪法第一条就宣称,清朝政府“万世一系,永远拥戴”。也就是说,天下的江山永远是满洲贵族的,永远姓爱新觉罗。第二条是“皇帝神圣,永远不得侵犯”。这两条就把爱新觉罗家族的利益通过宪法固定下来。下面还规定了好多条皇帝的权力,行政权、司法权、立法权都掌握在皇帝手里。

马国川:也就是说,这个宪法比起明治的宪法来还要落后?

杨天石:对啊。这个宪法本来是抄袭日本宪法的。日本宪法也是维护皇室的宪法,但是日本宪法里对君权、对皇室还有限制。可是,清朝政府颁布的这个宪法呢,把日本宪法里推崇皇帝的条文全抄过来了,限制皇帝权力的条文全部不要。订不订法律,法律颁布还是不颁布,大臣起用谁,罢免谁,所有的权力都在皇帝手上。另外呢,开不开议会,决定权也在皇帝手上。同时还规定了许多“不许”,对议员和国会的限制很多,使得议会和议员实际上处在无权的地位。

所以,按照清廷制订的这个宪法,皇帝的权力是最高的,而且几乎是无限的。那么,老百姓的权利呢?对不起,正文里没有,在附则里。附则同时规定,老百姓的所有权利,都必须在法律的范围之内。清政府制订的是什么样的法律呢?比如,宪法是下半年颁布的,上半年清政府就把《报律》和《游行集会律》颁布了。宪法规定人民有言论自由和游行的权利,

可是根据《报律》和《游行集会律》，老百姓所有的权利都是空话。

马国川：看来，皇上权力无限，议员无权，老百姓也无权。

杨天石：所以，实际上《宪法大纲》是保障皇室统治千秋万代。按照这个宪法做下去，有什么意义呢？当时的革命党就批评，这是典型保障君权、而不是保障民权的宪法。

第二件事，清廷又搞了一个“皇族内阁”，占全国人口很少的满族占了内阁成员的大多数。在满人里面，皇族又占了大多数，实际上是把国家的权力完全集中到少数满洲贵族手上了。以前，清朝政府内阁里的主要官员名额至少满汉是相等的。

清朝政府所谓“预备立宪”的结果，是把更多的权力集中到了皇族手上。所以只能说，清政府的改革仅限于次要问题，但在核心权力、核心利益上，满洲贵族“寸权不让”。

马国川：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杨天石：倒退了。所以说，这种改革有什么意义呢？政治制度虽然是立宪其名，但是集权其实啊。为什么革命党要革命呢？不是革命党非要革命不可，而是满洲贵族逼得民众非革命不可。

马国川：革命是被逼出来的。

杨天石：对。统治者在国家的核心权力上寸权不让，哪怕让一点权也好啊。次要的问题上搞改革，但在核心权力、核心利益上寸权不让。康有为、梁启超曾经幻想过“虚君共和”的共和制度。就是说，保留皇帝的名号，让它成为一个象征性的代表，但是没有实际权力。就像英国女王、日本天皇一样。他们对国家的政治生活不能干预。但是，清朝政府走的不是“虚君共和”啊，反而把更多的权力集中到皇室手上了。新政的路，预备立宪的路和康有为梁启超所设想的君主立宪的路，都被当权者堵死了。

你说，不革命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当然是必要的。

## 慈禧这个人

马国川：有些人讲，给当政者一点时间，这么着急干什么？再给他十

年,慢慢也就改过来了嘛。

杨天石:其实这种观点的实质就是辛亥革命“不必要论”。从宪法大纲来看,满洲贵族是一步步的想加强君主专制制度,加强皇室的权力,并没有让权给老百姓的准备。那就等吧,无非是两种可能性,一个是统治者始终不改,“万世一系”嘛,那就永远等下去。另外一种可能性是改,但将是一个漫长的等待过程,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都不好说啊。

马国川: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改革需要强权人物的推动。比如说,晚清时期要由慈禧这样一个威权人物来推动改革,权力当然要集中在她这儿,改革铺开以后,再把权力逐步地让出来。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呢?

杨天石:在某种意义上,改革确实需要威权人物来推动。但是,威权人物不能是一个只为少数人、只为家族私利的专制者。而且,我们也不应该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这样的专制者身上。

马国川:这些年对慈禧的评价也多元化起来了。怎么来评价慈禧这个历史人物呢?

杨天石:对慈禧的评价可以讨论,历史上真正的慈禧和多年来历史著作里的慈禧有差距。

比如,我们多年来一直认为,戊戌变法时慈禧太后反对改革,反对康梁,是镇压维新派的刽子手。翁同龢的日记里有一段记载:戊戌维新开始的时候,有两个维新派人士给光绪皇帝上了一道奏章,吁求变法。光绪皇帝把这件事情向西太后汇报了。西太后同意变法,而且讲了六个字“今宜专讲西法”。光绪皇帝就把西太后的讲话精神传达给翁同龢,让翁同龢起草《明定国事诏》,变法从此开始。

马国川:主张“今宜专讲西法”的西太后,和我们头脑里的西太后太不一样了。

杨天石:翁同龢写了一个折中主义的诏书,大意是,西法不可不讲,中国的礼仪也不能不讲。就是说,翁同龢的诏书还没有西太后思想解放!“今宜专讲西法”很开放,有点全盘西化的味道嘛。这至少说明,西太后



一开始不反对变法。这也可以理解,因为当时中国被日本打败了,举国上下没有人说不需要变法。变法成了主流了,西太后也主张变法。光绪皇帝最初要变的是八股文,但是大臣刚毅不同意。最后光绪皇帝去请示西太后,过了一天,圣旨下来了。可见在废八股文这个问题上,西太后是同意的。

马国川:那么,西太后为什么后来转向反对变法,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杨天石:出在“六堂官事件”上。当时光绪皇帝开放言路,礼部的小官员王照上书皇帝,建议西太后和皇帝共同出国考察,到外边去见见世面。但是礼部的堂官也就是部长拒绝上报。光绪皇帝知道以后很生气,想把礼部官员的六个部长、副部长级大臣全部罢官。礼部满人尚书怀塔布的老婆是陪西太后打牌的人,她到颐和园西太后面前去哭,说光绪皇帝排斥满人。这件事情侵犯到了满洲贵族的利益,更重要的是,侵犯了西太后的权力。因为高官的任免权仍然掌握在西太后手里。要罢免礼部尚书这样的大臣,光绪皇帝没有请示。于是,西太后就站到了变法的对立面。

慈禧并不是一向顽固保守,英法联军侵华的时候,她属于抵抗派;维新变法开始的时候,她说“今宜专讲西法”。她主持的新政比戊戌维新派动作更大。把科举废掉了,把新式学校办起来了,这是一个重大的文化改革。新政提倡奖励实业,资产阶级投资多少就给官做。用我们现在的的话来说,这是提倡先进生产力(这一条,南京临时政府都没有做到)。另外就是办新军,实现军事现代化。还有改革法律,向现代法律前进了几步。所以,新政是有成绩的。

马国川:看来,也不能完全否定慈禧这个历史人物。

杨天石:对她也要有分析。把慈禧看成是一个最反动、最顽固的刽子手,我不赞同。可是进行翻案式的高度评价,我也不赞成。毕竟维新变法是毁在她手上的。其次,她盲目无知地支持义和团,招来了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丧权辱国。如果没有西太后的愚昧、无知和盲目仇外的情绪,不可能有八国组成联军同时侵华。更重要的是,她反对政治体制改革,坚持维护君主专制制度。一个是君主的核心权力,一个是满洲贵族的

核心利益,都是不能动摇的。

马国川:只要是不触犯这些底线,科举可废,实业可提倡,新军可以搞,部分企业也可以让民间来办。正是看到新政的这些改革措施,有人认为,慈禧如果晚死十年的话,中国的改革就可能成功了。

杨天石:在慈禧看来,一切都可以放一放,可是皇权专制不能削弱,满洲贵族的核心利益不能损害。这两点西太后是很坚决的,是毫不动摇的。

如果慈禧晚死十年的假设,就是说再等十年就好了。我看不一定。你说她可能改好了,她要改坏呢?事实上,宪法大纲就是西太后批准的。在新政过程里,她的目的是保障君权专制,保障君主专制主义,保障爱新觉罗家族和满洲贵族的利益。所以,再等十年,她还是要维护爱新觉罗家族利益,要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的不可侵犯的权力。

马国川:个人私利这条线,慈禧从来就没有突破过。看来,对于慈禧这个人物不能给予翻案式的过高的评价?

杨天石:我认为不能给予过高的评价。再给西太后十年时间,未必她有多大的长进,最后还会走到一条死路上去。

马国川:其实,“如果慈禧晚死十年”之类的议论,更多的其实还是从现实出发。认为今后中国不要搞革命了,搞改革,不断地改革,中国也能够变成一个现代国家、现代文明的国家。

杨天石:历史不能假设,也不能把可能性当成现实性。我觉得所有这种议论都是把一种假设、一种可能性当成现实性。历史学不能这么研究。

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在于近代中国革命太多。有些革命是必要的,有些革命确实是不必要的,有的完全搞错了。“文化大革命”有什么必要?因为近代中国革命搞多了,搞乱了。所以人们产生了厌烦革命的心理,于是有了“还不如不革命”之类的议论。

## 立宪派不过是附和革命

马国川:梁启超和康有为到后期鼓吹改良,反对革命。怎么评价以康

梁为代表的这些改良派人物呢？

杨天石：其实这两个人一开始都有比较进步的思想。从康有为早期著作来看，他强调人生来都是平等的。戊戌失败以后，他流亡到印度的时候写的《大同书》，就是一个空想共产主义的蓝图。从这些方面说，康有为思想有进步的一面。梁启超也是这样，早年思想是有反满的成分的。

马国川：那么，为什么主张人生来平等、甚至有反满思想的康梁两个人主张改良呢？

杨天石：本来康有为在维新活动开始的时候，把议会作为改革的目标。后来，光绪皇帝支持，康有为的方针改了，叫“以君权治天下”，靠皇帝的权力来治天下。康有为还向光绪皇帝献了一本书，就是《俄彼得政变记》，希望光绪帝做中国的彼得大帝。所以，康有为后来不提设国会了，倡议开“制度局”。就是在皇帝的领导底下，设一个政策研究室，让他们这些改革派进入这个制度局去给皇帝出主意，然后靠皇帝的命令去推行改革。

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康梁仍然坚持主张改良，我觉得四个字可以概括，叫“求稳怕乱”。康有为研究过法国大革命：第一，破坏性很大；第二，时间很长，死人很多。康有为认为，如果中国走法国大革命那条道路，恐怕会伏尸百万，流血漂杵，而且动乱会绵延几十年到百年之久，代价太大，太可怕了。

马国川：他们主要的是求稳怕乱，怕革命流血、怕革命会带来社会的大破坏。

杨天石：所以，他们想尽量找一条最稳妥、破坏性最小、死人最少的一条道路。康有为对于光绪皇帝有特殊的感情，知遇之恩。梁启超也是如此，他后来称颂光绪皇帝是“天纵之圣”。他们认为可以利用光绪皇帝来减少改革的阻力。如梁启超认为，有个皇帝高高在上，社会就不会出现大的动荡局面。他甚至在小说《中国未来记》里幻想，让光绪皇帝当第一任中国总统。第二任再换汉人黄克强（虚构人物，不是黄兴），这叫“名为保皇，实为革命”。梁启超这八个字很受华侨欢迎，原来参加兴中会的好多华侨全参加保皇会了。

马国川：二十世纪初，追随康有为、梁启超的原改良派成为立宪派，他们顺时应势，认为只有改良专制主义的政权结构，速开国会，颁布宪法，实行君主立宪，才能“安上全下”，但是他们的主张并没有被接受，后来这些立宪派转向了革命。那么，立宪派在辛亥革命中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呢？

杨天石：目前也有一种说法，认为立宪派的贡献比革命派大，这种观点没有看到基本历史事实。

第一，立宪派在什么时候才赞成革命的？孙中山从1894年开始主张推翻清朝要革命，前后搞了十七年。立宪派在1910、1911年才转向革命的。为什么？因为清政府搞了一个皇族内阁，民众大失所望。而且清政府镇压了国会请愿运动，立宪派走投无路，绝望了，才转向革命的。革命党搞了十多年革命，革命都起来了，立宪派才来支持一下，赞成一下。怎么能说，后者的贡献比前者的贡献大呢？没有革命派，就不可能有后来的立宪派。只能说，立宪派在辛亥革命最后的时刻转变了立场，支持和赞成革命。不能说，他的贡献更大。

第二，当时内地十八个省，十四个省独立，十四个省里面有九个省都是靠新军的武装起义，五个省是“和平独立”，也是起义条件已经成熟了，不独立不行。和平独立也是这个武装起义的成果。绝对找不到一个省立宪派首先带的头。没有革命的形势，没有新军，有哪一个省立宪派倡导以后就独立了？这样的例子没有。立宪派不过是附和革命而已。

马国川：但是不能说，立宪派的作用比革命派更大？

杨天石：这种观点严重夸大了立宪派的作用。还可以看看立宪派四大领袖人物的表现。湖北的汤化龙，在革命的第二天就表态支持革命。湖南的谭延闿，是在湖南的新军和会党革命后，才支持革命。江苏的张謇，武昌已经革命了，他还是反对革命的。只是在革命已经成了大势所趋，好多省份都独立以后，张謇才转变的。四川的领袖浦殿俊是最后才转变的。

应该说，在革命党人已经革命的情况下，立宪派出来表示赞成，这对于安定局势，对革命以后的政权建设和社会稳定起了作用。但是如果说，辛亥革命之所以胜利，主要是立宪派的作用，这和事实背离太远。我不明

白,怎么会形成这么一种看法?

## 孙中山的思想没有过时

马国川:谈辛亥革命,绕不开孙中山。对孙中山的评价,现在的分歧也比较大。有的说他是民主革命的伟人,也有人说他是一个空头的革命家,“孙大炮”。您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怎么评价这样一个历史人物呢?

杨天石:我的看法,孙中山还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很了不起。

我们一向尊重孙中山,而且给了孙中山很高的评价。但是,多年来对孙中山的局限性讲得过头了。从正统的官方史学来说,有两个基本看法:首先,孙中山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其次,孙中山的资产阶级软弱性,不彻底,妥协。我的看法是,孙中山的思想里面有许多很深刻、很高明的地方。我们过去所认为的软弱性,或者说革命的不彻底性,恰恰是孙中山的高明之处。也就是说,对孙中山思想的现代价值,我们以前估计得不够。

马国川:习惯的说法是,孙中山是旧民主主义者。言外之意,孙中山过时了。

杨天石:后来人搞的这一套比他高明吗?事实证明,不一定。比如说,早在民国初年,孙中山就提出中国要搞“混合经济”,允许国营经济和民营经济同时存在,而且孙中山首先讲的是民营经济:老百姓可以办的企业要让老百姓办,国家用法律去保护,而且奖励;个人办不了的、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大企业,要由国家来办。以前我们说孙中山不彻底,我们的理想是纯而又纯的公有制经济。事实证明,这条路走不通。经过这么长时间的革命,最后我们还是回到了孙中山的起点上。

马国川:改革开放搞的就是“混合经济”,现在民营经济的比重占到50%以上,解决全国三分之二的就业问题。

杨天石:孙中山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是“师其意而不用其法”。“师其意”的“意”,就是不能够贫富悬殊。“不用其法”,就是不能够干干净净彻底地消灭资本主义。在孙中山看来,马克思的那一套必须在欧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上面才能实行。孙中山的这个主张在列宁之前。俄国

革命后实行军事共产主义,但是后来不得不从军事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孙中山说,像俄国那样的社会,他都没有资格搞马克思主义的那一套,我们中国哪里有资格?

孙中山不主张在国内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经济,他很明确讲过,在中国,我的民生主义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一致的。他认为,世界经济有两个推动力量,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是资本主义,两种主义应该“互相为用”。用今天的话来解释就是说,资本主义要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学资本主义。孙中山一再强调,经济领域里不能搞阶级斗争,经济领域要互助。工人和资产阶级要互助,而不是激烈的斗争。

马国川:孙中山的思想如此开放,视野如此开阔,真是很了不起。

杨天石:1978年后中国讲开放,其实,中国最早提出来实行开放政策的是孙中山。引用外国的资本,引用外国的技术,引用外国的人才、引用外国的经济管理方法,这是孙中山在民国初年就提出来的。说句老实话,现在进行的改革开放,许多方面不是对孙中山思想的否定,而是对孙中山思想的发扬。

马国川:孙中山很有历史预见性,原来对外开放思想可以追溯到孙中山那里边去。

杨天石:我们现在很强调民生,民生主义最早也是孙中山提出来的。孙中山思想没有过时,不要以为我们可以超越他了。

过去对孙中山的思想否定过多。毛泽东在抗战时候就批评了中共党内有不喜欢孙中山的一种情绪。他说,孙中山“的确做过些好事,说过些好话,我在报告里尽量把这些好东西抓出来了,这是我们应该抓住,死也不放的”。

马国川:除了民生主义,还有更重要的民权主义,在对未来的中国来说,民权主义更有意义。

杨天石: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对孙中山思想的回归和发扬。孙中山的思想不是一个过时的落后的体系,而是对今后中国的建设,对中国的改革仍然有影响的思想体系。

## 专制主义的大牛粪圈

马国川：有些人认为革命代价太大，不主张进行革命，所以对辛亥革命颇多微词。

杨天石：实际上，辛亥革命很快就结束了，最快的地方，杭州的革命四十分钟解决问题了。所以，辛亥革命是一次牺牲很小、代价很小的革命，而且是一次人道主义的革命。就拿对清朝皇室的态度来说，法国大革命，路易十六被送上了断头台；俄国的十月革命，沙皇的全家都被杀害了。中国的辛亥革命，皇室受到优待了。

马国川：而且也没有清算满洲贵族。

杨天石：没有啊。人们常常会批评辛亥革命不彻底。你看，溥仪还在他的皇宫里面，颐和园还归他们。但是，假定不这么做，打，那得死多少人？所以孙中山讲，辛亥革命是“以和平收革命之效”，用和平的手段解决了革命的问题。

马国川：辛亥革命以后，中国陷入了长期军阀混战的状态，后来又是国民党的党国体制。有些人据此对辛亥革命提出了批评，包括“告别革命”的观点，实际上都是与此有关。

杨天石：我认为，不能把辛亥革命以后的混乱局面归咎在辛亥革命身上，而只能归咎于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时间太长，余毒太多。希腊神话中有一个“奥吉亚斯牛栏”的故事，说是厄利斯国王奥吉亚斯拥有一个养着三千头牛的牛栏，因为三十年没有打扫而牛粪堆积如山。孙中山曾经用这个希腊神话来比喻君主专制制度时间的余毒。

我认为，这个比喻可以用来解释辛亥革命以后的混乱现象。两千多年君主专制主义的余毒就是中国积攒下来的粪污，不是一两天能够打扫干净的。辛亥革命以后的军阀割据，就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一个余毒，打扫是需要时间的。孙中山讲过，辛亥革命只是“先成一圆满之段落”，不等于这篇文章做完了。

马国川：这句话很有哲理性。

杨天石：辛亥革命爆发后，孙中山从欧洲回国，路过香港。胡汉民去见孙中山，劝孙中山留在广东，练兵北伐。孙中山说，我现在必须到江浙去。袁世凯不可靠，也许将来会做坏事情，但是我要利用他，“先成一圆满之段落”。假定将来袁世凯继续做坏事，我要推翻它会很容易。事实证明，这段话很有预见性。

马国川：先利用袁世凯，“先成一圆满之段落”，把句号画上，把民国建立起来。只要民国一立，再想当皇帝，也难以成事。

杨天石：后来证明，袁世凯只当了八十三天皇帝，张勋复辟也只有十二天。

很显然，不能把军阀混战、党国体制等归咎为辛亥革命的责任，也不能因为这些历史结果而认为辛亥革命没有必要。建立民国只是“先成一圆满之段落”，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文章并没有做完。后来的局面只能是理解为两千多年的专制主义、封建主义的余毒太多，不可能那么快的清扫完。除了中国传统的专制主义，后来还从苏俄传来新的、苏俄式的专制主义。辛亥革命以后搞的可不是党国体制。

马国川：辛亥革命缔造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但是为什么没有实现民主？

杨天石：根子在于，专制主义的传统太深，加上外来的苏俄式的专制主义。

马国川：从辛亥革命以来的一百年来的历史来看，如果总结一下，历史的大趋势是什么？

杨天石：还是孙中山先生的话，“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一个是民族独立，这个任务已经完成了；第二个就是民权主义，人民民主；第三个是民生幸福，后来台湾换了个提法叫“均富”，大家都富裕，民生幸福。实际上，民生主义的根本目的是要民生幸福。

国家要独立，人民要民主，社会不能贫富两极，要民生幸福。历史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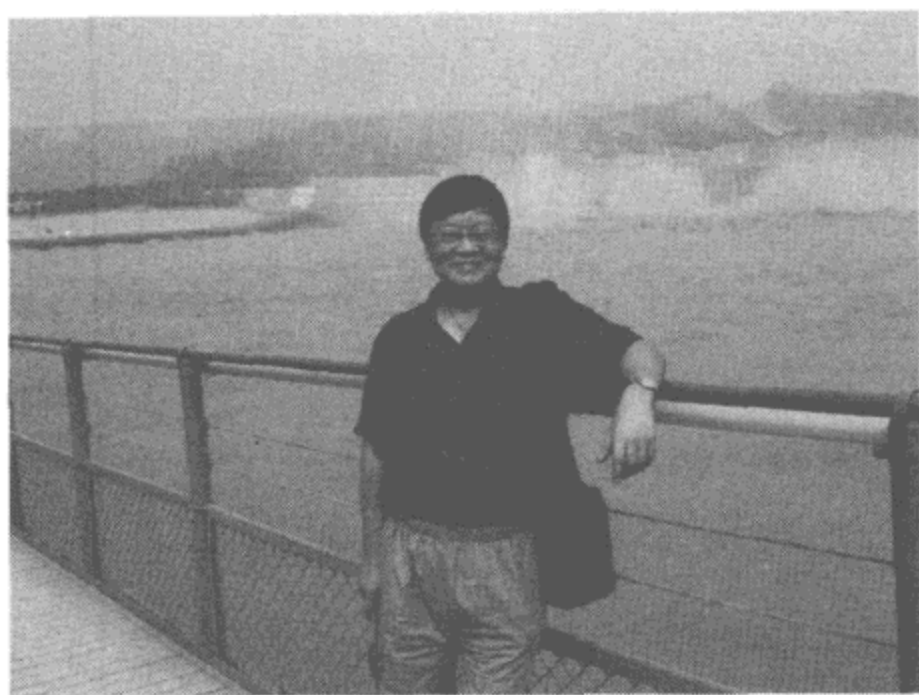
一定会向这个方向发展的,历史潮流是不可阻挡的。今天回头看,一百年来,中国基本也是在朝着这个方向走,尽管中间有很多曲折。和一百年前比起来,今天中国人民的自由、幸福和权利显然要多得多。中国社会有了很大的进步,我希望中国进步得更快一点,至少不要倒退。

采访时间:2011年3月16日下午

采访地点:北京 东厂胡同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







## 革命的乌合之众 摘了清王朝的烂桃子

### 萧功秦

历史学家，湖南衡阳人，1946年生。现为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近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史，当代中国政治思潮，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理论与比较，二十世纪中国变革史等等。现在主要从事当代中国转型政治学研究。主要著作：《儒家文化的困境——近代士大夫与中西文化碰撞》、《萧功秦集》、《危机中的变革——清末政治中的激进与保守》、《与政治浪漫主义告别》、《知识分子与观念人》、《中国的大转型》等。

## 采访手记

四月中旬的上海夜晚很是温馨，空气中洋溢着不知名的花香。我走进位于徐汇区虹漕南路的科技园，按响了萧功秦先生家的门铃。

萧先生热情地将我让进他的书房。贴墙而立的两排书架塞满了书籍，颇有“顶天立地”之势。他告诉我，还有两个专门放书的房间，藏书一共有两万多本呢。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萧功秦被称为中国新权威主义的代表人物。“为什么80年代我有更强的新权威主义的倾向？”萧功秦先生回顾说，“因为当时的激进派占主流。80年代知识分子的主流观念认为，西方民主是拿来就可以用的，知识分子的道德责任就是把西方民主拿过来。当时我就意识到，西方那一套制度背后有一系列很复杂的社会条件，中国并不具备，一搬过来以后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产生新问题。中国要做的就是创造条件，这就需要一种威权政治，通过发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利益多元化、出现不同利益集团，为发展民主提供条件。我的终极目标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完全一致的，分歧在于我认为需要新权威主义来帮助完成中间的过渡阶段。”

萧功秦坦然承认，现在他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有了越来越多的一致性，“因为国家主义开始崛起，包括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在抬头，完全忘记了中国的现状。另外，统治者对民主发展的要求和民主的社会建设相当滞后，对社会发展是不利的。所以，我强调公民社会，强调社会自由，反对国家主义，反对民族主义，在这些问题上我和自由派是一致的。”

面对中国日益复杂的社会形势，萧功秦感到忧虑。他说：“我有两个判断。第一个判断，中国出现了非常新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和西方的民主政治完全不同的，这种家长制模式的决策行为是相对理性化的，它是从成本效应核算出发，而不是从意识形态来考虑问题。这样的体制至少

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会延续下去。第二个判断,现行体制的维稳费用已经高于国防支出,只要出现经济危机,社会的矛盾肯定会大大尖锐,控制不住,控制不住的结果,将来可能不出现革命,但是社会动荡很大。若干年以后的新统治者思考问题的方式会发生某种改变,扩大社会的自主空间,这个空间或许会给中国带来动荡,或许会带来一些新的生机。”

“哪一种可能性更大一些呢?”我问道。

“第一种可能性比较大一点”,萧功秦坦率地说,“我说这个话,心情是无可奈何的。”

不过,萧功秦并不悲观。在他看来,尽管看到的信息和材料似乎很悲观,“但是很可能有一些非常有利的因素我们没有注意到。人的理性判断能力和掌握能力都是相当有限的,很多因素只有浮出水面之后我们才发现,原来它们才是关键性因素”。

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例,“文化大革命中我在工厂里待了很长一段时间。林彪事件以前,我以为一辈子永远生活在这种体制当中。但是突然发生了林彪事件,然后社会变化加速了,好像希望又来了;突然之间把邓小平打下去,又觉得没什么希望了;天安门事件发生后,觉得希望又来了;天安门事件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又感觉没什么希望;突然之间‘四人帮’倒台了,新的希望又萌发出了……所以,我既不盲目地悲观,也不盲目地乐观,只有把自己事情做好。‘尽人事,听天命’。我们在追求个人的理想过程中自我实现,就可以了”。

作为一位历史学家,萧功秦正在写作一部八卷本的历史著作。他原来的设想是写二十世纪中国史,但是在研究过程中,他一再将视野向前追溯,终于决定从鸦片战争开始写起。在写作的过程中,他发现太多的历史被歪曲了真相。他决定秉笔直书,“至于将来能不能出版,不是我现在考虑的问题”。

让人难以想象的是,今年六十五岁的历史学家竟然是一位摩托车“发烧友”。他拥有一辆意大利产的摩托车,有时会与骑友一起沿着国道向安徽行驶,次日返回,行程七百多公里。

## 对日俄战争的双重历史误读

马国川：现在有很多人对于辛亥革命颇多微词，因为据说清末新政开展得很有声色。那么，清末新政到底取得了多大的成绩？

萧功秦：清末新政的贡献还是非常大的。庚子之变后，危机四伏的统治者已经痛定思痛，在整整十一年里，改革全方位推进，而且反对派很少。在1908年之前，一向被视为保守的慈禧太后是最积极的，经常下旨催促，只怕大臣们提不出建议来。亨廷顿说过，处在危机感当中的统治者，要求改革的良好愿望要超过一般的民族主义者，因为他想用良好的表现来换回他在臣民当中的合法性。

马国川：但是，慈禧是这样的人吗？

萧功秦：慈禧出逃北京和从西安回京的路上，目睹了许多民间的悲惨状况，发了几次脾气，责骂大臣以前为什么不告诉实情。她痛定思痛，认为都是自己的错，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百姓。回京后，她就厉行改革。在1905年以前，改革基本上是按部就班进行的，改革的性质是“开明专制化”，即从绝对权威主义变成开明专制。用专制的权力推行开明的政策，包括发展实业、发展教育、改革法律、奖励留学、设立新军等一系列现代化政策。

马国川：您认为慈禧太后痛定思痛，真心推动改革，可是她发布的《钦定宪法大纲》，规定皇室“万事一系”，“皇帝权力神圣不可侵犯”，和日本的宪法比起来，《钦定宪法大纲》更加维护君主专制。一方面宣布改革，另一方面在核心利益上寸步不让，这不是矛盾的吗？

萧功秦：中国有一个两难困境，一方面，几千年延续下来的皇帝的专制权威也是一种传统的政治资源，在变革时代可以维持社会的稳定；另一

方面,清王朝的皇室是满族,满族统治者的权威合法性要比汉族统治者脆弱,老百姓对前者的信任度低得多。尤其是在二十世纪初期民族主义兴起的背景下,作为异族统治者,满族皇室的合法性非常脆弱,稍有失误都会导致民众信任的坍塌。

马国川:统治者为什么一定要把自己的权力看得那么重要,哪怕照抄日本的宪法行不行?

萧功秦:总体上来说,《钦定宪法大纲》仍然是模仿日本的,但是汉族人对此特别敏感:改革了,你们还要永远统治我们吗?可是,开明专制和民主政治、立宪政治最基本的不同,就是皇帝的权威不受挑战。开明专制的权威是不受挑战的,否则就不是开明专制。清朝统治者要实行的是开明专制,从这个基本前提去看,《钦定宪法大纲》并无不妥。

虽然皇帝的权威不受挑战,但是在这个大框架之下,地方和中央的权力可以通过一种分权的方式进行有限政治参与。这种参与不是民主,不能用民主的标准来要求。一定要界定清楚这一历史阶段就是开明专制时期,不要用民主的原则来指控统治者。开明专制就得按照开明专制的规则做。如果没有日俄战争的话,也不会有激进的立宪运动,清末新政就会顺利进行。假以时日,中国的现代化会有极大进步。

马国川:为什么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会影响清政府的改革进程呢?

萧功秦:日俄战争的结果是日本人打败了俄国人,中国人产生两个误读。第一个误读,认为日俄战争是“立宪战胜了专制”。立宪是以宪法制约王权,实际上,当时日本并不是立宪,天皇的权威还是绝对的,他用这种绝对权威来推动社会文明的发展。日本的政治学家称之为“伪立宪君主主义”,就是以立宪为幌子来实施开明专制,天皇不受制约。所以,日俄战争不是“立宪战胜了专制”,而是日本的开明专制战胜了俄国的帝制。

第二个误读是,虽然中国认为日本成功了,但是没有学日本的“开明专制”,而是学真正立宪的英国,英国就是分权。日本是靠了君主主义打败了俄国,中国以为实行立宪,把权力分散给地方才能强国。一百年来没有人认识到这两个误读,只有我认识到。

马国川：这双重误读如何影响了清政府的改革进程呢？

萧功秦：在晚清新政的那个历史阶段，中国还需要加强政府的权威，通过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利用开明专制的手段来整合社会资源，推进社会的进步。但是误读日俄战争、开始立宪以后，把权力一下给分散掉了。地方上建立的谘议局和中央设立的资政院，形成了两个反抗政府的舞台。如果整个社会有很强的共识，下面和上面的共识是一样的，有没有这样的舞台无所谓。可是，当时中国恰恰是危机感四伏，占据这些舞台的立宪派和统治者的观念是不一样的。

马国川：日俄战争以后，难道清王朝进行分权，设立资政院和地方谘议局是错误之举？

萧功秦：资政院和谘议局建立以后，实际上是两个挑战中央和地方政府权威的一个体制内平台。在一个危机不是很强的社会里，建立这么一种体制可以增加政治参与，凝聚社会力量。但是在危机加深的社会里，这种制度的建立会起到反作用。

## 辛亥之前清王朝进入了权力真空时期

马国川：立宪派所代表的士绅阶层认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就是扩大政治参与，政治参与度越大越好，因此要求加快立宪速度。

萧功秦：那时清政府还在筹备立宪，筹备期九年到十一年。从逻辑上讲这也没错，因为要经过比较长的时间使得中国老百姓的教育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才能形成有序的民众政治参与。而对于占据了政治舞台的资政院和谘议局的那些人来说，他们不是根据立宪的社会条件成熟程度，而是根据危机感的深度来决定是否应该加快立宪进程。实际上，危机感完全是主观判断。

马国川：改革快慢很难有客观标准，因为执政者和民众的判断标准很难一致。在很大程度上，恐怕不能以执政者的主观感受来判断改革快慢，而是要符合民众对改革的心理预期。

萧功秦：问题在于，老百姓的判断不一定是正确的。



马国川：如果说老百姓的判断不一定正确，怎么能说权威层的判断就一定是正确的呢？

萧功秦：从后人的角度来看，老百姓对改革的预期是根据危机感的程度来决定的，危机感越强，改革速度应该越快。但是从一个社会的发展来说，在社会矛盾很尖锐的时候，政治开放的速度越快，就可能导致政治参与度爆炸，参与爆炸就是革命——革命不就是大众直接参与政治吗？

马国川：在清末真正的平民参与政治的机会很少，主要是当时的士绅阶层，他们对于形势的判断有误差吗？对于晚清的社会状况，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判断，有的认为晚清时期危机四伏，另一种判断则认为，晚清社会基本上是平稳，孙中山发动的十次革命都是昙花一现。

萧功秦：分水岭是1908年。如果在1908年以前，哪怕是谘议局、资政院出现了，由于慈禧太后有非常强的权威，她已经进行了近半个世纪的实际统治，即使有人对她不满，她还是能够控制局面，社会还是有序地在发展。但是1908年慈禧死了，新上任的摄政王就没有那样的权威，不足以维持局面。

马国川：李泽厚先生曾经说，如果慈禧晚死十年的话，局面可能大不一样。

萧功秦：很有可能是这样的。1908年以后，士绅阶层是相当激进的，激进到要求立即开国会，否则国家就落后了！为什么一些地方官员也站在士绅一边，请求尽快召开国会呢？他们并不认为请愿者是对的，而是看到一万多人在广场上集会磕头，他们感到恐怖。危机感使他们认识到，早开一天，至少会少一点对抗。

双重误读也并没有构成致命的问题，它等于是埋伏了一个不稳定的因素。

马国川：致命的问题在哪儿？

萧功秦：致命的问题是综合性的。第一，庚子事变以后慈禧权威的合法性大大衰落；第二，日俄战争以后，在开明专制政治的框架下设立了资政院和谘议局，为对社会不满的人士提供了政治参与的渠道；第三，慈禧死了以后，新上来的摄政王搞了一个“皇族内阁”，刺激了民众最敏感的

神经,让本来有期待的人们也感到绝望。与此同时,那些能够在满汉之间起到中和、缓冲作用的老臣,如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相继死亡或退休,清王朝进入了权力真空时期,只剩下一些八旗阔少。这些人既没有政治经验,也没有政治能力,更没有政治威望,由这些人独占政权,使得汉族人完全绝望,促使社会矛盾更加尖锐。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排满民族主义思潮已经开始越来越弥散在社会上。

马国川:这股思潮是什么时候开始起的?

萧功秦:是1899年“庚子之变”以后。此前,孙中山在海外传播排满革命,基本上没有人听,甚至有人觉得他是神经病。“庚子之变”后,民族主义思潮兴起,主要的影响力是在新军里。新军军官都是汉人,他们到日本去留学,而日本就是一个排满革命的大本营。新军军官的思想很快被革命思潮“格式化”了,去的时候是开明专制思想,回来后是排满革命思想,他们不断在军队内部传播革命思想,清朝对军队的管理是粗放式的,湖北地区的清军军营里面竟然有三分之一的人参加革命的外围组织文学社,竟然没有被发现。

马国川:当初没有“政委”啊。

萧功秦:孙中山的革命是“墙外开花墙里香”,他要做的事情没有一样成功的,没想到真正成功的是新军。为什么能够成功?因为排满思潮已经开始在民间弥散,统治者提前丧失合法性,而且满族统治阶级人数很少。这造成世界历史上少有的现象,革命军是如此之弱,没有领导人、没有指挥员,也没有经过训练,可是统治者不做任何反抗就投降了。

## “革命的乌合之众摘了清王朝的烂桃子”

马国川:革命军固然脆弱,统治者比革命军还要弱。

萧功秦:1908年慈禧死去之前,连国外观察家都认为慈禧是完全能够控制得住局势的,清朝政权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此后社会进入到了权力真空时期,新贵们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威望,更没有手段,偏偏霸占要津,极大地刺激了汉人敏感的神神经,民众躁动起来,局面开始失控。排满

思潮已经成为一个话语优势,统治者提前地丧失了统治的自信心,没有反抗就投降了。在这种情况下,新军一旦起事,立刻星火燎原。革命的乌合之众摘了清王朝的烂桃子。

为什么是乌合之众?革命没有领袖、没有计划,也没有经过训练,也没有各个地方的联络,连同盟会都不知道这个事情。只要有几个人拿着枪跑到总督府把总督抓起来,然后把军火库一占领,省城就成功了。县城也如法炮制,把县衙一占领就成功了。死人最多的地方大概是武昌。其次就是云南死了一百六十多人。有的省一个人没死,就独立了。这样,一个月里面十三个省宣布独立,清廷大势已去。所以,辛亥革命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和平的革命,成本最低,代价最低,恐怕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马国川:辛亥革命以如此低的代价推翻了帝制,建立了民国,实在值得庆幸。

萧功秦:可是,辛亥革命是很悲哀的。因为这样一场革命根本没有能力把各个独立的省结合起来,组织一个有力的政府,因此不得不和袁世凯讨价还价,通过妥协的方式来解决清廷退位问题。

当时,独立的省互不相属,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府把它们结合起来,中国社会就四分五裂了。为了防止碎片化,为了防止帝国主义的瓜分,需要一个统一的政权。可是没有一个核心人物,只能各个省派两名代表到南京谈判,临时政府完全是一个松散的邦联性的政权。邦联制不是由民主的诉求产生的,而是为了社会不至于分裂而采取的临时措施。临时政府非常弱势,不但没有军费,连军饷都发不来,根本没有办法北伐,唯一的办法是和北洋军阀谈判,让袁世凯去劝清王朝退位,然后把总统的权力交给袁世凯,让袁世凯当大总统。

马国川:不费一兵一卒,和平解决帝制问题,不是很好吗?

萧功秦:问题在于,革命党既然将总统职位让与袁世凯,却又不放心,实行内阁制,由国会来控制内阁,把有实权的袁世凯架空了。袁世凯当然不甘心。在制度设计上,议会可以弹劾内阁,内阁没有反过来要求总统解散议会的权力,由于权力不平衡,就造成国会专制。成员大多数是国民党

员的国会肆意对内阁进行弹劾和阻挠,实际上成为对政敌进行攻击的工具。这是一种不正常的内阁制。另外,西方内阁制的特点是,内阁的首相总理一般属于国会多数党的领袖,这样内阁和国会之间就不会有很大的矛盾。而中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总统袁世凯不愿意让国民党担任总理,内阁总理是双方妥协的结果,导致内阁和国会之间矛盾越来越多。

当时的外国观察家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莫理循就说,民国政治不稳定,很快就像波兰一样无政府化,如果出现不了拿破仑式人物,这个国家就一天天烂下去,直烂到这个国家被人家瓜分了。

革命造成了一个弱政权,政权内部的结构又极端不合理,移植西方的内阁制,出现无穷的党政,造成无序化,结果只能是走向袁世凯的专制。这就是辛亥革命的结果。

马国川:您是说,袁世凯的专制是辛亥革命的必然结果?

萧功秦:这是必然的,否则中国真的会“一天天烂下去”。

总之,辛亥革命是一群乌合之众来摘清王朝的烂桃子,然后建立了一个弱势的政权,弱势政权的内部制度和《临时约法》是一个芦苇织成的狭小“笼子”,关着一个大老虎。当“老虎”冲破笼子后,就废除了民主政治,实行威权政治。袁世凯的专制建立起来以后,稳定了一个时期。至少在袁世凯宣布帝制以前,1913年到1916年中国社会开始恢复秩序,发展教育,发展实业,而且经济发展速度非常快,每年增长百分之十几以上。

## 袁世凯是亚洲历史上第一个新权威主义者

马国川: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一个不合格的民主政治,又被袁世凯的专制所取代。

萧功秦:袁世凯推行的是开明专制,即“新权威主义”。他还提到民主有约法时期和宪法时期两个阶段。目前是约法时期,因为教育水平还太低,经济还不够发达;将来中国条件成熟,再进入民主的宪法时期。至少他有民主承诺,搞不搞是另外一回事,有承诺比没有承诺好。

当时,威权政治还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至少政权稳定了,经济发展了。

但是袁世凯的威权政治和未来的蒋介石政权相比又有很大的弱点。袁世凯没有一个政党作为执政基础,只有依靠北洋军阀,以恩威并用的手段利用同党来稳定政治秩序。如果袁世凯活得时间长一点,这种强人政治也能延续下去,在一定阶段社会也可能出现新的阶级力量,出现新的资产阶级革命。但问题是,袁世凯五十六岁就死掉了。

马国川:袁世凯之死也有自己的因素,共和已经建立,在人们基本认同民国的情况下,他又搞帝制当皇帝,实在是一大败笔。

萧功秦:绝对是一个大败笔,这又牵扯到中国专制政治的劣根性,专制体制造成统治者获取的信息不完全、不对称。袁世凯以为民众对民国失望了,才选择了帝制。在当时的思维中,除了民主制度就是专制制度,还没有威权政治的说法。民主不行,就回到帝制,中间没有缓冲地带。其实,袁世凯已经创造了“强人政治”,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新权威主义”。袁世凯是亚洲历史上第一个新权威主义者,他实际上创造了一个历史,只是他自己并不知道。他以为这种强人政治是不稳定的,因为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种统治方式,要么是帝制,要么是民主。袁世凯自己有野心,又相信迷信,信息来源也不对称,以为民众对民国失望了,很自然就选择了帝制。他的帝制也是开明专制,因为当时还有宪法。

马国川:您这是从同情的角度来思考他怎么思考问题的。

萧功秦:对于历史人物,不能仅仅流于道德谴责,而要寻找其行为的内在逻辑。袁世凯称帝,激起了整个社会的反感。按照梁启超的说法,专制政治就像一个泥菩萨,原来人们很崇拜他,一旦一个莽汉把它打碎了,满地泥块,即使再把它扶起来,神圣感已经没有了。所以,袁世凯很快就被推翻了,此后中国社会就进入了碎片化。中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的军阀混战并不是辛亥革命的直接结果,而是间接结果,因为辛亥革命把原来一千多年来形成的专制帝制推翻后,无法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政治。因为民主政治是需要条件的,中国不具备,只能够形成强人政治,而且是劣质的、粗放的强人政治。

袁世凯的帝制运动使自己丧失了合法性,促成了他的早死。换句话说,如果他没有早死,不搞帝制,可以继续当大总统。另外,如果袁世凯死

前命令段祺瑞接班,也可以稳定相当一个时期,以后可能还有其他的变化。但是他没有任命段祺瑞,为了南北统一,中国陷入军阀混战。

这么长的历史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是联系着的。

## 辛亥革命推倒了第一张骨牌

马国川:也就是说,您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并不高?

萧功秦:对辛亥革命无非几种判断:一种判断,辛亥革命是好的,同盟会是民主革命;第二种判断,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的软弱革命,所以要无产阶级革命;第三种判断,认为辛亥革命是被袁世凯中断的民主进程。

我认为,辛亥革命的意义没那么大,辛亥革命也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它恰恰是二十世纪上半叶大混乱的开端。如果没有辛亥革命,如果当时按照预备立宪大纲加快改革,在皇权不受挑战的情况下,社会还能够有序地前进。一旦最高权威没有了,人人逐鹿,内战就越来越大。

马国川:辛亥革命只是摘了满清一个烂桃子,革命本来也是一个不期而遇的革命,中国从辛亥一步步走到后来,很难苛责某一些人。另外,满清实际上已经死了,没有希望,也只能是走到这一步来了。

萧功秦:关键是我们从哪一个角度看历史。我不是站在哪一边,没有苛求历史人物“应该怎么样”。

我反对把辛亥革命说成是资产阶级的软弱革命,事实是,辛亥革命是一个激进的排满革命。不是民主革命,而是民族革命,是在满清统治极其虚弱的情况下面开展起来的,所以轻而易举地就成功了,但是没办法把整个社会凝聚起来,只能采取凑合性的形式,这一定会造成社会的无序化。

马国川:但是,在慈禧死后,政治顶层已经真空化了,对下面还能有多大的威慑力量?

萧功秦:真空化也是暂时现象,如果武昌起义后立宪派提出的“十九信条”全部实现,开明皇帝在上面实行立宪政治,就能够避免以前的真空化,仍然有可能在这个体制下面建立起一种有序的政治。但是这种方案被辛亥革命推翻了,形成稳定体制的概率极低,几乎没有了可能。因为十

三个省组成了松散的邦联,然后又是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让袁世凯做总统。革命党限制的手段非常苛刻,完全没有现实操作性的制度安排,一定会造成社会的最高层的破裂,以后就变成一盘散沙。这个过程是一个环环相扣的逻辑,只要革命爆发,后面的就不可避免。

马国川:就是说,辛亥实际上推倒了第一张骨牌?

萧功秦:对,而且以后每一张牌都必然倒掉。武昌首义后,孙中山没有力量北伐,于是不得不接受与北方共建统一的政权,让北洋领袖袁世凯当上总统,面对北洋势力的“名实俱归”,南方革命派又不心甘,一定要因人设法,设计出一种难以操作的内阁制,来限制袁世凯这个总统的权力,让总统变为空架子才甘心,这样的民主体制肯定会引发党争与政治分裂的,这种体制就是“用芦苇编的小笼子关大老虎”的体制,用我们现在的的话来说就是必然会政治崩盘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四分五裂,还不如清末开明专制式的改革。辛亥革命之后的悲剧,就是形成了中国的碎片化,延缓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我的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辛亥革命以后的每一步都是不可避免的。

马国川:难道这个问题当时的有识之士都没有认识到吗?

萧功秦:一百年前的严复、康有为都认识到这一点了,他们作为旁观者还是比较清醒的。康有为为什么反对革命?他预见到革命以后的中国就变成了墨西哥。

马国川:为什么不说,鸦片战争就是中国近代史的第一张骨牌呢?

萧功秦:中华帝国的调试能力很弱,在整整半个世纪里,不断地挫折和失败,消耗了原来积累下来的政治资源,最后进入一个危机时期,变革的难度非常大,后来就很难避免革命。前面如果及时纠正,清王朝还有机会。比如说,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了,如果第二次鸦片战争表现好一些;第二次失败了以后,如果洋务运动能够有更多机会来弥补;甲午战争失败后,如果戊戌变法选人准确,也不至于后来的结果。从历史上看,清王朝确实是一步一步走向危机,但是每一个时期都有多种可能性。可是到了辛亥革命以后,就没有其他选择,只有一个方向了。

辛亥革命只要一爆发,各地风起云涌,很快碎片化,临时政府只能是邦联制;南北之间只能谈判,谈判的结果只能够让袁世凯当总统;袁世凯当总统,孙中山制约他的结果一定是体制无法运作,最终只能崩盘;体制崩盘,社会肯定陷入无序状态。这些历史都是不可逆的,而此前的历史每一个部分都是可逆的,因为当时的统治者还有很多权威和能力,还有纠错机制。

马国川:换句话说,辛亥革命时历史的大背景已经完全转化了。

萧功秦:那时就没办法了,中国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隧道。

## 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

马国川:在辛亥以前,统治阶层方面有哪些问题是值得检讨的?

萧功秦:在面对西方挑战以后的整整半个多世纪里,如何应对西方挑战,如何进行社会的自我更新,这个过程是很复杂的,需要不断的学习。中国专制统治者的学习能力极差,和中国相比,日本的学习能力就强得多。因为明治时期日本有二百五十六个相对独立的封建藩主,他们可以对西方的挑战做出独立的反应和决策。因此日本具有多元的试错能力,而中国只有一个最高皇帝,试错机会非常单一。

一元化的专制政体和多元体制比起来,前者内部的大一统结构往往缺乏应对危机的多元调试能力。一个真正的实现稳定变革的社会,内部需要一种多元整合机制。除了国家管控和干预的力量之外,让民间和个人具有多元的微观的试错的机会,社会内部的各个要素不同程度地参与社会的整合,他们的存在大大地减轻了中央政府对社会进行全面整合的难度,他们在支持和协助国家实现从旧体制向新体制转变方面功不可没。日本就有多元的整合机制。国家作为主渠道以外,民间社会和个人自主地面对着社会环境的压力,不断地进行着微观的调试。

马国川:君主专制由于信息渠道封闭,失去许多机会。

萧功秦:对。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恭亲王了解了西方,才有一些判断,利用自主权做了事情,中国开始洋务运动。遗憾的是,洋务运动



又受到国内严重的阻挠,一直不能成功。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陷入焦虑状态,开始走向改革。戊戌变法失败后,马上又是“庚子事变”,统治者的统治权威大面积流失,陷入了“急诊室效应”,想改革已经晚了。

所谓“急诊室效应”,是指专制帝国陷入危机以后面临的两难选择:在危机中改革成功概率非常低,不改革也是死路一条。慈禧以后,如果有一个能干一些 的皇帝,可能情况好一些,但是大势所趋,已经没有人能够挽狂澜于既倒了。

马国川:专制体制学习能力差、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一直存在,在面对新的文明形态挑战时,弊端更加彰显,最后很有可能走进一条死胡同。

萧功秦:今天回顾辛亥革命,这是值得当今中国人吸取的一个历史教训。一百年后重新反思,我们得到的一个最重要的教训,就是在现代化转型和改革过程中,应该加强学习能力和试错能力,培育多元的社会整合机制,让每一个个体和社会组织都有一定的自主能力,帮助国家来完成社会转型。要创造一些制度增加社会的试错能力,避免大的动荡,不要等到这个社会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进行改革。这是下一个一百年中国走向成功的现代化的希望所在。

采访时间:2011年4月15日

采访地点:上海 萧功秦寓所







## 一百年的路 是“正反合”的过程

### 许倬云

历史学家。江苏无锡人，1930年7月生，求学于台湾和美国，1962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先后执教于台湾、美国和香港多所知名大学，现为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学系荣休讲座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学贯中西，善于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治史，研究领域主要在中国文化史、社会经济史和中国上古史。代表著作有《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汉代农业》、《西周史》、《万古江河》等。

## 采访手记

2008年在采访李银河女士时，听她谈起过许倬云先生。

1982年李银河赴美国匹兹堡大学留学，两年后在人民大学工作的王小波也来到匹兹堡大学学习。“许倬云是我和王小波的导师，当时许先生是匹兹堡大学社会学系和历史系的跨系教授”，李银河回忆说，“许先生一口国语讲得特别好，他的国学好得不得了，学问做得特别棒。”

在李银河看来，“许先生是个自由主义的大学问家，他的自由主义思想和他对中国文化的分析，对小波有深刻影响。当年小波获得联合报文学奖，也是出于许先生的推荐”。

后来，我在许倬云先生回忆王小波的文章里，读到了这对师生上课时的有趣情景：“（小波）坐姿松松散散，我也一直有坐不直的毛病，师生二人东倒西歪，倒也自由自在。”

从那以后，我就希望能够有机会采访这位有慧眼而又幽默风趣的历史学家。做辛亥革命的系列采访，显然就是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

2010年的最后一天，在从香港采访回来以后，我冒昧地给许先生发送了一个电子邮件，表达了希望采访的愿望。不久，我就收到了来自美国匹兹堡的回复。许先生说，“中美两地，有十三小时的时差，日夜颠倒，电话访谈，不易凑合时间”。他提议，2011的春天他回大陆时当面接受采访。

我当然愿意当面采访！于是在春节期间，买来先生的大著《万古江河》学习。首先就为那文采飞扬的序言所折服，继而惊叹许先生关注平民百姓日常起居和心灵生活的博大胸怀。

曾记得，上大学时读到毛泽东在延安时的浩叹：“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可是，“老爷太太少爷小姐

们”虽然退出了历史书，“人民”并未出场。

《万古江河》真的是把颠倒的历史颠倒了过来。在许先生笔下，淡化了以往以政治史为纲的通史中的朝代更迭国家兴亡，没有了帝王将相圣贤名流们的“嘉言懿行”，浓墨重笔书写的是数千年来生于斯、歌于斯、死于斯的亿万普通中国人的民俗生活、思想信仰。万古江河，昼夜不止。许倬云先生“向千百代的祖先”献上了可贵的敬礼，也让至今仍然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我们对祖先产生了难言的温情和敬意。

更重要的是，本书摆脱了中国文化本位主义，每每以全球文化的高视点，来诠释多元、复杂的中国文化发展历程。视野之开阔、思路之宽广，诚为大家胸襟，殊非称颂中国文化而昧于世界大势的短钉小儒所能为。

后来才得知，许先生并非“躲进小楼成一统”的书斋文人，他还积极参加推动台湾民主转型。他在《问学记》里说：“今日已是衰年，如果再有一次年轻的日子，我还是会同样的投身于民主化与自由化的大业；只因为这是任何人类社会应有的制度，也是人人应享的权利。正因为这一理想如此难于实现，正因为多少政客一次又一次以花言巧语欺骗我们的信任，我们更必须始终不懈，一代又一代的继续不断，寻找美梦成真的一天。”读着这些文字，我越发钦佩许先生。

遗憾的是，我并没有获得当面请教和表达敬意的机会。因为许先生没有回大陆，而是回到了台湾。采访只能通过 SKYPE（网络电话）进行。在台湾那端，八十岁的老先生声音洪亮，思维敏捷，常有警句脱口而出。虽然不能当面请教，但是已经倍感荣幸，受益匪浅。



## “中国的选择余地并不多”

马国川：有学者说，清末形成了“改革和革命赛跑”的局面：一方面革命党人鼓动革命，一方面清王朝实行废科举、改官制、设谘议局等改革措施，史称“晚清新政”。那么，为什么改革跑不过革命呢？

许倬云：“晚清新政”并不意味着慈禧太后真的要搞改革，而是迫于当时的形势，不得已而为之。慈禧是一个有手腕有权谋的女人，但是没有见识，热衷权力。“晚清新政”的改革成果很有限。

辛亥革命前夕，中国本身固然处在改革和革命之间，看上去似乎有选择，实际上中国的选择余地并不多。因为当时维新的力量并不大，维新力量在戊戌政变时遭到了重创，守旧力量重新抬头，城市里的知识分子也没有多少。所以，整体讲起来清末改革没有多少准备工作，无法取得实质进展。例如，虽然各省成立谘议局等民意机构，但基本上都是空的。

马国川：但是，“晚清新政”似乎也并非无所作为，废除实行两千年的中华法系、废除科举都是值得称道的改革之举。

许倬云：当时唯一真正有长期功效的，是将大陆法系的法律引进了中国。为什么要废除中华法系？当时国际上指责中国法律野蛮落后，是一个没有现代法律的国家，是未开化的国家。为此，清朝不得不废除传统法系，当年引进的大陆法系直到现在还在运转。

其次，当时功能不多，但普遍开花的，是新式教育。废除科举后，各地都兴办学堂，许多私塾就变成小学堂，书院变成中学堂。还有些人出洋留学，其中十分可观的是大批大批青年到日本去。到日本留学的，文的武的两条路都有，共同的毛病是居留时间短，进入正式学校，认真学习的人，其实不够多。不少留日学生，总认为中日文字接近，往往望文生义，稀里糊

涂的,就以为理解了,其实并没真正理解。不过,一些有关现代思想的学说和理论都是由这群留学生从日文翻译介绍过来的,包括马克思主义学说也是在这股留学潮中介绍到中国来的。

马国川:晚清末年虽然改革的力量不够强,但是革命力量却在聚集。

许倬云:当时改革的力量不够,而国家正处于存亡之际,老百姓恐慌,有危机感;尤其是居住在沿海地区的民众,接触外人多,见到中外关系的紧张,危机感相当严重。孙中山带来的是一个全盘西式的革命理论,跟当时的中国情况,差距很大,可说是格格不入的。他一方面和维新派搏斗,另一方面推动革命。可是,即使革命阵营里的同志,对革命的真正理解也并不透彻,所以孙中山是在非常辛苦之下推动革命。十次沿海的革命都不成功,其实是由于选的地点太偏僻,力量也太小。他以为可以动员的会党,力量太小,根本没有作用。

武昌新军是另外一拨人——华兴会动员起来的。等到武昌枪声一响,清廷惊慌失措,就此垮了,袁世凯就偷窃了革命成果,夺取了国家名器。

马国川:“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是孙中山的名言。我认为孙先生当时高举民主、共和的旗帜,是和世界潮流相契合的。为什么您说孙中山带来的全盘西式的革命理论与当时的中国格格不入呢?

许倬云: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离开传统社会和文化。孙中山的学说本身有其成长的过程,最早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等到同盟会时代,孙中山又提出“建立民国”,主权属于国民。辛亥革命成功以后,“驱除鞑虏”的口号没有了,变成了“五族共和”。“平均地权”也是同盟会成立时提出的,但是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这一思想才趋于完善。三民主义体系是二十年代孙中山在广州期间完成的。“平均地权”是民生主义的主要内容之一。“平均地权”是其他革命者没有落实的,一直等到苏联十月革命才得以实现。孙中山“平均地权”的理想既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想法,也承袭了中国传统平均主义的理想。民生主义的另一个主要内容则是“节制资本”,要用国家权力,约束民间的自由企业,不让他们过分掠夺

财富。这是从哪里来的呢？来自美国民间流传的重税思想。当时美国还没有实行分级课税的制度，一直要到“新政”时代才开始对不同财产收入课以不同税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罗斯福的“新政”有相当大的类同性，他们都接受了二十世纪初期美国开展的进步主义。

马国川：是不是可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孙中山的理论越来越符合中国实际？

许倬云：应当比较接近一点，同时中国也在改变，几千年的传统逐渐稀释了，传统结构里的许多部分已经是空白了。比如传统中国是存在小集体的，乡里宗族就是互助的小集体，族里的人们互相帮助，一村子里没有真正的穷而无告的人，乡里总会有救济，给他们饭吃。革命以后，这些小集体就逐渐解体了。

## 孙中山思想的两派继承者

马国川：诚如先生所说，孙中山的革命动员很辛苦，也一直效果不大，为什么后来革命力量在广东开始壮大起来了呢？

许倬云：等到袁世凯称帝的时候，孙中山就往广东走，一些人也跟着往广东走，虽然广东是一个小小地方，没有多少力量，但是真正是全国希望之所寄。孙中山在广东局促一隅，却终于得到了两个意外帮助。

第一拨意外的帮助，就是许多沿海地区的留学生，纷纷往广东聚集。一批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帮孙中山做了许多事，包括帮助他完成他的理论建构，帮助整理财政，等等。另外一拨意外的力量，就是苏联革命以后，孙中山实行“联俄容共”，使他得到了左边的助力，有了组织工作，也使他得到了武装力量。

马国川：文武两拨力量终于使得广东这个革命基地成了气候。

许倬云：对，中间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1914年欧战开始，在华的欧美实业，包括商业工厂都纷纷撤资回国，上海、天津、武汉、广东等四个地区的民族工商业借机在夹缝里发展起来。再有，在这个时候大批欧美回国的留学生参加了许多欧美人士在中国设立的学堂，将其转化为中国



的教育机构。沿海城市出现不少报纸杂志。中国都市里发展的中层阶级、民间资金和知识分子、知识传播都是极为重要的因素，中国的城市地区，民智渐开，中国得以逐渐走向现代化。

孙中山去世以后，来自欧美和苏俄的力量还一直在发展，到了北伐的时候终于派上了用处。北伐时，城市企业界和知识分子支持了蒋介石，而俄国力量、左派党员支持了武汉的汪精卫。武汉的财力有所不足，人才也不够，于是蒋介石就统一了相当部分的中国。

这一重要的历史转折，当时，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做了彻底的整理，他不再是完全向民有、民治、民享这方面走了，而是相当成分地吸收了列宁式政党的组织和以国族尊严、国族自主为先决条件的国族主义。这两种思想就由孙中山先生的两派继承者分别继承。蒋介石继承了国族理想和国族自主的国族主义，加上一部分列宁党的组织形态和城市里面的力量。共产党接受了以国族为号召，以社会主义的唯物史观为理念，左派想动员城市工人，但是成效不大，因为城市工人数量很少，于是转向农村。

马国川：当年一起北伐的革命同路人一分为二。

许倬云：共产党在城市无法存活，就转到了农村去。于是，就变成了农村跟城市之间的对抗了。国共内战从1927年开始一直打到了1950年，即使在抗日战争期间也没有完全弥合矛盾。

马国川：在您看来，国共之战实际上是城市与农村的对抗？

许倬云：对。在近代，城市确实是中国现代化的主力。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城市发展，越走越快，也就疏离农村越远，农村和城市就成了对立面。农村广大，城市集中。前者人多，后者资源厚，等到日本侵犯进来，国共两党在国族自主和全国老百姓国族主义的要求之下联合起来，于是有了八年抗战。抗战期间，共产党更深入地在农村发展，国民党在城市的基地丧失殆尽，转入内地。一消一涨，就决定了1945年以后的局面。

马国川：抗战结束之时，蒋介石声望如日中天，中国也跻身战胜国之一，可是不数年国民党政权就土崩瓦解，这是非常令人费解的历史结局。

许倬云：国民党八年抗战精疲力尽，城市基地几乎全部丧失。抗战胜

利后,蒋介石在政治、经济和军事诸项决策中十有九错。例如,全国希望政府能够和平建国,能够实践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民主宪政,然而蒋介石以“反共”为号召更加强了集权统治,知识分子推动民主化遭到迫害,学生运动更遭武力压制,因此人心丧失。最后一根压死骆驼的稻草是“金圆券”的币制改革,一年不到,金圆券已成废纸,全国中产阶级为此破产。国民政府的心脏地区民心大失,前线作战部队士气不振。于是,国民党败下阵来,共产党取得大陆的统治权。

## 一百年的路是“正反合”的过程

马国川:黄仁宇先生曾说过,国民政府重组了中国的上层结构,中共则整合了以农村为主的下层结构。

许倬云:对,在大陆毛泽东继续走农村路线,以党的组织力量动员农村。因此中共在1949年以后能够编组中国广大的农村,撑起以农民为基础的国家力量。黄仁宇认为,中共改造了中国社会的基层结构,政府力量从此可以下达农村。这一改变,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从“大跃进”到“十年动乱”,使得本来可以建设的阶段完全浪费。最终轮到邓小平,才改革开放。邓小平改革开放采取的政策和北伐以后南京政府的政策相当类似。

马国川:邓的经济政策和南京政府的经济政策是相似的吗?

许倬云:都是经济市场化,但是也有一个大的差别。毛泽东三十年的组织努力,有破坏性,也留了一个遗产,就是大陆上有许多小集体出现。城市里有“单位”,乡镇也有小集体,它把散乱的农村力量集中成一个过去没有的集体力量。邓小平改革开放以后,这些集体力量就变成单位企业、乡镇企业的本钱。大陆上资金的集中,第一个阶段是靠单位企业、集体企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乡镇企业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不是仅仅依赖外资。

蒋介石到台湾时,台湾已经相当程度城市化,大陆过来的大批城市知识分子继续举办现代学校,学术界也得以继续发展。台湾发展浓缩了当

年蒋介石没走完的路途，“南京十年”经验在台湾翻版，而且做得更彻底。当然，在此期间蒋介石也有一段白色恐怖时期。等到蒋经国执政，接下来也是改革开放。所以，蒋经国和邓小平两个人等于各走一枝，都走上了改革开放途径。

马国川：但是，大陆在毛泽东时代与西方世界对立，直到邓小平改革开放，才打开国门。而台湾，从蒋介石到蒋经国一直和西方世界打交道。

许倬云：我讲的“开放”是人本身力量的释放。邓小平时期逐步开始开放，并大力促进经济的发展。大陆改革开放的过程还没有完全地走完，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发展途径上的难关也不会少。

邓小平和蒋经国的相似性比较接近，都是经济市场化。蒋经国放弃了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做法，他也有失策之处，本来应该由政府主导的一些公共产业，在他的继承人李登辉任上，也开放给民营了。这是相当可惜的，因为这些事关民生，不必完全交给私人。

总起来说，孙中山出现以后中国走了革命的路线，继续不断在革命，毛泽东、蒋介石各自继承了孙中山的一部分。

邓小平和蒋经国分别继承了毛蒋的一部分，可是钟摆转到比较靠中间的地方。这是延续性的“正反合”的过程，每一段都是“正反合”的过程。不管是大陆还是台湾，前面都有没走完的过程。

尽管1949年以后的三十多年时间里，大陆和台湾一直处于敌对状态，实际上，两边都秉持同样的国族主义的理想。孙中山和全国同胞共同感受到的国族屈辱和亡国危机，也始终是维持两边最大的动力。1949年毛泽东在北京讲“中国站起来了”，并没说是“社会主义站起来了”。所以，这理念里边第一动力是国族。

所以，辛亥革命以来的一百年，中国颠颠簸簸，走得确实很辛苦。我个人理解，固然这中间有多次政府的转换，也有外部的侵犯（如八年抗战），整体来看，中国仍然在做连续工作。一百年的路是“正反合”的过程，是辩证式的进展，中国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 “中国在世界上有一个标杆作用”

马国川：在世界近代史上，辛亥革命、俄国革命、土耳其革命都是二十世纪前半叶的大事件。那么，辛亥革命对世界，尤其是对亚洲国家有何影响？

许倬云：日本的明治维新获得极大的成功，戊戌维新就是以日本作为改革样本的。随着变法失败，中国就不再以日本为榜样了。在孙中山时代，中国和日本的关系曾经非常密切。但是，由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以及东南亚战争、太平洋战争，东方各国不再愿意以日本作为模范了。

辛亥革命后，中国成为东方第一个共和国，这对东方各国极大的鼓舞作用。它们从中国的成功经验得出结论：东方也可以搞自己的自由民主政治，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

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对整个东亚、东南亚是有极大效应的。“大韩民国”和“中华民国”是一样的国号。大韩民国的流亡政府一直设在重庆。南韩和台湾关系一直非常密切。朝鲜战争以后，北朝鲜和大陆关系也是非常密切。而缅甸独立运动的国旗和中华民国“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非常相像。越南在法国统治时期，革命家胡志明和他的战友基本上都是“越南国民党”，后来才改为“越南共产党”。

马国川：孙中山在他的遗嘱里说：“要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看来，孙中山还有国际主义的精神啊。

许倬云：“平等待我之民族”一部分是指苏联，一部分是指还没有解放、没有独立的殖民地国家。所以等到二战结束以后，蒋介石努力帮助韩国、缅甸、印度等国家独立。这是蒋介石继承了孙中山先生的思想。例如，抗战期间，蒋介石去参加开罗会议路过印度，想与甘地见面。虽然丘吉尔百般阻挡，蒋介石还是见了甘地。丘吉尔非常不高兴，开罗会议之后，丘吉尔帮助苏联取得了在中国东北的特权。再如，1947年埃及独立，中华民国是第一个与埃及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国家。而且中华民国大使何凤山一直劝说美国帮助埃及取得苏伊士运河的主权，遗憾的是那时

中华民国已经没有力量了,美国还是帮着英法,运河主权的转移延迟了好几年。

1949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万隆会议会后,中国俨然是第三世界的领袖。台湾民主化的成果,也使得许多殖民地国家有了希望。中南美的国家看见蒋经国的改革,有的国家内部发生变化,军阀专政的共和国有一半换了政权。

十八、十九世纪西力东进,西方文明先是以商业力量,后来是坚枪利兵加上商业力量席卷世界,当时东方有三大帝国:莫卧儿、奥斯曼、大清。到今天,莫卧儿和奥斯曼两大帝国安在?奥斯曼帝国解体,收缩为今天的土耳其;莫卧儿王朝分裂为巴基斯坦、印度,两国都没有真正寻找到自己的价值,巴基斯坦变成回教国家,印度等级森严、贫富悬殊。只有中国始终没有亡国,终于站到今天的地位,两岸都得到世界很多地方的重视。

所以,这一百年来,无形之中中国在世界上有一个标杆作用。在西方冲击之下,二十世纪的中国不断地寻找自己的途径,不断地寻找自己的独立、解放和开放,这个工作一百年持续不断地在进行,也对世界各国都有所激励。

## 两岸要相互学习,互为警戒

马国川:据我的观察,随着改革开放,毛泽东时代建立的“小集体”现在已经基本解体了。

许倬云:并不完全,今天大陆还存在一些这样的小集体,比如大学作为一个单位,文学院教授靠工学院获得的盈利,分到部分津贴。从教授到助教,生了病医药费单位管,住房单位也有责任,这样的单位还在呀。

马国川:这种单位确实存在,但是,这种单位更多是计划经济的产物。

许倬云:这也不一定,美国现在正在走向这类小集体,比如数十万教授们结合起来,集体安排退休和养老保险。

马国川:我们不能忽视小集体的互助作用,但更重要的是,一个现代

国家还是要承担起对民众的福利责任来。

许倬云：对，可是我从美国的例子来看，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至少有两个事情可以做到，生病有医药保险，失业和退休，能够有社保维持基本生活。问题是这种保障制度是由联邦政府管理的，各个阶层办事人员人数庞大，效率低，成本高。假如化整为零，以州为单位来管理，中间层次就少了，浪费相对少一点。所以，太过集中也不是好事情。

台湾贫富悬殊在蒋经国时代不是很严重，今天贫富差距日渐扩大，但是台湾一般老百姓生活水平还是不错。而大陆上贫富悬殊现象，却极度严重，尤其是沿海贫富差距极为严重。大陆要借鉴台湾经验，把穷人的生活拉上去。小集体还可以保留，各种单位集体对于单位成员生活上的照顾，实际上是另一种社会福利，这条途径可以继续摸索，做得更好，可以开辟一条福利国家的途径。大陆可以走小型集体的社会主义，不必走大型集体的社会主义，因为大型集体的社会主义分配资源不容易，小型集体容易做。

马国川：所谓小集体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

许倬云：当然，任何集体都有其缺点，集体会压抑个人。至于台湾，二千三百万人口，和中国大陆的十几亿人口对比，本身就是一个小集体，台湾内部还有两个集体的冲突，即外省与本省的族群冲突，这个使得小集体不但不能集中凝聚力量，反而变成抵消力量了。

一百年来中国艰辛备尝，才有今天的成果。大陆正在崛起，台湾还正在发展。台湾的民主成就老百姓确实受到益处，但也有滥用民主的地方。大陆不能完全抹煞个人，只讲大集体；台湾不能走个人路线，不去管社会公益、社会正义。两岸互相借鉴，互相帮助，这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前途。

## 中国模式可取否？

马国川：现在大陆贫富悬殊现象很严重，尤其是沿海贫富差距极为严重，应该如何借鉴台湾经验？

许倬云：台湾当年的土地改革，不是简单地平分土地，还包括帮助农民取得现代农耕技术，帮助农民取得政府做后盾的融资。所以，台湾在实

现“耕者有其田”以后,五年之内农村的购买力就上升了,农村的知识水平也提高了。农村的消费力和知识层次提高以后,农村的建设也上来了。这就造成了第一拨的内销市场,内销市场促进了内部交通,也促进了内部企业的成长,当企业成长以后,内销转外销,赚得外汇,城市农村一起获利。慢慢地,台湾就没有农村了。

马国川:对于大陆来说,台湾的土地改革非常富有借鉴意义。因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大陆农民是比较受益的,但是从九十年代直到今天,农民还是利益经常受到侵害的弱势群体。

许倬云:今天中国的发展模式是“外销养内销”,这需要一个条件,即把劳力压得非常低廉,土地无偿送给企业,环境资源也遭到不可逆转的损失。如果外销支持内部农村继续发展,最后终于会有一天全国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劳力工资也会相对提高,好处是利益均沾,坏处是外销的优势就丧失了。所以,这是两难之举,怎么调整需要智慧。我认为,对富裕阶层要课以重税,提高基本工资,大企业向内部发展,等到最后全体国民都有比较高的购买力的时候,又可以回到依靠内销的发展模式上来了。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人口最多的农民,被撩在一边。三农问题,至今未得完善的解决的方法。

马国川:其实刚才您讲到的,也是近两年大陆和海外一些人士正在热议的话题“中国模式”。您所说是经济层面上的“中国模式”,有些人把更广义上的“中国模式”总结为“自由的市场经济+政治的集权”。您怎么看待广义的“中国模式”?

许倬云:集权有两个方面,短期来讲,集权的效果好,一个命令下来,不用磋商,效率很高。短期,小规模,不容易出弊病;但是长期、大规模的计划,就会有问题。长期而论,“夜行多露”,不可能每一步都走对,在一个小错误之下,全国的危害是惊人的。“大跃进”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像李光耀,在新加坡可以作出成绩,可是最近新加坡政治也发生了变动;他儿子要变成邓小平、蒋经国。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我们经不起冒险,不能一百年或五十年继续走一条路到底。我们把所有的鸡蛋摆在一个篮子里,摔一跤鸡蛋全都摔光了。如果把鸡蛋摆在多个篮子里,最多摔一个

篮子。我这完全是从实用的观点来看“中国模式”。

马国川：对大陆来说，“摔一跤鸡蛋全都摔光”的危险确实存在。因为近年来大陆社会矛盾很多，群体性事件不断。有识之士忧心忡忡，认为如果不能积极推进社会转型，有可能爆发暴力冲突。

许倬云：有一次革命就够了，下面应该考虑如何修正、协调、妥协，这比革命要上算。

## 自己的现代化道路

马国川：您一再讲“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它的内涵是什么？

许倬云：从五四到现在，不管大陆还是台湾，中国的现代化都是以英美式的社会、经济、教育、科技作为模式的，以为这就是人类未来的终极目标。前些年美国学者福山也说“历史的终结”，但现在才知道，历史没有终结。

从启蒙时代勾勒出来的“现代化”画图，就是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科学、市场、法治等等，最后落实在民族国家的框架里边，落实在民族国家至高无上的国族意识之内。一些人认为，英国和美国已经走完了这个历程，像德国、日本就走错了，然后回头。实际是不是这样呢？并不是。西方从启蒙时代规划的“现代”一路走来，走疲倦了，也在发生改变。譬如，欧洲国家从自由个人主义逐渐转向“社会福利国家加民主制度”，不再是当年的个人主义的民主自由。欧盟的出现，也正在让过去坚持国族主义的民族国家和主权国家是终极共同体的理想，转变成各国彼此合作互助的区域组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罗斯福“新政”后，美国修正了自己的制度。美国的民主也在庸俗化，美国的疲倦性比别处更大。导致疲倦性的一个大因素，就是科学主义的独断以及一神信仰的基督教排斥其他文化系统，呈现独断和自以为是的心态。再加上永远追寻、永远进取的“浮士德精神”：国家要不断壮大，一切事物要不断改进，变得更快更大更好；大企业继续掠夺资源，造成资源短缺、环境恶化，也造成了各国之间的冲突。这些也造成今天出现了许多“后现代”的反思。



马国川：大概从第一次欧战开始，就不断有人做反省工作。

许倬云：是的，1918年斯宾格勒出版的《西方的没落》就是做反省工作，他的讨论，开宗明义，就是指出不断追寻、不断扩张的“浮士德精神”的特性。再如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得出世界上有二十一种文明，彼此冲击，彼此影响。二战结束后出现的“后现代”思潮，就是思考“现代”以后世界是什么样。

我有一群朋友，包括艾森斯塔德，提出“多现代性”，现代性不能只有一种，不是只有一辆列车开往一个终点站。这都是在反省。

马国川：如果把现代化道路高度化约的话，现代化道路就是走向自由、人权、法治、民主，您是不是认同只有这一条道路？

许倬云：不能这么简化，因为自由里边有责任，大多数只看到权力，没有看到责任；人权本身也有责任，每个人都不能侵犯别人人权；法治不是法条，法治后面是人的价值，必须有所肯定；民主也有限制，像台湾庸俗化的民主、缺少纪律的自由民主，选票会被人家利用、购买或者篡夺。

马国川：对大陆来说，实现民主是非常急迫的，但是在您看来，在实现民主的过程中也要警惕民主的庸俗化？

许倬云：对，所以推进民主、自由、法治，这三个东西都要套在一个事情上，就是我们寻找的人存在的意义，人存在的价值在哪里。这些听上去似乎玄之又玄，实际是人类在走向无尽无休的现代的过程中必须一直思考、反省的。未来几十年，中国要背负巨大的任务，既为自己找出路，走向更好的境界，也为世界找方向，将今天已经衰疲的主流文明，注入新成分，开拓第二春。为了这些任务，中国人应有宽阔的心胸，自由讨论和尝试的环境，共同努力。

寄语中国的俊彦，尤其主政的人士：天下事，抓得太紧，寸步难行；放宽些，海阔天空。凡事总以远处大处看，不能只看眼前。前途多歧，一不小心，可能迷路；然而，多歧，也是多选择，也许从此忽然开朗，出现新境界。常常反省，不断寻找，随时修改，以求适应，总比墨守为宜。

马国川：我觉得您的思考已经超越了民族国家的层次，是站到全体人

类这个角度去思考问题。

许倬云：我们现在讲人权，人应该越来越好。但是讲人权不能侵犯自然资源，不能剥夺穷国的资源，不能剥夺了未来一代的资源，更不能剥夺了我们寄身所在的自然环境，否则人类就会变成地球的癌症。所以，我们讲人权，也应该包括对整个宇宙的责任。

雅斯贝尔斯是了不起的思想家，他提出人类文明正在进入第二阶段。人类文明的第一阶段是人发现自己，对自己的终极关怀提出解答，佛陀、孔子、耶稣等伟大的思想家都是如此。第二阶段是科技的历程，科技本身引发了新社会、新文明，在这个文明之下人类又丢掉了自己，科技作为人类找到的工具反过来又制约人类的思想，统治人类的生活。因此，我们要寻找一些新的观念，让科技做我们的工具，回归人本身，让我们理解自己和宇宙，人还要回到人本身的尊严。

我认为，真正尊严的东西只有两个，一个是全体人类，一个是个别个人。只有这两条是真实不虚的，其余种种不同的组织方式都是暂时的。

马国川：包括民族国家也是暂时的。

许倬云：对，所以最近二十年来，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文化学家都说，国家是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家族也是想象的共同体，夫妇组织的家庭也是若干组织形态之一个选项。任何的组织和集体都是其时空条件的选择，是可以改变的。真实不虚的就是作为宇宙间现实存在的全体人类，还有自主存在的个别个人。这些才是我们应当永远推前的。现代不应该是终点站。

马国川：是否正是基于这些思想，您对民族主义抱着高度警惕的态度？尤其是这些年随着大陆经济的高速发展，民族主义思潮确实在兴起。

许倬云：确实要警惕民族主义。中国没有在现代过程里边完全走西方的途径，五四运动等于是把启蒙搬过来，但是也没有在五四中贯彻。五四所留下的，一个是科学主义的迷信，一个是国族主义的信仰。后者走过了头，例如日本的例子，就是民族自大。这两点，有一定的意义，可是也会造成灾害。德国和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就是国族主义的灾害；科学主

义的危害,则是一切力量都放在应用上,不再反思精神和灵魂。

从根源上看,中国文化不是以神为本,而是以人为本的,自我自尊,自我约束,人和人之间互相尊重,个人主义不是独立的个人,是人和人相处的个人。这些在今天的中国已经减弱了,怎样把它们从中国文化根源上挖掘出来,经过当代的诠释和修改,一步步尝试、落实,将是中国对世界的最大贡献。

目前,台海两岸的经济发展,多有可圈可点的成绩。但是,也都呈现可虑的问题。中国文化传统已经只剩下一些枝节和表面的形式。文化的价值系统,已经很虚弱。于是,大家都接下了西方文化的浮士德精神,追逐近利,不知节制。两岸都有贫富悬殊的不公不义。两岸在迅速发展经济的过程中,都在迅速的将土地转化为工厂和都市用地,都在消耗水资源,破坏人类的生存环境。不久之后,中国将无可托身的土地,无可饮用之水;社会贫富分歧,有可能导致另一次大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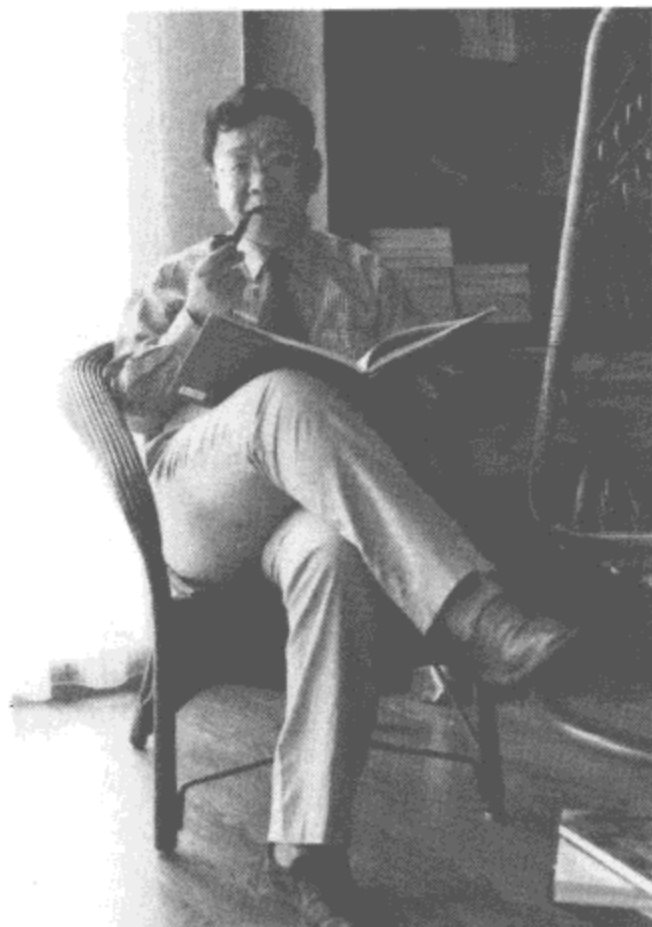
我已年迈,寄身在海外。国家事,我已不宜多嘴。只是,佛经中,有一次森林起火,有一小鸟,忙着扑火。天神问他,又何必多此一举。小鸟回话:只因曾寓此山,心有不忍,尽力为之,求其心安而已。

采访时间:2011年5月31日下午

采访地点:北京—台湾(电话采访)







## 宪法出场，革命退场

### 高全喜

江苏省徐州市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1983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85年获得吉林大学西方哲学硕士学位，1985年起师从贺麟先生，攻读德国哲学和政治思想史，1988年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博士学位。先后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2007年开始任教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研究方向：法理学、政治哲学和宪政理论、空间法理论。主要著作有：《自我意识论》、《理心之间——朱熹和陆象山的理学》、《法律秩序与自由正义——哈耶克的法律与宪政思想》、《休谟的政治哲学》、《何种政治？谁之现代性？》等。

## 采访手记

辛亥百年的系列采访将近结束,在整理稿子的过程中发现,除了个别思想家外,采访对象都是历史学家。对于历史最有发言权的固然是历史学家,而且采访对象涵盖海内外和两岸三地,但是我总觉得,似乎应该请其他领域的学者来探讨这个宏大的话题。不过,找谁呢?

很偶然,我得知法学家高全喜教授正在撰写《立宪时刻》一书,研究内容恰好是辛亥革命。一个法学家视野里的辛亥革命?这显然是一个好题目。于是,在6月上旬的一个下午,我来到百望山山脚下的天秀花园,走进高全喜教授的寓所。

虽然早和高教授认识,但是对于他的人生经历并不了解。我曾经拜读过他赠送的《何种政治?谁之现代性?》。钦佩之余,也有些疑惑:这位法学家怎么对于政治学也很有见解呢?

其实,高全喜最初的专业并非法学。八十年代中期,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师从贺麟先生,攻读的是德国哲学和政治思想史,198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当年的中国社科院人才荟萃,一些年轻人甚至在读书期间就参与到了经济改革中去。毕业留院任教的高全喜正要在学术上一展才华,不料被诊断出肝病,从此在医院和家庭间奔波。

“我一病经年,退出了学界”,高全喜回忆说,“十年后当我重返学界的时候,发现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有些变故使我错愕和感叹。记得当年在西八间房那幢颓败的小楼的二层,我住在中间,右边住的是刘军宁,左边住的是汪晖,朝夕相处,大家共同度过了艰难的岁月。没想到的是,十几年后,大家竟然成为当前思想界中所谓自由主义、新左派的各色人物。真不知道历史这个魔鬼为什么如此捉弄我们这一代人?”

当年的同学多已在学界崭露头角,重返学界的高全喜仍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一个普通讲师。他决意转向法学和政治学,不数年

就成为学界的活跃人物,遂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两年后又转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今年四十九岁的高全喜担任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双栖于法学和政治学研究领域。

在整个下午的散漫闲谈中,我意外地发现,他对于美术也有研究。在经年的病中,他曾经主编过一本美术杂志,九十年代许多落魄的年轻美术家都被他推介过。而今,其中的许多人都成为美术界的名流,一幅画甚至可能被拍卖到上千万元。

高全喜认为,在一个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国家里,一个学者,要摆脱学术研究的孤独感,势必要有对当下社会的现实感和把握度,让自己的研究能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起到作用。因此,他没有在单一学科的研究之路上愈行愈远,而是毅然调整研究方向,“我总是想赋予自己的研究一种中国意义”。

同样,他以解读《清帝逊位诏书》的独特视角解读辛亥革命,并非要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当下中国提供镜鉴。他认为清帝逊位,是中国版的光荣革命,只是未被因势利导,以失败告终,但其蕴含的共和宪政精神,有待发扬。

“如果我们放宽历史的视野,特别是在时间感上放宽,就会发现,最近这一百多年,中国正在经历的,是政治体制的变革,传统的君主国家已经结束,但是现代民主宪政国家仍在铸就当中”,高全喜说,“我们现在需要的是理性,而不是暴力的变革。我之所以去诠释《清帝逊位诏书》,就是想说明,在近代史上我们有革命的精神,也有共和立宪的精神,继承、发扬哪一种精神,我们是有所选择的。”

他的结论是,革命退场,宪政出场。



## 中华民国的宪法基础是什么？

马国川：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是今年学界的一大热门话题，我注意到，谈论这个话题的学者，主要是历史学家和思想家，法学家极少关注。作为一位法学家，你能否从法学的视角谈谈辛亥革命？

高全喜：从法学的视角审视辛亥革命，确实有一定的挑战性，也会有新的发现。从以前的历史叙事来看，辛亥革命的功绩就是“推翻帝制，建立民国”。但是如果从法律角度看，马上就有了疑问：中华民国是建立在革命的基础之上的吗？

马国川：难道不是因为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才建立了中华民国吗？

高全喜：如果我们承认中华民国是一个现代国家，那么那种“革命建国论”就值得推敲。

西方现代国家的构建，大多都是基于各自的宪法，即便是没有成文宪法的英国宪制，也会有不成文的宪法，尤其是一系列宪法性法律文件，它们担负着塑造国家政体的构建性功能，属于“活的宪法”。例如，美国是根据成文宪法《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立基建国的，而英国光荣革命之建国的基础就是一系列宪法性法律文件，包括1688年的《宽容法》、1689年的《权利法案》、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以及历史悠久的《大宪章》等。那么，中华民国建立的宪法基础是什么？

马国川：对于这个问题，辛亥革命前后革命党人，包括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领袖曾经考虑过，他们大体一致的意见是，效法美国及其他成文法国家，通过制定一部宪法为立国之根基。1912年3月11日颁布的《临时约法》是为了随后制定正式的《中华民国宪法》而草创，《临时约法》第



五十四条规定:“中华民国之宪法由国会制定,宪法未施行以前本约法之效力与宪法等。”换句话说,中华民国的宪法基础就是《临时约法》。

高全喜:大家习惯性地认为,《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中华民国立国之宪法,或具有临时性质的中华民国之宪法。可是,至少在清廷退位之前,《临时约法》只是代表了南方(南京)革命政权所诉求的立国之宪法,并不代表全体国民尤其是北方民众的共同意志和政治决断。也就是说,它是以辛亥革命的革命动力而塑造出来的,与革命对立的改良主义立宪派,包括清政府以及南北各省士绅群体,都没有实质性地参与到这个临时约法的宪法创制中来。

《临时约法》的另外一个短板,就是人民制宪问题,这部约法没有从制宪权的高度实质性地解决人民与国家(共和国)的关系:何为人民?何为民国?中国人民以什么方式制宪建国的?依照这部约法的深层宪制逻辑,民国构建是源于国民革命,正是基于这场伟大的革命,才培育、冶炼和塑造出“中华人民”,由这个崭新的现代国民——中华人民,行使制宪权,构建现代国家——中华民国,即一个人民的共和国。这个写进《临时约法》文本中的“中华人民”是如何发生的呢?《临时约法》规定了人民组织国家、享有主权、赋有权利,但是人民为什么能够如此,人民在哪里?人民又是如何制宪的?

马国川:你的这个观点虽然新颖,但是我不敢苟同,因为革命是非常时期,不可能按照学者的想象,大家坐下来心平气和地商量如何制定宪法。事实上,美国宪法不也是一小群人坐在一个房间里制定出来的吗?再者,怎么能够想象,立宪派、清王朝会和国民党人坐在一起讨论建立新国家的宪法呢?!要知道,这个宪法是要“革”清王朝之“命”的。

高全喜:第二个问题的实质,就是建立现代国家能否依赖革命。如果按照革命建国的逻辑推导,那么,革命的对立面一天不被打倒,那么现代国家一天不能建成。如果不能“完全、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清王朝和立宪派在内的“一切反动派”,中华民国就永远不能建立。事实上,可能吗?

中华民国建立前革命党人之所以进行宪法创制,目的就是通过制宪

而构建一个共和国,建国是宪法的实质或目的。围绕着这个建国之制宪目的,就出现了一个所谓的“立宪时刻”。在这个非常的“立宪时刻”,代表人民主权的制宪者,可以是制宪会议,也可以是国会,甚至某些作为主权者的受托人个人组成的小组或委员会,按照正常的制宪程序步骤创制出一部宪法。美国就是通过作为主权者的受托人组成的制宪委员会完成了《联邦宪法》,圆满地度过了大陆会议后几年的非常时期,迎来了一个稳定、繁荣的日常政治的成文法国家宪制时期。

我同意,不能机械地以所谓宪法规范、宪法格式或宪法名目来考察或解读中国的百年宪制,解读中华民国肇始之际的宪法创制。我们要从中国人民这一现代共同体的政治命运之视角来发现和解读中国的宪法。因此,既不能拘泥于既有的宪法文本,也不能单纯从现成的规范主义出发。回到中华民国肇始之际的“立宪时刻”,我们就会发现,现代中国的宪法创制,并不是由一个宪法文本——《临时约法》体现的。我认为,中华民国创制之时的宪法,是由一组宪法性法律所共同构成的,包括《临时约法》和《清帝逊位诏书》两个宪法性法律文件,它们作为姊妹篇共同构成了中华民国创制之宪法,它们才是作为民国肇始之立国根基的根本法。

## 君主立宪道路一直在走

马国川:把《清帝逊位诏书》作为中华民国创制的宪法,似乎难以服人。先不要说,仅有数百字的一纸诏书能否成为共和国肇始之立国根基,即使从诏书颁布本身来看,也是非常消极被动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在革命形势的逼迫和袁世凯的威吓下,已经没有威权人物的清王朝只剩下孤儿寡母,在被逼无奈之下才颁布《清帝逊位诏书》,情非得已。

高全喜:我认为,古往今来任何一种政治改革都难免有被动性因素,没有危机就没有改革,尤其是关涉古今之变的王朝政治之变革,而且还关联种族畛域问题,所以,动机上的被动与主动与否,不是问题的攸关点。关键还在是否实施,即便是被动的,如果是真切而富有成效地实施了,这个宪制依然是优良的制度。

对于一个崇尚实用主义的中华传统以及臣民来说,清帝逊位没有什么微言大义,这份诏书的宪法性价值也不为人们所看重,一对孤儿寡母既没有政治决断,更不可能对中华民族的未来命运有什么深谋远虑。可是,这只是历史叙事的一个方面,并不是全部内容,它还有另外一个方面,这个方面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当事人,包括隆裕太后、宣统帝以及袁世凯等人的言行所及之范围,这些人物都没有认识到其中隐含的历史玄机。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受到外部力量持续强有力的冲击,这个外部力量不同于传统王制所遭受的游牧民族,而是裹挟着物质力量、文化力量乃至制度文明的现代西方的民族国家。在现实面前,中国开始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艰难转型,尽管在很长时间里,人们不知道向哪里转,不知道“彼岸”在哪里。但是人们很清楚,老路子已经走不下去了。甲午海战中国败于日本之后,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给中国很大的启示。从日本的经验里,中国隐约看到了“彼岸”的所在。康梁变法就是向这个方向的努力。可以说,现代中国的立宪史就是源自康梁变法。

马国川:遗憾的是,康梁变法没有成功,中国再次回到了老路上去,甚至更加反动。清廷纵容义和团,导致庚子之变,西太后仓皇西逃,清王朝濒于崩溃。而在康梁变法之前,孙中山就已经开始了推翻帝制的革命活动。

高全喜:在日益严峻的外部列强的冲击之下,清廷庞大的旧体制里,一直存在改革力量。但是在甲午战争尤其是戊戌变法之后,产生了明确的分化,原先朝野共同诉求体制内变法图强的主导性改良主义力量,逐渐分化为“革命党”与“立宪派”两种截然不同的“建国路线”。两条路线各自遵循着自己的政治逻辑不断发展演变,各行其是。

就立宪派的演变来看,又可分为两股变法求变的力量。一股是以康梁党为主体在海外发动的、朝野精英中主张体制改革者广泛参与的力量,口号是“君主立宪”。他们创办了多种刊物,极力鼓吹君主立宪,这一派在体制内深得人心,尤其是在野的士绅阶层如张謇、汤寿潜等人早就主张立宪改制,1901年之后,他们所代表的士绅阶层构成了国内立宪派的主体。另一股来自清室朝廷上层中的改革力量,像张之洞、端方、袁世凯等

一些封疆大吏,他们都主张效法日、俄、英等国体制,实行君主立宪,保国、保教、保种,应对日益严峻的内忧外患之危机。随着清廷内外危机的加深,上述两股力量逐渐合流,君主立宪的政治改革成为清统治者不得不走的必然举措。晚清新政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

马国川:在革命党人看来,所谓的新政不过是骗局而已,当权者并没有实行体制改革的诚心。所以,革命党人不断地发动起义,屡败屡战。

高全喜:“骗局”之说,至今流传。但是,以清末的形势来看,不变法,统治者只有死路一条;变法,可能还有一线生机。两害相权取其轻,西太后开启政治体制改革,其实是符合清王朝自己利益的。在这个意义上,清末新政是明智的政治决断,不能简单地视为“骗局”。虽然上层的立宪改革并非一帆风顺,但是立宪主义的君宪制改革一直在向前推进。如果以十年为尺度,1911年的中国和1901年的中国已经大不相同,民间报纸、社会组织、谘议局等各个机构已经有了极大的发展。

费正清说过:“清代从1901年到1911年的最后十年与其说是处于崩溃时期,倒不如说是处于新的开始时期。制度和社会的变革开始较早,而政府灾难直到最后降临。事实上,直到1911年为止,中国政府一直按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所宣扬的,但未见成效的那些方案逐步进行重建……确实,皇太后和顽固派没有其他路可走,义和团战争表明了纯排外主义的破产,而反清叛乱的威胁促使清政府采取创造性的步骤来拯救自己,因此中国政坛上的主要运动就是保守的改革。”

马国川:1911年爆发武昌起义,立宪主义的君宪制改革就走到了尽头。

高全喜:事实上,与辛亥革命相对应的君主立宪之道路并没有随着武昌起义而终结,在一百年前这个大变革的历史时期,在关涉现代国家构建的“立宪时刻”,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政治势力:袁世凯代表的北洋势力和立宪派为一方,革命党人组成的南京临时政府为另一方,第三方就是满清权贵,以隆裕太后、宣统皇帝为主要担当者的清王室,他们也面临着一次生死攸关的政治决断。他们的决断结果就是颁布《清帝逊位诏书》,这是承接君主立宪道路余绪的一份宪法性法律文件。诏书全文如下——

“奉旨。朕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睽隔，彼此相持。商辍于涂，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义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义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钦此。”

## 中国版的“光荣革命”

马国川：《清帝逊位诏书》是按照传统上例行的皇帝退位程序下诏或颁布的，不像《临时约法》是通过临时参议院正式制定的。就其内容来看，逊位诏书也大不同于一般的宪法，尤其是所谓的宪法律，完全没有关于国家权力分配、公民权利保障、国家机构职权定位、议会、政府、司法组织与运作等方面的内容，仅仅只是关涉退位缘由、政权延续、皇帝、皇室优待条件和满、蒙、回、藏各族优待条件。为什么你把这份逊位诏书和《临时约法》同视为中华民国创制之宪法呢？

高全喜：这份逊位诏书的基本精神和核心原则是，赞同共和立宪国体，将政权转让与一个立宪共和国，而不是传统上例行的皇帝退位诏书，将统治权转让给另外一个一家一姓之王朝。这份契约性的逊位诏书，其基本前提是将统治权授予双方都认同“共和立宪国体”，没有双方对此的一致认同，逊位诏书可以说是无效的。正是在这一根本点上，双方达成了共识：建立共和国，这是全体人民的愿望、心声和共同的意志。

为什么说它是一份契约性的逊位诏书呢？因为它对于双方都有约

束力。由于清帝系主动赞成共和,所以民国政府要优待大清皇帝,这是一种政治契约关系。也就是说,《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以及其他《优待条件》)是宪法性质的文件。《逊位诏书》三道圣旨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一样,皆属于民国的建国文件,两者共同构成了共和政府的法理基础。人们以往注意到了有关退位与优待条件的契约性关系的清室一方,而忽视了另外一方,即对于未来的中华民国,清室退位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不是优待条件,而是清帝逊位让与的对象(接受方)只能是共和立宪之国体,即中华民国——人民的共和国,而不能是另外一个一家一姓之皇帝。如果从上述这个具有契约论蕴含的宪法视角来解读,我们就会发现,这份逊位诏书其所具有的意义是巨大的,它彻底打破了古代千年盛行的王朝帝制之循环更替的传统,实现了中国政治的古今之变,促使中国从王朝专制统治转变为一个现代的立宪共和国,而且这个立宪共和国还不是君主立宪制,而是人民的共和制,是诏书明文确定的“共和立宪国体”。

马国川:如此说来,这份诏书不仅仅是单方面的被迫退位,而是一份双方都接受并具有约束力的建国契约,具有宪法性法律的意义,即通过这份诏书,一举证成了基于民心的人民共和国之宪法性的根基。

高全喜:诏书中多次申明承认这个“共和立宪国体”,不仅是对于革命党人的国家构建之目的性的某种承认和认同,同时也是对于清王朝自己的改良主义立宪改制的某种肯定和认同。因为革命党也是要立宪的,它们不是传统王朝意义上的武装造反,而是要立宪建国,只不过革命党一直排斥清政权,把立宪建国与满清政权对立起来;同样,满清王朝十年来也发起、推动和实施过立宪改制,但是这一轮又一轮的立宪改制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动的和虚伪的,其目的是维护清王朝的专制统治,保持清王室和皇族的存续,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中也有一股发奋图强、保国安民的改良主义真精神。这个逊位诏书的“共和立宪国体”从未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构建来说,又是对于革命党人的革命立宪和清王朝改革派的改良立宪的双重继承和超越,即既继承和超越了革命党狭义排满的种族革命的立宪建国,也继承和超越了体制内顽固守旧于君主专权

的君主立宪,而是将它们同归于一个立宪国体,即“共和立宪国体”,这样一来,整个中华数十年来贯穿于体制内外相互对决的不同立宪建国(改制)运动被提升到一个新的阶段,并最终以和平方式安顿在一个最高的“共和立宪国体”之中。

对于传统王朝帝制来说,清室颁布的《清帝逊位诏书》认同并禅让与中华之“共和立宪国体”,无疑也具有“另一种革命”的意义。这个革命不同于辛亥革命之革命主义的“革命”,而是一种中国版的“光荣革命”。清帝退位后的第二天,孙中山在致南京临时参议院的咨文和袁世凯的电报中都使用了“清帝逊位”的说法,实际上默认了清帝退位的禅让性质。伍廷芳在和谈期间的电报中也两次使用“光荣”一词,并认为“清廷以争一君位之故,不惜流全国之血,必为人道所不容”,最佳选择是主动退位以享受“国民之优礼”和“文明待遇”。对于清帝逊位,袁世凯更是高度赞誉:“凡我国民,须知此次改革,为我国从来未有之劫局。非舍故君而代以新君,乃由帝政而变为民政。自兹以往,我中国之统治权,非复一姓所独擅,而为四百兆人所公有。我中华国民,不论满、汉、蒙、回、藏何种民族,均由专制朝廷之臣仆,一跃而为共和平等之人民,实我中华无上之光荣,亦世界罕闻之盛举。”

## 支持和维护宪法精神的软弱

马国川:虽然《清帝逊位诏书》和《临时约法》共同构成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性的根基,可是,二者却存在内在的冲突。因为革命党人是要通过武装起义,推翻满清专制统治,以此构建共和国。《临时约法》体现的就是这种激进主义的、暴力的非和平方式的“革命建国”。而诏书所申明的,却是和平方式的逊位,即将统治权移交、转让给南北两方通过“议开国会、公决政体”所确定的“共和立宪国体”。前者是改革的逻辑,而后者是“反革命”的逻辑。和平与暴力相对立,革命与反革命不兼容。

高全喜:其实,《清帝逊位诏书》为革命恢复了名义,并以非暴力的和平方式参与了革命建国的历史进程。就这份诏书来看,清室不再把起义

视为叛逆、暴乱,而是认可了革命起义的正当性,因为起义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诏书将起义称为“民军起事”,看到“各省响应,九夏沸腾”,诉求共和是“人心所向,天命可知”,“南中各省,既倡义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对此,清帝愿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由此,起义就得到了逊位诏书的正面认同。当然,诏书认同的是旨在建立“共和立宪国体”之目的起义或革命,而不是其他方式的武装起义,例如,拥军割据、自立为王、分裂独立等形式的武装暴力行为。其实,革命党人的诉求也是革命建国,孙中山早在组建革命党——同盟会时就提出革命建国的主张。这样一来,这份诏书与革命党人的目标达成了一致,取得了和解:凡是旨在构建共和立宪国体的武装行为才是革命,革命是为了建国,故而革命建国成为双方一致同意的基础。

诏书并没有置身未来的共和国构建之事外,反而厘定共和立宪国体之目标,遣员参与商议召开国会,制定宪法,这分明承续着清室一脉的改良主义立宪建国的路线,只不过诏书所表现的这个立宪建国,是对自己过去曾经虚情假意实施的君主立宪制的自我革命,变君主立宪为人民共和立宪。也正因为此,这个和平方式的革命建国,才从另外一个方面弥补了辛亥革命建国的激进性和片面性,并通过这个双方认同的具有宪法意义的逊位契约,把两种革命建国的方式融汇在一起,从而深化和完成了中华民国革命建国之构建。经由这场起于暴力起义终结于和平逊位的“革命”,中国政治完成了一次历史性的古今之变,从传统帝制转变为现代民国。清室以这种方式参与了第一共和国的构建,不啻为一场中国版的“光荣革命”,即以自我和平逊位的方式参与到革命建国和人民制宪的宪法主题之中,以自己形式上的死亡,与这个国家和民族共同赢得新生,同时也昭示着自己并没有真正死去,没有被历史之手丢弃到历史垃圾堆里。

马国川:从清室的角度来说,这确实是一场中国版的“光荣革命”。英国的光荣革命曾经以国王查理一世的头颅为祭,又经历了克伦威尔的共和激进主义僭主统治,最终才确立了自由立宪的虚君共和国。然而,人们大多把清帝逊位视为象征性的一幕,把这份逊位诏书视为革命党人的



不彻底性之体现,认为它表明了中国新生的资产阶级的阶级软弱,是对于封建主义反动派的妥协甚至倒退。

高全喜:我不同意这种基于意识形态的革命历史观。相反,我认为以《逊位诏书》这份契约性文件所规定的清帝逊位,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标志着中国历史的古今之变以一种中国版的“光荣革命”形式完成了承上启下的历史性转型,这份诏书因此具有宪法性的法律意义和地位,它与《临时约法》一起承担了中华民国肇始之宪法性法律的重任。需要声明的是,对于《临时约法》、革命的意义、武昌首义的价值,我从来没有否定,我从来不是一个反动派、保守派、保皇派,没有站在清王朝退位君主的立场上指责革命的不正当性、革命的非正义性。我只是认为,《临时约法》要加上《清帝逊位诏书》,是这两个宪法性文件共同构成了中华民国的立国之根基。

光荣革命是英国现代史的中心内容,它固然是一场保守的英国传统政治的复辟,但这个复辟并非反动的倒退,而是旧瓶装新酒,它以复辟的形式重新塑造了一个新的自由、法治、宪政的现代英国。从政治宪法学的角度看,伴随着这场革命,英国议会制定了一系列的具有宪法性法律意义的法案,在英国的政治制度中还逐渐形成了一些具有宪法性意义的政治惯例,这些构成了英国所谓未成文宪法的基本内容,由此一个现代的英国宪制和现代国家才真正构建出来。

马国川:相比之下,中国古今大变局中的这个清帝逊位以及逊位诏书,其历史地位和宪法性意义并没有受到广泛重视,这是为什么呢?

高全喜:因为中国版的光荣革命失败了。之所以会如此,维系这个逊位诏书的政治势力——中国的资产阶级缺乏独立自主性,没有强有力的实力作后盾,而英国的光荣革命,支持其王室复辟的社会政治力量是强有力的新兴资产阶级,从这个阶级论的角度看,说中国新兴资产阶级是软弱的,也有一定的道理。

在现代中国,从辛亥革命开始,革命激进主义畅行无阻,愈演愈烈,和平立宪的改良主义和保守主义是如此软弱无力,日渐边缘,《清帝逊位诏书》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也就不甚稀奇了。

马国川：传统教科书也说“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指责当时的资产阶级缺乏彻底扫荡清帝为代表的封建专制主义的软弱，以至于还保留了这份狗尾续貂的逊位诏书。

高全喜：但是，我这里所说的软弱恰恰相反，指的是在支持和维护逊位诏书所蕴含的宪法精神的软弱。如果我们穿越百年历史的重重迷雾，就会发现，我们过于轻视了清王朝晚年以来的变法改制以及这份逊位诏书所留下的宪法遗产，实际上，以后的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仍然分享着这份富有生命的遗产而不自知。例如，在当今世界格局中，我们在有关中国主权问题的国际法论争上，往往义正词严地追溯到清帝国的边疆版图，据此捍卫和论证我们中国的国家主权权利，但是，如果我们的国家宪法不能把《清帝逊位诏书》之宪法性精神纳入其中，我们今天又有何法理依据伸张自己的主权权利呢？

## 宪法出场，革命退场

马国川：如果承认《清帝逊位诏书》是宪法性文件，当然应该支持和维护它。可是为什么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认为，不管是革命派还是立宪派，当时的资产阶级具有保守性和妥协性呢？

高全喜：关键的问题在于，中华民国的构建是否应该基于辛亥革命之革命党的革命正当性之基础之上。我认为，如果把中华民国或现代中国之兴起仅仅落脚在辛亥革命之上，显然是片面的，这个共和立宪的现代共和国，其构建是两种革命之折冲、对立以至最终融汇的结果，因此，除了辛亥革命之激进革命外，还有另外一种革命，即立宪派的保守主义革命，或改良主义的变革，这个变革从晚清预备立宪开始，甚至从戊戌变法开始，直到以清帝逊位的和平权力转让为终结，恰恰是这个立宪派的改良性的保守主义革命对于辛亥革命所代表的激进主义革命之折冲，才克服了法国革命式的社会破坏性结果，维系了一个从传统帝制向现代共和国的和平转型。何谈革命的不彻底性？要之，恰恰是立宪派的保守性和妥协性，才使得两种革命建设性地联合在一起，完成了中国政治古今之变的历史

性重任。

从历史大尺度的视角来看,对于这两种革命,采取任何一种厚此薄彼的革命史观都是片面的,现代革命的实质不在于要多么彻底,而在于是否付诸于宪法,宪法出场,革命退场,这才是一个现代国家之构建的核心原则。

马国川:这里有一个悖论。如果宪法不能出场,或者宪法难以贯彻,谁来维护宪法?反之,如果革命迟迟不退场,那么,宪法秩序也难以形成。看看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发动的历次革命,不都是打着“(维)护(宪)法”的旗号吗?终其一生,孙中山也没有看到宪法落地的那一天。

高全喜:真正的革命使得宪法制度产生了,但真正由革命中产生了反革命这样一种保守力量,会推动宪法出场,革命退场,革命最终要通过自我的否定完成守护革命成果的一套制度建设。如果一个阶级、一个社会的主导力量足以成熟的话,不是要将革命进行到底,把所谓的敌人彻底消灭,变成一个无穷的不断革命下去否定下去的一种东西。

我们看到,对于现代政治来说,总是摆脱不了一个“革命之后”的梦魇问题。对此,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以及中国革命,就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革命之后”问题。为什么美国革命能够解决这个难题?因为美国很好地完成了“革命的反革命”。从《独立宣言》到《联邦宪法》,美国人民把政治(尤其是革命与内战)问题转化为法律问题(宪法)问题,进而把其中绝大部分转化为司法问题,从而守护人民的自由与安全(和平),这是美国宪法的精髓,也是美国政治的“秘密”。革命本身不是自由,革命是一种动力和力量的源泉,具有摧毁的性质,而宪法则是革命之轭,是一种政治规范,用宪法之轭约束革命的势力,从这个意义上,一切真正的宪法都是反革命的(counter-revolution)。

马国川:“革命的反革命”是一个很好的命题,但是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历史表明,革命一旦发动,就很难“刹车”,反而呈现加速度之势。

高全喜:中华民国立国是两种对立的宪法精神中和、妥协的产物。这也为现代中国的构建,提供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政治时期或者立宪时刻。遗憾的是,由于新兴的社会力量、政治力量、阶级基础不够

成熟强大,致使和平主导下的立宪时期没有真正转化为稳定而常态的宪政制度,最终导致十年制宪总是屡战屡败,屡遭挫折。到“曹锟宪法”出来之后,变成了一纸具文。由此才孕育出了1924年之后的国民革命以及大革命,随后中国进入了党国新的政治形态,内战连绵,直至1949年两岸分治。

革命是一种暴力,一种推翻王朝专制主义的有力工具,即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工具。革命的传统在现代性的中国政治中,屡屡畅行,尤其是来自法俄的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致使中国不断陷于内乱之深渊,给中国造成巨大而沉重的灾难。

马国川:总起来看,你并不怀疑和否定辛亥革命的意义,只是想提醒人们注意“历史的另一面”,因为它既是不能忽视的真实历史,而且其中也隐含着另一种历史可能性,一种丧失了的历史机遇。

高全喜:我们现在的历史观,评价的时候只从一个维度极端化、绝对化,完全忽视了另外一种力量,这种力量能够对冲、折衷、消减革命激进的血腥。我们应该正视历史,应该给清帝以及当时的一批改良主义的力量给予正当的历史评价,不能只唱革命的赞歌。如果在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惋惜革命没有彻底的将清帝、立宪派以及在晚清主张改革的一批人彻底打死打垮,送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就说明我们的历史观没有任何进步。

回顾中国百年宪制历程,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一味革命是完成不了建国大业的,要借鉴和学习英美立宪革命的经验,探索中国的“革命的反革命”的宪制道路,由革命者自我实现“反革命”的改良道路,这才是中国的前途所在。在此,就需要中国人民尤其是政治精英从“不断革命”的恶性循环中走出来,实现“革命的反革命”的宪制国家,真正以宪法为立国之根基,完成“革命—立国—自由”的三部曲。

采访时间:2011年6月13日下午

采访地点:北京 海淀 天秀花园



## 回首辛亥革命，重建价值观念

### 余英时

著名历史学家。安徽潜山人，1930年生于天津。1950年至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升，获博士学位。曾任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现任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余英时对儒家思想及中国道统文化的现代诠释自成一体。主要著作有：《士与中国文化》、《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等。

## 采访手记

采访完袁伟时先生后,我流连在中山大学校园里,最想瞻仰陈寅恪先生的故居。遗憾的是,故居正在修缮,不对外开放。我围绕着故居转了一圈,悻悻离去。

陈寅恪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高峰,其学问汪洋恣肆,令后人高山仰止。其晚年的荣辱遭际,尤令后人扼腕叹息。

1927年6月,一代大师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云:“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

晚年的陈寅恪所生活的时代,已经不是文化“衰落之时”,而是文化“毁灭之时”。因此,陈先生“所受之苦痛”更甚。如他的诗句“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岁为诗欠砍头”,沉痛至极,忧愤至极。他晚年的所思所想都融化在他的诗词文稿里,隐晦曲折,几乎无人能懂。倒是在海外,年轻学者余英时的文章《陈寅恪先生〈论再生缘〉书后》得到陈寅恪“作者知我”的评语。

海天万里,缘铿一面,为什么余英时能够读懂陈寅恪的心思?作为钱穆先生的弟子,余英时掌握了中国文化的密码。余英时先生曾自陈:“通过陈寅恪,我进入了古人思想、情感、价值、意欲等交织而成的精神世界,因而于中国文化传统及其流变获得了较亲切的认识。”

但是余英时先生并没有沉迷于中国文化传统中,而是在会通古今中西之后,在更高的层次上对中国文化进行了定位。2006年他在“约翰·克鲁格终身成就奖”颁奖仪式上说:“如果历史可为指引,则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对基本价值似乎存在很多重叠的共识,毕竟中国的‘道’讲的就是承认人类共通的价值和人类尊严。如今我更坚信,一旦中国文化回归到主流之‘道’,中国对抗西方的大问题也将终结。”

“约翰·克鲁格终身成就奖”素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之称,余英时是首位获得该奖的华人学者。辛亥革命的系列访谈,当然不能少了余先生。

非常遗憾,余先生远在美国普林斯顿,我只好通过电话采访。虽然不能见面,但是从声音里就能够感受到,电话那端是一个温文儒雅的长者。他思路清晰,颇多警醒之语,随口引用的一副对联更是妙绝:

江山是老子打来,谁让你开口民主,闭口民主;  
天下由本党坐定,且看我一枪杀人,两枪杀人。

“这副对联是国民党时代左派人士骂国民党的”,余先生感慨地说,“好对联啊,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

对于中国的现实,余先生也有深刻的观察。他说:“我承认,现在大陆的经济实力在增强。但是,是不是一个文明大国,要比文化,要比艺术,要比科学,比人文研究。并不是有钱了,就能够成为现代国家。腰缠万贯的暴发户并不等于绅士。”

在喧哗浮躁的大陆,如此清醒的警世之语,有多少人愿意说,又有多少人愿意听呢?



## “满洲党”不改革,就逼出一个辛亥革命来

马国川:在辛亥革命之前,清王朝也在进行改革,试图挽救危局。学界把清末改革称为“清末新政”。近年来,大陆学界对于清末新政不再完全否定,而是评价较高。作为一位历史学家,您怎么评价清末新政呢?

余英时:所谓“新政”主要是指清王朝做的一些改革,这种改革从洋务运动就开始了,但是没有触及体制,真正的新政是戊戌变法。戊戌变法第一次提出来改造“君主专制”体制,实现“君主立宪”,这才是改到了体制的关键。

戊戌变法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当时人非常兴奋。资料表明,当时知识界对世界、对西方有了解的人士都觉得,这是唯一一条可以避免危机的道路。两种势力促成了戊戌变法。除了利用《公羊春秋》“托古改制”的康梁等人,部分地方巡抚也是改革力量,如湖南巡抚陈宝箴等。历史学家陈寅恪讲得很清楚,清朝末年的另外一个改革并不是讲《公羊春秋》之类的意识形态,而是实务要改革,不改革中国就存在不下去。

遗憾的是,机会丢掉了,原因就是权力斗争。慈禧太后在咸丰死后掌握朝廷实权,同治死后以年幼的光绪来继承皇位,继续控制权力。随着光绪长大成人,有了自己的想法,两个人的权力冲突发生了。当然,光绪没有夺权的想法,他主要是怕亡国,认为列强瓜分的危险就在眼前,“瓜分豆剖,渐露机芽”,所以迫切要改革。如果按照光绪的想法改革,势必要把慈禧太后架空。

马国川:因为实权都在慈禧太后手上,所以一旦慈禧公开反对改革,改革力量立刻土崩瓦解。戊戌变法仅仅进行了一百零三天,就以失败告终。



余英时:戊戌变法失败的第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庚子之变”。变法失败后,康梁都被外国人保护起来了,继续在海外活动。慈禧太后恼恨“外国势力干涉”,全面反动,利用没有受过教育的老百姓仇恨外国人的心理“扶清灭洋”,于是义和团兴起。她不知道,煽动群众运动势同玩火,结果八国联军进京,慈禧太后仓皇西逃。

马国川:“庚子之变”后,清王朝似乎痛下改革决心,实行了废科举、改官制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大陆学界一般把这一时期的改革称为“清末新政”。

余英时:“庚子之变”以后是不是有改革?这是很大的问题。我们不能认为,废除科举就是改革。废除科举只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人才不够用了,做八股文的人根本没办法对付现在的世界。至于改官制,只是行政方面的改革,目的是提高行政效率。洋务运动中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也是行政改革啊。

我们要分别行政改革和政治改革。庚子之变后的改革,都是行政方面的调整,而政治改革是要涉及整个体制的。虽然清末提出了“立宪”,但也是“预备立宪”,而且还要等待九年以后才开始(陈寅恪挽王国维诗中所谓“君宪徒闻俟九年”)。慈禧太后至死都是不肯放弃权力,不肯改变“君主专制”体制的。

因此,我认为没有什么“清末新政”,清王朝只是做了一些行政上的调整来缓和危机而已。实际上,危机缓和不过去,于是才有了辛亥革命。

马国川:您的观点确实与大陆学界不同。大陆有很多学者们认为,清末新政搞的轰轰烈烈,而且还有很多成绩。

余英时:我不敢说我的看法一定正确。但就我所读过的史料,包括各种公私记载,以及现代学人的相关著作,我没有看到清末有什么“轰轰烈烈”的“新政”。戊戌变法以后,慈禧和满洲保守派贵族最怕满洲政权被汉人夺走,哪敢真正让汉人士大夫进行认真的改革?只要一读以前李剑农先生的名著《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以及西方近几十年的中国近代史作品,包括《剑桥中国史》在内,即可知其大概了。总之,清末满人最关心的问题是亡中国,还是亡大清?在满洲权贵看来,大清比中国

还重要,权力还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汉人不可信,像袁世凯那样的能臣也要罢官回家。

所以我认为,统治中国的满洲就是一个党,满洲党。这个党绝对不能放弃权力。

马国川:您说得很有道理,满洲对中国社会的严密控制、对自己的特殊利益的极力维护,等等,都很像一个前现代社会的政党。

余英时:所有重要的官职都是满洲人,汉人仅仅是辅佐。清朝有一个内务府,专门负责管理满人,一切重要事情都在那里决定。满洲党不能丢权,丢了权等于宇宙毁灭一样,所以它的命运已经注定,只有被推翻。

马国川:大陆有些人士认为,清末形成了“改革和革命赛跑”的局面:一方面革命党人鼓动革命,一方面清王朝实行废科举、改官制等改革措施。而您认为清末没有真正的改革,所以也就不存在所谓“改革和革命赛跑”。对吗?

余英时:“改革和革命赛跑”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满清改革只能限制在经济方面、技术方面、行政方面,只要不涉及根本权力,结果只能使“满洲党”更加专制,这算什么改革呢?“满洲党”的一句话,就能够把所有的努力都消灭光。这就是清末非逼出辛亥革命不可的原因。

马国川:对于辛亥革命,大陆学界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有的认为革命是偶然性,有的认为革命是必然的。按照您谈的观点,辛亥革命是必然的了?

余英时:“必然性”、“偶然性”这些观念都多少假定有历史规律,这一观点今天在西方史学界很少流行,至少我和我的史学友人都不太用这些提法了。我的意思只是说:因为越到后来满人越怕失去满洲政权,越对汉人不信任,于是激发了汉人的满人在清初屠杀的记忆,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等。“满洲党”不改革,就逼出一个辛亥革命来。在君主立宪派没有足够力量的情况下,只有革命。

## 革命和暴力是两回事

马国川:那么能不能说,满清是由革命党推翻的呢?

余英时:也不能说得太肯定。清末地方性变革很多,所以武昌一起义,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满清说垮也就垮了,于是民国成立。

事实上,民国转换并没有经过一个很严重的革命,绝不能跟法国大革命比。辛亥革命没有什么暴力,是社会成本很低的一场革命,结果也并不坏。早期的议会是相当认真的,很有效力。否则,宋教仁就不会被袁世凯暗杀了。所以几十年后的国民党时代,还有很多人怀念当年的议会。还有一点,辛亥革命前后,地方社会有很大进步。清末江苏、浙江一带新学校纷纷出现,都是地方乡绅们搞起来的,不是朝廷的贡献。

人民的自发性很重要的,如果没有自发性,社会根本不可能前进。只要地方的领袖有开明想法,老百姓支持,一步一步做,就会有许多进步。这些进步不是依靠政府发命令搞出来的。我们现在研究中国的问题,也要从这样的角度看,不能把注意力过分集中在集权体制上。

马国川:有人说,如果慈禧太后晚死十年,中国的宪政改革就可能成功了,这种说法有无道理呢?中国有无可能不经过革命的剧变,却经由立宪运动逐步演化为宪政体制?

余英时:这种观点我不大能接受,持这种观点的许多人有意无意地对旧体制有些迷恋。

马国川:其实,慈禧晚年也很清楚,一方面她在大张旗鼓地搞行政改革,另一方面又把权力聚拢到满洲贵族手里了。

余英时:因此,清末不可能不经过革命的剧变。旧体制某种程度解体以后,新的东西才能出现,但是并不一定是暴力革命。革命和暴力是两回事。当初,法国大革命的暴力最受中国大陆恭维,可是1989年法国大革命二百年纪念前夕,西方史学家,从欧洲大陆到英、美,都对它的暴力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指责。暴力导致法国直到今天政治还没有完全安定,而英国自从国王查理一世被推上断头台以后,再也没有别的暴力革命。美

国除了内战之外,后来也没有再发生流血革命。

马国川:英国、美国之所以能够避免暴力革命,是因为它们建立了民主体制。

余英时:民主政治与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循环完全不一样,历史上所有的王朝都由一家一姓把持,开始时得意得不得了,死也不放权力,最后非要给人逼到煤山上吊不可,临死前只有哀叹,希望子子孙孙不要生在帝王家!各个王朝寿命长短不一,总是要经过流血改朝换代,再流血再改朝换代,永远在封闭的系统里循环,以万千生民的鲜血作为润滑剂,没有政治文明可言。

在国民党时代,左派人士骂国民党不搞民主,有个对联写得很好:江山是老子打来,谁让你开口民主,闭口民主;天下由本党坐定,且看我一枪杀人,两枪杀人。好对联啊,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

## “中国人思想上的一个大敌”

马国川:辛亥革命后中国陷入长期的军阀混战,有些人据此对辛亥革命提出了批评,如果当初不把秩序破坏掉的话,就不会有后来的混乱局面。虽然辛亥革命本身是一个代价不高、成本不高的社会革命,但是打开了一个闸门,从此以后洪水滔天了。您怎么评价这些观点?

余英时:用暴力推翻另一个秩序,这是我最反对的。因为暴力革命以后,一定用暴力维持,否则自己就要垮台。

辛亥革命不是靠暴力起家的。武昌起义不久,各地宣布独立了,慈禧太后已先死了,权威没有了,一个三岁小皇帝有什么本领呢?所以,满清是自然解体的。我们把这个解体叫做“辛亥革命”。“革命”是从日本人那里借来的名词,它与中国历史上的“革命”不是一回事。后者所谓的“命”是天命,“革命”就是天命的变革,就是改朝换代。

满洲垮掉以后,袁世凯当国,这个人自私,但也相当负责任。他死得很早,北洋没有了权威人物,于是进入了军阀割据的混乱时期。

马国川:北洋军阀走马灯似的轮流上台,整个政治局面相当混乱。

余英时:混乱时期也有好处,在这个混乱时期才会有“五四运动”出现。如果有强人控制场面,“五四运动”就不可能发生了,许多新思想也就进不来了。这是历史的吊诡,军阀本身自然是负面的东西,但军阀时代却为思想学术的自由创造了条件。因为军阀各自为政,不管老百姓,言论反而自由。而且军阀脑筋简单,没有深文周纳的心思,对意识形态没有那么密切关注。

那个时期,从政治上看一塌糊涂,但是从社会或者文化方面看,不一定全是负面的,许多新东西就是在那个阶段出现的。北京大学不就是在那时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学吗?另外,因为当权的军阀也管不了各地方,一些地方绅士、地方领袖在地方上做革新工作。所以,不要简单地把历史简化,好像北洋政府一塌糊涂,整个中国都在往后退,事实并不如此简单。

马国川:其实中国地方社会还是在不断地进步的。

余英时:在国共合作革命以前,地方社会发展了十几年。我们要相信,一般老百姓在为生活奋斗的过程中,自然就改进了社会。政府不可靠,人们就要自立。

总之,我不认为辛亥革命后中国如何混乱,也不必怕混乱。有些关心中国前途的朋友们提倡“告别革命”,就是怕再有混乱。

马国川:有一次我去看望周有光先生,周先生说革命没什么可怕的,中国当然需要革命。他说的革命并不是暴力革命。我觉得“告别革命”这个说法里,对“革命”的理解似乎有些狭隘,似乎革命都是暴力流血的。

余英时:“革命”确有种种不同的意义。如指“暴力革命”而言,我也赞成“告别革命”。但若指从下面民间发出群体抗争,要求合理变革,而不使用暴力,则我们反而应该赞同这种革命,否则大家都乖乖不动,不敢冒犯权威,造成混乱,那便是让不讲理的统治者永远主宰老百姓的命运了。而混乱和秩序都是相对的,即无绝对的秩序,也无绝对的混乱。数学上有一个重要分支叫“混沌理论”。混乱没有什么可怕的,可怕的是暴力革命乱杀人。我当然不是提倡混乱,而是认为混乱必须保持在最低限度,若用暴力维持不合理的秩序,反而会招致最大的混乱。

马国川：怕混乱，怕不稳定的思想，似乎和中国古代“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的思想有联系。二者的逻辑很相近的：宁肯做一个没有什么个人自由、但是生活平稳的奴才，也比混乱的状态里边做一个自由的、有权利的人好。

余英时：是啊，这种逻辑要打破。许多情况之下，到了某种时候是有混乱，在美国我就看过很多混乱。我初到美国，黑人地位根本不能跟现在比。现在黑人都做总统了，中间经过多少混乱，最终厘清了道路。

马国川：从北洋军阀到后来又变成了国民党的党国体制，这里面是不是也有一个内在逻辑？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呢？

余英时：这牵涉到国际形势，中国走到这一步，日本侵略是最大的关键。日本在二、三十年代完全控制在军国主义者中下级军官手上，骄横已极，自信可以用武力称霸亚洲，中国成为他们的吞并目的所在。日本侵略，民族存亡之秋，需要依靠强有力的政党凝聚力量，一致对外，所以国民党在抗战时期的口号是“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大家都要拥护党，于是培养出一个党国体制。

从某种意义上，1923年“改组”后的国民党也是从苏联来的。孙中山急于成功，无法很快拿到政权，就学苏联的方式，然后把集权的党组织建立起来，党高于一切。

我的政治记忆从1936年西安事变和次年抗日战争开始，我上过一二年的临时中学，对国民党坚持的“党化教育”印象很深。

历史上有什么王朝可以是永远维持的？中国最长命的朝代是周朝，八百年，中间好几百年还是战争状态。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在重庆豪言壮语地声称，周朝八百年，我们国民党六百年总该有吧？！并不是所有人都相信，但是有一部分人是相信的。可是，没到两年就完了。“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前车之鉴，清末是一个很好的历史教训。

马国川：在您看来，中国应该从辛亥革命中吸取哪些教训？

余英时：实质问题是，中国在现代化路上前进了多远？比如，日本变革那么大，虽然仍保持着天皇制度，但真正实现了君主立宪。中国虽然搞

了民国,但是没有实现宪政。二战后,日本在美国压力下实行了民主选举,重写了新宪法,军国主义大体上不是亚洲和平的威胁了。多数日本知识界的人(就我认识的来说)是爱好和平的。几年前大江健三郎在普林斯顿大学访问,他便是反对原子弹的先锋,给我印象很深。

马国川:现在一些人相信,只要有了钱,就可以打造一个大国,现在“大国崛起”的声浪很高哩。

余英时:我承认,现在大陆的经济实力在增强。但是,是不是一个文明大国,要比文化,要比艺术,要比科学,比人文研究。并不是有钱了,就能够成为现代国家。腰缠万贯的暴发户并不等于有教养、使人起敬的社会精英。

## 所谓普世价值,中国古已有之

马国川:与宣扬“中国模式”相呼应,一些人极力反对“普世价值”,指责普世价值是西方的价值。

余英时:所谓普世价值,如人权、自由之类中国古已有之,只是没有西方所流行的这些名词罢了。比如,孟子讲“明君制民之产”,就是讲政府对人民应尽的义务,反过来说也就是人民的基本权利,其中不只包括田产权、工作权,也包括教育权(为“庠序之教”)等。“民主”虽然不是中国名词,但是要给老百姓权利,以老百姓为主体,这种观念早就有,否则《尚书·泰誓》怎么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呢。“天”比皇帝更大更高,而“天”是代表老百姓的。所以,民主其实人人心里都有、都向往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一种民主态度。人权的核心观念是每一个人的尊严,能自己做主,这在儒、道两家文本中都可找到。清末以来,许多学者,包括孙中山在内,都已做了不少努力,要在中国传统中找普世价值。胡适去美国演讲(四十年代),也强调中国的“民主”虽未发展成功,却具有一些重要的“历史基础”。

不能说,西方才是文明的主流,普世价值就是西方的。中国也有普世价值,应该把自己文化传统里的普世价值好好进行整理。不但中国有,印

度也早有自由、平等之类的“普世价值”，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已有文章指出。

马国川：普世价值的观念在中国遭过了很大的曲解。

余英时：曲解后就被人利用，西方的东西我们要不要？偶尔有说“民主是个好东西”就不得了了，那都是废话嘛。如果不承认“民主是个好东西”的话，共和国也不是好东西了。那还是回到皇帝制度吧，回得去吗？

中国人一直讲，搞政治要靠民心，如果得不到民心就完了。

马国川：能不能说，在现代社会所谓“民心”，某种意义上也就是普世价值？

余英时：是普世价值。每个人生下来都要自己做主，都有自己选择的权利。这就是所谓自由。佛经上到处都是自由、平等。权利和义务是相对的，不能说只有义务没有权利。中国语言是从义务方面着眼，不强调应该得到什么。强调我应该做的，对别人来说就是权利。两种不同的语言。讲的是同一个事实。

动辄反西方，完全对历史不了解，而且封闭历史、曲解历史，这样下去，中国哪能变成大国呢？

马国川：看来，您对未来是悲观的。

余英时：短期，我有点悲观；长期，我是乐观的。

马国川：清末以来，中国的民族主义开始出现，辛亥革命以后民族主义愈益发展。近年以来，民族主义思潮又兴起。在权威消失、社会解体的过程中，会不会出现一些人利用民族主义，走上二战前日本或德国的道路呢？

余英时：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民族主义的激情很容易煽动起来，义和团便是前车之鉴。现在搞民族主义，就是要转移视线，把国内矛盾转移到外面去。那就可能造成世界大战，不是暴力革命的问题了。民族主义是一个双刃剑，最后也可以伤到始作俑者。

我对现实不抱太多的幻想。但是我相信，中国有这样悠久的文明传统，中国社会里总有一些精神力量是会发挥作用的。必须有社会空间、文



化空间,政治无法完全干预。文革时代大概是彻头彻尾的控制和操纵,现在有人想重新搞“文革”那一套,我相信是绝对做不到的,对一般老百姓不会有影响的。

对中国未来不必那么悲观,十几亿人,每个人总有一些小空间做自己的事情。千万不要心灰意冷,还要继续向前,各尽本分。现在社会文化各方面可以改进的地方太多了,也有许多空间还可以做事。

## 重建价值观念

马国川:辛亥革命以来,甚至是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直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摸索前进。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的文化传统如何确立自己的现代身份?这是您多年研究的一个问题,也是许多人关注的一个问题。

余英时:中国文化传统里许多价值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的,但是不可能作为将来中国的指导原则,也不可能成为新的意识形态。

现代社会有公领域和私领域。在公领域,只有实行民主选举、司法公正等现代制度。私领域就是个人道德、人和人之间关系,儒家思想可以发挥作用。儒家本身不能直接变成宪法,只能是社会上的一种文化力量,用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的问题。西方主要是靠宗教,如果把儒释道三教都丢掉了,中国的精神领域便未免太贫乏了。

马国川:现在中国社会一方面没有宗教信仰,另一方面儒家的东西被破坏殆尽。

余英时:尤其是1949年以来,一方面把中国文化传统当作封建毒素来批判和咒骂,另一方面把西方文明批评为资产阶级的遮羞布而痛斥之。结果把所有文明都搞光了,最后所推崇的就是阶级斗争之类的暴力。

在现代社会重新建立价值观念,只能由普通人民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培养出来,决不能靠政治力量从上而下强迫灌输。中国人要培养一些价值,这些价值在中国既有底子,又跟其他文明价值可以配合。这就是我们文化界、学术界、艺术界所当共同建设、共同努力的方向。

马国川:中国文化传统里面是有资源可以利用的。

余英时：从儒、释、道到民间文化中都有许多精神资源可以提炼出来和现代生活互相配搭。有些价值虽受反传统潮流的冲击，仍潜在于人心中，可以召唤回来。关于怎么样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如何处理好天理人情，这是中国很特殊的地方，文化传统也可以解决实际问题。学术上、思想上、文化上、日常生活中的价值层面，儒家有些价值可以复活。不过，“三纲五常”已决不可能恢复了。现在一些人提倡把儒家作为一个替代性的意识形态，高扬民族主义，若如此，则是把中国传统又糟蹋一次，在老“孔家店”完了以后再造新“孔家店”，这是一个很不智的事情。

要把私领域跟公领域区分开。公领域不可能由儒家来挂帅。因为除了伊斯兰教，现在任何国家都不允许任何一家教义或学术在宪法内占主要位置。大家可以有各种信仰，不同信仰自由都可以在宪法内得到保证。

马国川：您说过，中国有没有前途，要看它如何选择价值、理解世界。请问，中国应该选择什么价值，如何理解世界？

余英时：我没有资格建议应选什么价值。我只能提一个原则，即所选价值是开放性、多数文明社会都能接受的。开放心灵尤其重要，想理解世界决不能固步自封，以自己为中心。

马国川：您还说，“一旦中国文化回归到主流之‘道’，中国对抗西方的大问题也将终结”。您所谓的主流之“道”是什么？中国文化如何与西方核心价值兼容？

余英时：我所谓“文明主流”，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普世性文明。我从不认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是对立的、互不相容的。所谓“道”便是重视“人”的道，群体和个人都同时能得到“人”的待遇。只要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胸襟，中西文化自然而然能包容彼此的核心价值。

采访时间：2011年6月22日夜

采访地点：北京—普林斯顿（电话采访）



## 告别悲情意识，寻找中国位置

## 刘香成

美籍华人，著名摄影家。1951年生于香港，童年长于福州，上世纪70年代赴美读大学。毕业后在《生活》实习。曾任美联社记者，《时代》周刊驻华首席摄影师。时代华纳集团中国首席代表，新闻集团常务副总裁，现为国内一家著名媒体公司的独立董事。因出色报道苏联解体共享1991年美国外国新闻学会最佳报道奖，1992年获普利策现场新闻摄影奖。出版《苏联的解体》、《中国：一个国家的肖像》、《上海：一座伟大城市的肖像》等摄影集。2004年《巴黎摄影》评刘为世界九十九位最有影响力的摄影师之一。

## 采访手记

一百多年前的历史迎面走来：深入中国农村的传教士、围观砍头的看客、初入北京的义和团、北洋新军在操练、孙中山就任大总统、街头剪辫子……

在位于景山公园旁边的一个优雅的四合院里，刘香成在电脑前为我解释一张张照片的内容和来历。他对历史之熟稔，让我感到吃惊。

三十五年前，当时仅有二十五岁的刘香成来到中国，担任《时代》周刊驻华首席摄影师。诚如一百零六岁的文化老人周有光所说，“人类的历史，可以用语言的声音记录，可以用文件的笔画记录，又可以用摄影的镜头记录”。刘香成就用摄影的镜头记录了一个时代。他为毛泽东之后的中国留下了无数照片，其中许多幅照片在今天已经成为经典。

1983年，刘香成告别中国，走向其他的热点地区，他手里的相机记录过众多的“大事件”：在印度，甘地夫人遇刺，种族纷争频仍；在斯里兰卡，宗教战争火焰熊熊；在阿富汗，到处都是苏制坦克、大炮，他差点被火箭筒轰掉。

1990年，刘香成被美联社派驻莫斯科。一年之后，他在克里姆林宫按下了快门，戈尔巴乔夫宣告苏联终止的历史瞬间被永远地定格在他的镜头里。

周有光先生说，刘香成先生的“苏联最后一秒钟”，是“最最使人震惊的摄影记录”。他在为刘香成的《苏联解体：一个帝国的坠落》（后浪出版咨询公司2011年11月即将出版）所写的序言里，盛赞刘香成是一位“摄影历史学家”，“是摄影历史学的‘全球状元’”。

从去年开始，这位“摄影历史学家”又走遍世界，搜寻有关中国的老照片，编辑了历史摄影集《壹玖壹壹》。“我要用照片重新拼贴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的历史图景”，刘香成说，“因为用文字书写的历史过于概念化，

而照片书写的历史真实而生动”。

“我的研究从一次长途旅行开始:跨越中国大陆和台湾,横穿欧洲和美洲,遍访各地的公共展馆和私人藏品”,刘香成在书的序言里说,“从东京到悉尼,从伦敦到巴黎,从洛杉矶到纽约,我看到了数目庞大的原始影像,被珍藏了一个多世纪。”

对于这些历史影像,刘香成既熟悉又陌生。作为一个美籍华人,刘香成对中国历史并不陌生。他的童年时代在母亲的老家福州度过,直到70年代才远渡重洋到美国。他所受到的历史教育和今天大陆的学生没有什么两样,辛亥革命前后的一百年就是一部屈辱史。

不过,这位走遍了世界的摄影家,对于历史已经有了新的认识和感悟。他引用研究中国当代艺术的英国评论家凯伦·史密斯(Karen J. Smith)的话说:“至今一百七十多年里数代的中国人乃至当代不少中国人都确信,从十九世纪开始帝国主义入侵者带来的屈辱使他们蒙羞。这是需要纠正的。”

在刘香成看来,正在崛起的中国需要摆脱“受害者”的历史悲情,以理性、开放、宽容的健康心态面对历史,面对世界。



## “告别口号”更重要

马国川：你是一位摄影家，为什么会发生在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感兴趣呢？

刘香成：辛亥革命前后的一百年，是所有中国人的记忆之痛。在去美国读大学之前，我接受的历史教育和大陆同龄人没有什么不同。对于所有中国人来说，“百年沧桑”是共同的记忆。

不过，时过境迁，“百年沧桑”已经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现在的年轻人对它没有了生动的记忆。我编辑这本书，就相当于把散落在世界的历史碎片收集在一起，形成我们的共同记忆。

我希望通过这一系列的图片，把中国人的“百年沧桑”具体化、具像化。好的图片本身有一种生命，它能够与观看者产生情感的交流，从而帮助读者对“百年沧桑”有更深刻、更切身的认识。再说百年沧桑的时候，可以有一个很客观的东西呈现在那里，而不是变成一种口号，口号是很危险的。

马国川：我是1971年出生的，我觉得我们这代人，包括现在的年轻人，所受的教育都是口号式的，对历史的记忆其实是非常抽象的，干瘪枯燥，没有活力。

刘香成：现在有些学者呼吁“告别革命”，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告别口号”更重要。口号似乎是新中国的一个特点。历史一旦变成口号，就变成了很粗糙的、不客观的东西。

摄影是从欧洲开始的，图片作为一种语言来表述历史事件，在欧洲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在中国，摄影作为一种语言，人们的认识还是比较欠缺的。我走遍世界搜寻有关中国近代史的照片，深感这个工作很有意义。

首先你要带着一个摄影师的语言去阅读每一张照片。编辑的时候尽量介绍日常的生活、民生的状况和事件,把一百年的历史背景尽可能完整地呈现出来。我希望这本影像集可以用看得见的方式,为研究现代中国史的历史学家所提出的观点作一点补充。

现在这种把事情简单化的教育,是很糟糕的。历史是什么样的,应该请读者自己去判断,自己去思考。今天来看是一种感觉,再过五十年或者一百年,可能后人又是一种新的认识,但是图像没有改变,只是观察者变化了,视角变化了。历史永远可以有新的解读。因为对历史的解读里,浸染着对现实和未来的思考。而且我们要相信,后人有能力来思考,来判断。

### “中国人受伤的感情至今仍然脆弱”

马国川:除了“百年沧桑”,“百年耻辱”也是中国人共同的记忆。提起近代史,中国人心头总是萦绕着挥之不去的耻辱感。

刘香成:是的,据我观察,中国人至今仍然在所谓“百年耻辱”里,难以挣脱。基辛格在最近出版的《论中国》(*On China*)一书里说,在中国寻求与外界沟通的过程中,很多中国当代自由派国际主义者仍然认为西方严重亏待中国。虽然中国正从曾经的劫掠中重生,但是今后中国跟世界怎么来往,这个起点不会放。

1919年的“五四运动”抗议强加于中国的“西方帝国主义”,这场运动标志着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诞生,代表着对晚清时期外国人半殖民式在华存在的心态。

马国川: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绵延数千年,其间北方的蒙古人和东北的满人曾侵入中原,但几乎未引起屈辱或帝国主义的概念。事实恰恰相反,倒是儒家学说和汉语最终将非汉族的入侵者同化进“本土”文化。因此,元朝和清朝毫无疑问地被认作是中国的王朝。

刘香成:可是,自“五四运动”以来,“屈辱”和“帝国主义”这两个词屡见不鲜,常常同时出现,因此为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所熟知。

时至今日,中国对一切与中国主权有关的问题都充满了感情色彩:北京成功举办2008年夏季奥运会之前,发生在澳大利亚和法国火炬接力中的抢夺火炬事件激怒了中国的年轻人。一个名叫“Fang KC”的博主在网上检索了《人民日报》电子版,发现1946至2006年有十九个国家或组织被批评“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总计达一百一十五次。就像《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所说,“屈辱是人类情感中最具威力的,雪耻次之……”

马国川:尤其是年轻人,很容易激动起来,进而采取非理性的行动。

刘香成:年轻人不知道自己的历史,国家对历史也没有做一个很好的交代。

马国川: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性叙述和解读,这对年轻人造成了伤害。一些年轻人对历史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另外一些年轻人思想则被束缚在几十年一贯制的口号式的历史教育中,在和世界交往中总是充满狐疑,以“阴谋论”的眼光看待世界。

刘香成: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现在中国人也有一定的自信心,但是如果对历史的清醒认识,背负着沉重的屈辱感,年轻人就很容易采取非理性的举动,今天跟法国人吵,明天跟日本人吵,还要跟美国人吵。

中国人受伤的感情至今仍然脆弱。不然的话,为什么有些人会花几千万把圆明园的兽头买回来,然后摆在那里让大家参观,似乎这样就一雪前耻了。这些举动仿佛在告诉世人:我现在有钱了,我可以做这个事情。

现在还有那么多的文物在国外,怎么办呢?能够都买回来吗?甚至有人参与竞拍,拍到手了却拒绝付款。这种没有诚信的搅局做法,怎么能够获得别人的认同和尊重呢?

### “在中国,书写历史是既复杂又敏感的事”

刘香成:现在对历史应该有个新的态度,不需要再以那种非常强势的受害者的立场去看历史。



马国川:以客观冷静的态度去对待历史,就要原汁原味地记录历史。

刘香成:人们如何感知历史取决于历史如何写成。研究中国当代艺术的英国评论家凯伦·史密斯最近援引马克·吐温的话,她在回答“为什么我们这么厌恶过去”时说道,“因为它太让我们丢脸了”。史密斯继续说道,“如果历史像马克·吐温说得那样使人蒙羞,也是因为我们相信如此。同样,至今一百七十多年里数代的中国人乃至当代不少中国人都确信,从十九世纪开始帝国主义入侵者带来的屈辱使他们蒙羞。这是需要纠正的”。

在中国,书写历史是既复杂又敏感的事。2011年初,据《南方周末》报道,中央党史研究室连续四任主任历时十六年才重修完成1949至1978年的历史。由于这部书并没有提及诸如1960至1962年大饥荒的确切死亡人数这样的问题,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在北京英国驻华大使馆中,仍然保存着自十九世纪起中英两国接触的版画。也还挂有当年英国第一任驻华大使马噶尔尼勋爵在大清帝国宫廷上立而不跪的历史的版画,位于汇丰银行香港总部四十四层董事长私人餐厅的墙上,但是,1997年香港主权交还中国之后,墙上取而代之以昂贵的中国当代艺术作品,歌颂中国经济的崛起。

马国川:当初乾隆接见英国使团时骄傲地说,大清国万物皆备,不需要跟你们通商。

刘香成:在此之前,西方认为中国是一个制度先进的国家,但是中西有了接触以后,尤其鸦片战争开始之前,西方人就已经开始转变了对中国的认识。例如,这时候欧洲的物质文明已经很发达,有了公共厕所,可是欧洲人在中国看到,中国人随地大小便,当然会觉得不文明。早期对中国的美好想象开始破灭。

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也有一个转变。早期中国人看到的是意大利、葡萄牙来的人,如利玛窦等人,头发比较黑,这些人很文明,都会说中文、写中文,还会学习中医等等。到了十八世纪,来到澳门、广州通商的,都是红头发、蓝眼睛、白皮肤的洋人,不会中文,中国人认为他们是野人。

马国川: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不断被欺凌,这也是中国人转变对西方

认识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受害者”的悲情意识仍然深藏在中国人心中。

刘香成:悲情在英文字里面叫“受害者”。到底是用理性来看待历史,还是以情感来看待历史?如果是后者,那么永远也摆脱不了悲情意识。一定要从“受害者”里跳出来,你已经不是受害者了,这样你才能以平和的、平等的态度和别人进行交流。

马国川:在鸦片战争之后,尤其是甲午海战之后,中国因为受了屈辱,激发了民族主义的思想情感,这是一百年来一个很重要的思想资源。在中国经济实力达到了这么一个程度的今天,怎么来摆正这种心态,怎么来对待民族主义?

刘香成:民族主义这条线,一直延伸到今天的中国社会。

我觉得,这是中国的包袱。对今天的中国来说,要做的是把这个包袱放下来,带着平和、平等理念与世界交往。不管和哪国人交往,英国人、法国人、日本人,不要有很多个人的感情绑在里面,而是就事论事,不要让情感影响自己的认识和判断。

## 今天中国的位置在哪里?

刘香成:当年我来到中国,正值毛泽东去世,我感到中国人对很多的事情有兴趣,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和向往。那时我就认定,如果有机会来中国工作的话,我已经找到了我的主题。

马国川:我觉得,和那个时代比起来,今天中国可能显得比较迷茫,并不清楚自己要得到什么东西。这似乎和对近代史的认识有关。近代以来,中国确实有文明落后野蛮的一面,也有被欺压、被侵略的一面,悲情意识对今天中国在世界上的角色定位也有很大影响。

刘香成:今天中国的位置在哪里?还是用那种悲情意识去衡量吗?显然不能。

我记得九十年代著名导演谢晋导演了一部电影《鸦片战争》,开播首映请我去,不到五分钟,我站起来就跑掉了。因为电影是用一个很粗糙的

导演语言去拍摄的,里面一肚子受害者的怨气。

把事情简单化的做法是很糟糕的。现在一些人潜在的认识就是,软实力是可以用钱买的,我们中国有这样的能力了。你们西方花了三百年才拥有的东西,我们可以马上买到。在海外花大钱建立新闻社、搞电视,这还是计划经济的思维。

我们的英文媒体,也包括中文媒体要先抓住来华的几十万外国读者的眼球,为什么他们对中国最感兴趣我们都抓不住,还要到国外发展,这逻辑很难想象。

例如,中国电影作为一个文化产业,近些年发展迅速。但是和好莱坞相比,还是距离很大,不可同日而语。好莱坞的人来到中国说,你们什么都有,但是你们不知道怎么编剧,怎么说故事。当然事情往往比这更复杂。

马国川:您的这个认识还是非常深刻的,因为在今天确实是存在这样的问题,觉得我腰包有钱了,一切都会呼之即来。

刘香成: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以后,从硬实力提升到软实力,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文化不能强制别人接受,而要感染别人。

我注意到,但是近年来中国有争论,有一些人认为中国是独特的,强调“中国特殊论”,反对普世价值。所谓“普世价值”并不是要排除文化的区别,普世的含义是说,大家有一些共同的价值,这些价值里面同时也包容各种不同文化存在的差异。首先要承认有共同的东西,否则,为什么中国重返联合国的时候那么高兴?

马国川:公元1793年,乾隆接见英国使团时骄傲地说,大清国万物皆备,不需要跟你们通商。二百零八年后,中国也加入了WTO,承认了西方国家制定的商业游戏规则,当时也是举国狂欢。

刘香成: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加入WTO的重要意义会越来越凸显。WTO的游戏规则是全世界性的。中国加入WTO,就意味着认同这种世界性的规则,认同一种普世价值。北京举办奥运会,提出“同一个地球,同一个梦想”,不也是承认普世价值吗?

我不否认,中国的文化有独特性。中国人的务实精神是在日常生活

里长时间锻炼出来的。但是我经常说,中国和西方的共同之处,远远超过差异。中国和西方普世的共同点,多于分歧。不能使用双重标准:当我高兴的时候我的东西就是普世的,当我不高兴的时候我的东西就是独特的,你就要尊重我。这不是一种健康的心态吧。高速发展的中国,还是一个不成熟的社会。

日本没有到处宣扬文化的独特性,可是日本文化的独特性比中国更强。不过,这并不妨碍日本向西方学习一切先进经验,甚至日本战后宪法也是在美国人监督之下写出来的。对于中国来说,这实在是不可思议啊。

马国川:中国遭遇鸦片战争是1840年,美国的“黑船”来到日本是在1853年,日本在1863年就开始明治维新,而中国迟迟不改革,1898年的戊戌变法也被残酷镇压了。

刘香成:日本在发展过程里面改良再改良,一步一步成为一个现代国家。日本人有一种彻底的精神,我不行,我失败了,我就承认,然后我就认真地学习,甚至美国强加给的民主体制也完全接受。结果运作非常好,至少在今天的东亚,日本的民主体制应该说很不错的。

马国川:和日本的改良道路不同,中国选择的是革命的道路。不过,对于辛亥革命,人们有很大的分歧,有的人认为辛亥很好,有人认为很坏,坏在哪里?因为搞了革命以后,不断革命,错过了改革的机会。但是反对者说,还是要革命,不革命没有别的出路。

刘香成:其实,中国文化里有很多东西是唯心的。中国文化追求道德上的最高境界,如果这个东西不灵了,就换一个朝代。而西方注重的是理性的经济建设、逐步改良。

我在韩国汉城也待过,他们没有革命,而是从强人政权改过来的。今天经济不也是好好的吗?

## 最后的改革其实是媒体改革

马国川:您现在生活在中国,如果拉长历史镜头,从一百年的历史来

看,您觉得中国社会有哪些进步最值得关注?

刘香成:《华盛顿邮报》前驻京记者潘公凯离任后写了一本书,他说中国人现在的生活是五千年以来最幸福的生活,但只是从物质生活来说。我同意他的观点,物质生活是一个指标,但不是唯一的指标。

历史可以往后看,不能够往前看。以韦伯的理论来说,现在中国执政党是有合法性的,因为业绩在那里。这是一种“绩效合法性”。但是,恐怕没有人敢否认,现在中国的制度是不完善的。权力仍然占据社会的最高位置。一个很优秀的人才能去文化部当一个处长就觉得无比荣幸。可是,美国人最好的人才不会去文化部当一个处长,美国也根本不存在文化部。

中国按照现在的路走下去,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一定要改革。中国人最怕的就是乱,为什么中国人自己相信会乱? 如果不怕乱的话,就会让人家改革,至少改革阻力会少一些,改革速度会快一点。

马国川:那么在您看来,中国最重要的改革应该是什么?

刘香成:是媒体的改革。中国没有一个很成熟的平台,可以理性地把话说透,能够做到信息多元化也不容易。中国需要越来越多的成熟媒体。在媒体平台上,大家可以理性平和地讨论事情,而不是通过这个平台再去教育别人。如果以教育群众的姿态面对读者,读者也不会买你的账。

马国川:“作之君,作之师”这似乎也是中国的传统呢。毛泽东最大的愿望是当老师,当然,他不是当一个学校的老师,而是要做全国人民的教师。

刘香成:随着公民社会的发育成熟,政府要慢慢从这里退出,或者在这个基础上进步,进步其实就是要退出。

《纽约时报》是不完美的,《华盛顿邮报》也不完美。但是在美国社会里面有无数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能够容纳无数的不同声音,因此美国的软实力就上来了。

马国川:就是当所有的声音都能够有机会呈现的时候,一个国家才是

成熟的国家。

刘香成：一个现代国家，一定要有多种声音。当然，在美国政治上不准确的思想和舆论很难进入很主流的媒体，但是你不去看《纽约时报》，你在别的地方可以看到这些舆论，是不是？区别就是这么一点点。

所以，我一直说，最后的改革，其实是媒体改革。但，媒体的改革很难。

马国川：怎么去改革呢？

刘香成：道路肯定要中国人自己去选择。所以有时候我特别矛盾，因为知道现实非常复杂。如果一定要找共识的话，至少一个共识是没问题的。不管现实有多大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绝对不是集中权力的理由。不能说现实太复杂了，要把权力更集中在我手里，才能干好。

马国川：其实普世价值争论到最后，“独特论”变成“中国模式”，声称中国这一套好，好像在世界上都有普遍意义。

刘香成：这又走偏了。你现在还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那中级、长期的目标肯定要民主。有些中国人特别喜欢这个，要过瘾就过瘾，不要让这种东西绝对化。

马国川：当年你到中国来的时候，中国还是一个农业社会。三十多年过去，中国现在基本已经是一个工商社会，这种社会形态的变化可能意味着，中国社会的体制变革可能出现新的形态，可能从以暴制暴的权力更替，转变成为和平的社会转型。可是另一方面，悲观情绪似乎在中国社会蔓延。

刘香成：我不知道。我觉得我们从事新闻工作的，有机会去观察世界，观察而不要下结论。在观察过程肯定会有一些结论，但这些结论也是暂时性的。

最近一个人写文章说我既是中国人，又是美国人，写得比较深刻。我在一个很痛苦的位置上。这样看也不行，那样看也不行，跟我所认识的客观现实都有差距。

1981年我去台湾，官方安排我去金门采访，金门军区司令请客吃饭，

我说我感到很亲切,因为人们的肢体语言、气氛让我感觉像在人民大会堂。一模一样的沙发,大陆喝茅台,你们喝“高粱”。整整三十年后,今天的台湾不是也实行了平稳的民主转型吗?

总起来说,对于中国的未来,我愿意把自己放在乐观的一边。

采访时间:2011年6月25日、30日

采访地点:北京 景山西街 大石作胡同



我要用照片  
重新拼贴辛亥革  
命前后中国的历  
史图景，因为用  
文字书写的历史  
过于概念化，而  
照片书写的历史  
真实而生动。

——刘香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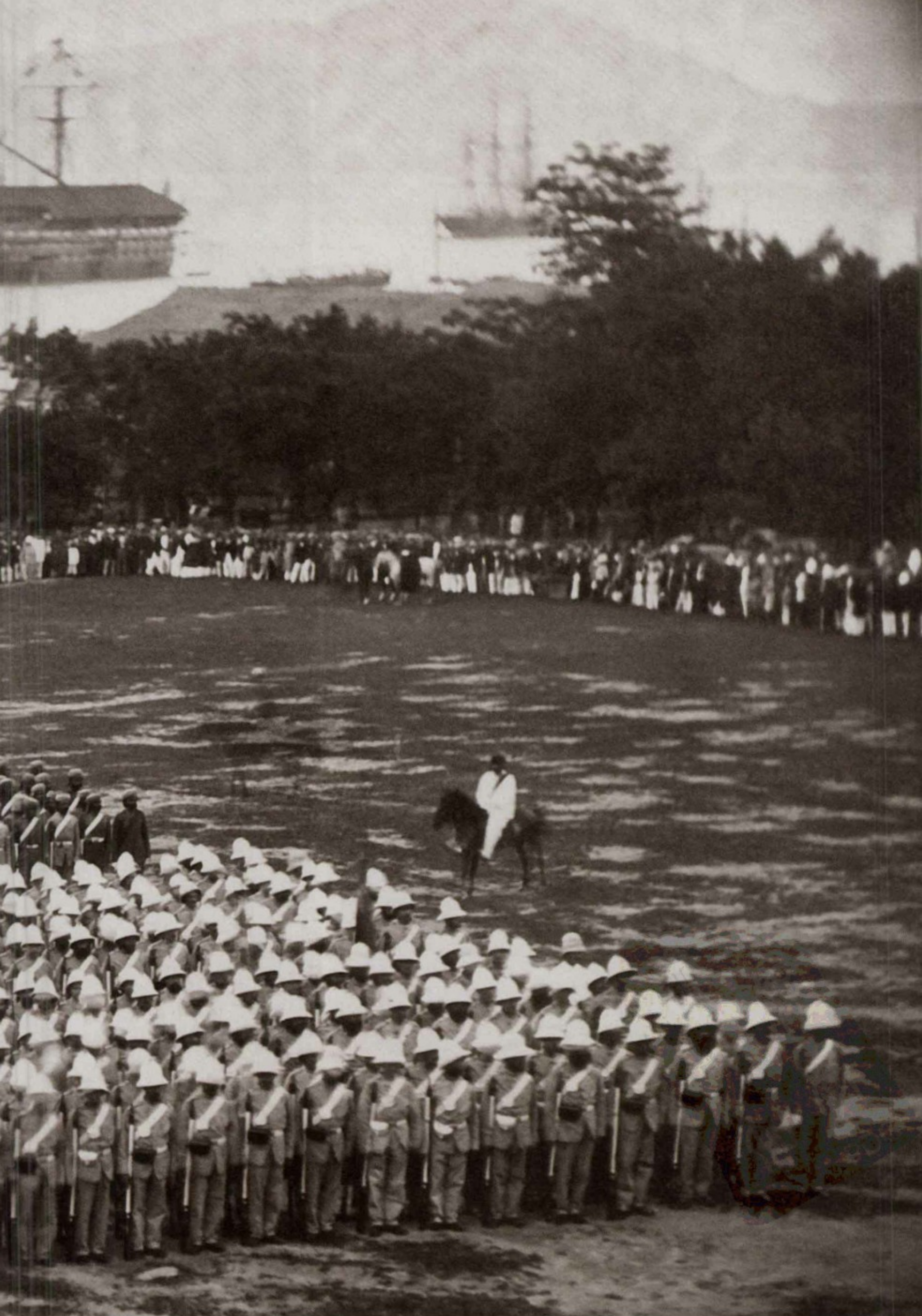
# 通往一九一一年 的动荡之路： 一部看得见的历史

刘香成

如果说这些照片仅仅是外国人用有色眼镜将中国人视为『异国情调』的证据，则失之简单。它们铭刻着中华民族对历史的集体记忆，让人洞见前人文学作品或集体话语中抽象表述的『百年屈辱』。有关这个话题的论著非常多，本书则用摄影来全面『视觉』描述，努力成为最完美的一部摄影史。

我着手用影像为辛亥革命做编年史，心中不免惴惴。今年是2011年，武昌起义一百周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亚洲第一个共和国随之建立。起义赶走了清朝统治者，但新生的中华民国仍聚居着不同国籍的人，这种状况又持续了好些年。因此，我的研究从一次长途旅行开始：跨越中国大陆和台湾，横穿欧洲和美洲，遍访各地的公共展馆和私人藏品。从东京到悉尼，从伦敦到巴黎，从洛杉矶到纽约，我看到了数目庞大的原始影像，被珍藏了一个多世纪。





清朝官员夫妇，广东，1860—1862年

弥尔顿·米勒 (Milton M. Miller) ,  
英国伦敦皇家亚洲学会 (Royal Asiatic Society, London, UK)

夏日的运水工与小型运水车，北京，1861年

后面的房子为水井所在处，北京俗称“水窝子”。

佚名，伦敦传道会 / 世界传道会档案馆，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 Archives SOAS, London, UK)







《辛丑条约》签字现场，北京，1901年9月7日

德、英、法、俄、美、日、意、奥、荷、西、比十一国公使和清政府代表在西班牙使馆内签署了《辛丑条约》。照片中围桌而坐者，从左至右分别为荷兰公使克罗伯（F. M. Knobel）、日本公使小村寿太郎、意大利公使萨尔瓦多·拉吉（Marquis J. Salvo Reggi）、比利时公使姚士登（M. N. Joostens）、奥匈帝国公使齐干（Baron M.



1. 休战旗下，1900年
2. 天安门前阅兵的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1900年
3. 礼兵行欢迎礼，迎庆亲王奕劻签订《辛丑条约》，1901年
4. 法国礼兵恭迎庆亲王奕劻，1901年
5. 条约签订后，返程中，1901年

佚名，澳大利亚堪培拉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Canberra, Australia）

“中国的外交，从巴黎和会以来，我经手的就很多。所犯的毛病，就是大家乱要价钱，不愿意吃明亏，结果吃暗亏；不愿意吃小亏，结果吃大亏。”

顾维钧（1888—1985），中国外交家



C. De Wallton）、西班牙公使葛络干（Don B. J. de Cologan）、俄国公使格尔斯（M. De Giers）、德国公使穆莫（Dr. Von Mumm）、英国公使萨道义（Sir E. Satow）、美国公使柔克义（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法国公使鲍渥（Paul Beau）、联芳、李鸿章、庆亲王奕劻。

佚名，澳大利亚堪培拉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Canberra, Australia）









1



2





3

4

### 革命军在襄河旁守卫，1911年

11月5日，冯国璋下令攻打汉阳，集结5000人，强渡襄河。由黄兴指挥的革命军第一线以机关枪扫射，清军死伤枕藉。施塔福（Francis Eugene Stafford），上海市历史博物馆

### 1. 荫昌与官兵，孝感，1911年10月

佚名，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伦敦传道会 / 世界传道会档案馆（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 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 Archives SOAS, London, UK）

### 2. 在屋顶观战的日本领事馆人员，汉口，1911年10月31日

佚名，秦风老照片馆

### 3. 战火中的村落，1911年

丁乐梅（Edwin Dingle），德国威廉港市档案馆（City Archive in Wilhelmshaven, Germany）

### 4. 战壕中的清军炮兵部队，汉口，1911年10月

佚名，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伦敦传道会 / 世界传道会档案馆（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 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 Archives SOAS, London, UK）



### 德国水兵，汉口，1911年10月

从水兵帽子上的标识来看，他们来自不同的德国军舰。一名水兵紧张地握着马克沁机枪。这种威力强大的武器不久后成为改变“一战”历史的经典装备。

佚名，中国国家图书馆提供







南北议和会议，上海，1919年2月20日

北方总代表为朱启铃（站立者），会议桌左侧为南方代表，总代表为唐绍仪。

自左至右：王伯群、郭椿森、缪嘉寿、章士钊、唐绍仪、胡汉民、曾彦、刘光烈、彭允彝、李述膺、钟文耀。

门前方桌后右为贾士毅，左为周诒春。

亚细亚照相馆（Asia Photo Studio），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提供



南北议和代表，上海，1919年2月20日

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发动护法运动，南北战起。

1919年2月，南北双方在上海举行议和会议。

自左至右：钟文耀、×××、曾彦、郭椿森、彭允彝、胡汉民、李国珍、刘恩格、缪嘉寿、方枢、朱启铃、吴鼎昌、唐绍仪、李述膺、章士钊、饶鸣銮、施愚、王伯群、徐佛苏、刘光烈、王克敏、汪有龄、江绍杰、周诒春、贾士毅。

亚细亚照相馆（Asia Photo Studio），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提供

“我调和南北之苦心，世人不谅，死不瞑目矣！”

宋教仁（1882—1913），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政治家

# 第一部全面反映清末民初百年沧桑的大型历史画册

本书以独特的视角，将取自世界各地的大量珍贵历史图片（其中三分之一为第一次披露），编辑成册，全面呈现从鸦片战争到军阀混战动荡巨变的中国百年近代史，期望能帮助历史学家、读者直观地认识、思考这段历史，回顾反思其间的辛亥革命这一开创性事件。

1911年的武昌起义是加速清王朝覆灭的关键，促成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建立，这一历史事件是如何发生的？是必然，还是偶然？慈禧太后、康有为等保皇派，梁启超等立宪派，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者，袁世凯这类军阀，严复、蔡元培等教育家……对这些历史人物的功过如何认识？这些问题不断在海内外学者中引发激烈的辩论。各地学者对辛亥革命遗产也有不尽相同的解释。抛开派别的分歧，所有中国人都将那段动荡岁月视为“百年忧虑”或“百年屈辱”，其中蕴含的情感至今萦绕在人们心头。

作者通过历时一年对全球范围内公共展馆和私人藏品的梳理汇编，用真实的影像重现近一个世纪的“集体记忆”，这些历史的印记可以帮助认识现代的中国。曾协助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为中美关系铺平道路的亨利·基辛格写道，即使最具开放思想的中国国际主义者都认为，中国过去遭受的不公正对待决定了中国如何参与世界事务、如何界定在其中所要扮演的角色。

本书通过所收集的影像，为今天与未来的读者塑造1850—1928年间中国日常生活、历史事件与社会巨变的视觉叙事。它提供了一个历史背景，在这里，人们可以反思过去，展望未来。



## 《壹玖壹壹： 从鸦片战争到军阀混战的百年影像史》

成品尺寸：250×340mm（8开） 页数：416页  
出版时间：2011年8月 定价：600.00元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简体版）  
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繁体版）  
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繁体版）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英文版）  
香港大学出版社（英文版）

限量精装、绝版印刷  
五个版本全球同步出版  
面向全球读者，极具收藏价值



## 后 记

1902年6月,二十九岁的梁启超在《杭州白话报》上发表文章首次提出:“千句话并一句话,因为是旧中国不好,要想造成那一种新中国。”同一年,梁启超还在政治幻想小说《新中国未来记》描述了以立宪民主为基础的现代中国的理想蓝图。从此,“新中国”成为抛弃一家一姓之王朝、追求中国社会进步的人士的共同奋斗目标。

仅仅九年后,辛亥革命爆发,大清王朝黯然谢幕。“新中国”——“中华民国”成立了。这真的是一个全新的中国:与延续近两千年的帝制所维护的专制独裁不同,中华民国的立国价值取向是立宪民主。

“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在南京教育部任职的鲁迅回忆说,“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可是,很快希望变成了失望,因为宪政未立,民主不彰,政治舞台上的人物变幻,不过是“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但是复辟帝制已成妄想,不管是北洋军阀,还是革命党,没有任何一方抛弃“中华民国”的旗号。

事实上,1949年在新政协期间,即将取得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仍然提议将国名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虽然由于司徒美堂等民主人士的激烈反对,中共提议的“简称中华民国”被删除了,但是不容否认,在中共开国领导人看来,1912年建立的中华民国是最早的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新中国之再生,而不是新中国之初生(参见王占阳《新中国:百年来的理想与实践》)。

从中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从1911到2011年,好几代中国人努力奋斗,生死以之的新中国,一个民主、宪政、富裕、文明的新中国实现了吗?至少,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所描述的“新中国”的理想蓝图,至今没有完成施工。

百年路漫漫,从辛亥一路走来新中国所经历的苦难和挫折,难道不值得认真总结吗?正像鲁迅先生所说:“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

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感谢接受采访的各位前辈,他们帮助我拂拭“涂饰”,重新审视中华民族一百年来的艰难历程。虽然他们的认识也不尽相同,观点各异,但都出于真诚。我相信,多视角的观察能够帮助读者更好地认识历史,理性地思考中国未来的道路。

还要感谢金耀基先生。我和他只有一面之缘,但是在我冒昧地提出请他作序的要求后,他非常痛快地答应了。他认真阅读了全部稿件,对全书所涉及的问题进行了精确的概括,同时写下了他对中国未来的殷殷期许。他还在序言里写下了许多奖掖后学的话,我愿将这些话作为不断学习的鞭策之语。

尤其要感谢刘绪贻教授,在这个溽热的夏季里,九十八岁的老人为本书撰写了一篇精彩的序言。他的总结堪称直指时弊,振聋发聩,尤其是他在文章最后提出:“中国不仅应该教育自己的国民成为坚决维护自己权利、严格遵守自己义务的好公民,还应预备有一天会成为世界政治共同体的好公民。因为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在谋求和维护自己进步的同时,也有助于全人类逐渐走向和平、进步和幸福的境地。”这种世界眼光和胸怀,在许多人陶醉于“中国崛起”美梦的今天,更是难得的清醒剂。

感谢“联办”(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王波明、戴小京等领导,他们为记者营造了宽容、宽松、宽厚的工作环境。感谢《财经》杂志的领导法满、何刚和靳丽萍的信任、支持,也感谢苏琦、许瑶等同事的帮助。

另外,也感谢世界图书出版公司的吴兴元先生和本书责任编辑张鹏,如果没有他们的辛苦努力,就不会有如此精美的图书贡献于读者面前。

马国川

2011年9月1日

于北京海淀西王庄

## 出版后记

年初以来,有关辛亥革命的新书络绎不绝地出版。这说明百年以前的那场震撼世界的事件,始终未曾淡出人们的视野,仍有大量的细节未经披露,仍是一个待思的领域。

为了更真切的观察与更深入的思考,我们为大家献上刘香成先生最新的大型历史影像画册《壹玖壹壹》,以及大家手头上这本精彩的访谈录。

与《壹玖壹壹》谨守克制与沉默的视觉逻辑不同,《告别皇帝的中国》呈现出的是另外一种面相。在马国川先生精心设计的提问下,十二位学者各抒己见,汇成了一部气势恢宏细节繁复的交响曲,这是以思想突破概念化书写历史应当遵循的逻辑,也是以思想拼贴真实的历史图景需要施展的策略。

要保证这种“突破”和“拼贴”的成功,端赖于对受访对象的选择。书中十二位学者的年龄跨度超过半个世纪,这就在历史记忆、知识积淀和生命感受上保障了对“辛亥百年”进行评论的品质和广泛代表性;他们分属中国大陆和台湾以及海外学人,保障了认知和价值观层面上的多元性和差异性;各位学者都是各自学科内建树颇丰的旗手,我们可以透过他们的视角,从政治、历史、法律、文化等多个维度重新审视“辛亥百年”,获得立体的整体认识。

真实的历史影像是我们进行坚实地观察和思考的前提,不断地观察和思考则是我们复活历史,使之与现时血肉相连,从而扎根于时间洪流不被轻易裹挟而走的必由之路。它们仿佛任何健康的人所需要的钙质和维生素,希望这两本书能够有助于读者做一个健康的中国人。

服务热线:133-6631-2326 139-1140-1220

服务信箱:teacher@hinabook.com

世图北京公司“大学堂”编辑部  
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2011年9月